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吴金山 班奎星

副 主 任 高建立 张学勇

成 员 （以姓氏笔画排序）：

马学庆 马发营 王良田 王海英（女）

白 鹏 刘道明 刘瑞芳（女） 刘秀森

刘万华 朱洪涛 刘爱萍（女） 吴金山

李可亭 张学勇 陈士京 赵云峰

郭文佳 班奎星 高建立 谢君善

潘海英 薛明志 薛立芳（女）

主 编 高建立

执行主编 张学勇

副 主 编 朱洪涛 陈士京 刘爱萍 刘万华

马学庆 马发营 白 鹏 薛立芳

王海英

本期责编 高建立 张学勇

目 录

□ 古城文化动态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揭牌仪式及商丘市第一届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商丘师范学院隆重举行 /1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工作职责及组成人员名单 /10

□ 古城历史研究

王良田：明清归德府城防御功能概说 /14

白 鹏：从应天归德说起 /18

贾建涛：长安三万里 “吹台” 在哪里？

——杜甫诗“气酣登吹台”考辨 /21

张学勇：壮悔堂、李香君、李姬园史迹钩沉 /28

薛立芳：商丘地名来源与文化内涵探析

——说商与归德 /38

□ 古城家族研究

王玉顺：北宋应天府虞城王氏藏书世家概述 /43

高建立：明清归德府八大家简论 /53

□ 古城保护开发

赵云峰：商丘古城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59

魏清彩：商丘古城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65

□ 书院文化研究

王树林：北宋应天书院史志研究发微 /72

李可亨：范仲淹思想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 /81

马发营：文旅新时代应天书院定位与发展的思考 /85

□ 商丘古城风貌

古城雪霁 / 封二、封三

· 古城文化动态 ·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揭牌仪式 暨商丘市第一届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商丘师范学院隆重举行

商丘古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居于中国最具潜力十大古城之首。为进一步展现商丘“以文化城”的恒久魅力，繁荣商丘文化事业发展，11月26日上午，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揭牌仪式暨商丘市第一届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商丘师范学院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共商丘市委宣传部、商丘师范学院、商丘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商丘日报社、商丘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商丘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商丘市古城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协办，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校长薛明志、商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二级巡视员刘道明、商丘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胡学恩、商丘市文旅局局长史新艳、商丘日报总编辑宋圣英、商丘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陈星、商丘市睢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政府副区长黄英杰、商丘市文联副主席曹思航、商丘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记沈祥山、商丘市名城办副主任赵耀、商丘古城保护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文和、商丘市民协主席张学勇、商丘市殷商文化研究会会长王良田、商丘市国学文化促进会会长李可亭、商丘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朱凤祥、商丘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王海英以及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部分班子成员和教师代表等40余名领导、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会议。商丘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吴金山、副校长郭文佳出席活动。

会议于上午八点三十分在人文学院应天国学堂正式开始，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高建立教授主持会议。首先，商丘市文联副主席曹思航宣布研究会工作职责和组成人员名单，接下来，商丘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二级巡查员刘道明和我校党委副书记吴金山为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揭牌。

简短的揭牌仪式结束后，吴金山副书记致欢迎词，刘道明、史新艳、黄英杰、赵耀等领导分别作了讲话。

与会代表合影留念后，大会分两组进行学术研讨，40余名领导及专家学者就古城历史、建筑艺术、家族文化、民俗民风、文物考古、书院文化、殷商文化、古城保护与开发等进行了研究，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新观点相互碰撞、新思想彼此分享、新认识共同提升，炒制了一席丰富的古城文化盛宴。

分组研讨结束后，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张学勇主持了闭幕式，郭文佳副校长作了会议总结讲话，对研究会的揭牌暨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表示祝贺，对市有关部门将古城文化研究会挂牌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表示感谢，对人文学院和古城文化研究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寄予了厚望。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揭牌仪式暨商丘市第一届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我校的成功召开，无疑为商丘古城文化研究和文旅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平台，相信通过本次研讨会，能够进一步助力商丘古城文化研究，推动校市融合和商丘文化事业发展，更有助于进一步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开幕式致辞

◎吴金山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同志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齐聚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应天国学堂，共同见证商丘古城文化研究的揭牌及商丘市第一届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开幕。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商丘人，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商丘古城是一座承载着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古城，它记录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人类社会的变迁。今天，我们聚集一堂，就是要探讨和研究这座古城所蕴含的文化魅力与历史价值。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的揭牌，标志着我们对这座城市文化的认识和保护进入了新的阶段。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旨在深入挖掘商丘古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动商丘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商丘古城文化内涵的挖掘与研究将会成为我们商丘的一项重要文化工作，也将会为商丘古城的文化保护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同时，我们还将举办商丘市第一届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我们为了进一步推动对古城文化的深入研究、交流和分享而举办的一次重要学术活动。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能够汇聚各路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和研究商丘古城文化的各个方面，进一步挖掘其独特的文化价值。

在接下来的研讨会上，我们将围绕商丘古城的历史、文化、艺术、社会、经济、家族、创意开发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我们希望通过思想的碰撞和知识的分享，能够产生更多有深度、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在此，我要感谢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朋友的信任和支持。你们的参与和支持，使这个揭牌仪式和研讨会更具意义和价值。同时，我也要感谢所有为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付出辛勤努力的人们，你们的付出和贡献将为这座古城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让我们共同期待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揭牌仪式暨商丘市第一届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圆满成功！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一起为保护和发展商丘古城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谢谢大家！

（吴金山，中共商丘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

在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揭牌仪式 暨商丘市第一届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黄英杰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应邀出席今天的仪式和研讨会，我感到十分荣幸和由衷的高兴。在此，我谨代表商丘市历史文化名城传承保护中心和商丘市名城办，对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诗经·商颂》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商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浓缩了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史，自古以来就是名都大邑。

商丘古城是千万商丘人的精神寄托、根脉所系。当前，国家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恰逢其时、意义重大。希望研究会秉承求是精神，守正笃实，久久为功，进一步坚定商丘文化自信。

借此机会，有三个疑问向各位领导和专家请教。

一、今天研讨的是古城文化，那么怎么理解文化的定义？文化对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二、商丘古城文化的内涵和特点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说“一城阅尽五千年”，商丘古城在 5000 年中华文明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三、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使命是赓续文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把文化基因植入到商丘古城里面，又能与 5A 景区创建完美结合？

正如市委书记李国胜同志所指出的：历史的商丘辉煌灿烂，今天的商丘蓬勃发展，未来的商丘前景无限。

商丘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要使商丘古城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民喜闻乐见、百姓广泛参与的方式传承下去，我们任重而道远。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的成立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开了个好头。我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大力支持下，商丘古城和商丘文化必将迎来新的辉煌！

最后，祝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谢谢！

（黄英杰，中共商丘市睢阳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区政府副区长）

闭幕式致辞

◎ 郭文佳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同志们：

大家好！

首先，我代表商丘市第一届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的组织者，向各位领导、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霜风一夜落寒林，莽苍云烟结岁阴”（宋·张嶠《小雪作》），小雪刚过，初冬已临，今天我们在此共同见证了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的揭牌，并探讨了古城文化的深厚内涵和价值，深入学习和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本次研讨会，我们听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观点，各位专家、学者从古城历史、建筑、文化、艺术、教育等多个角度，对古城文化进行了深入剖析和阐述。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古城文化，助推商丘古城文旅融合发展，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推动和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古城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古城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的载体。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更应该珍惜并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虽然商丘古城的保护性开发现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我们坚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凝聚共识，达成一致，古城必将迎来光亮的明天。

商丘师范学院作为商丘市唯一的公办本科高校，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推动商丘古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的成立正是我们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古城文化深入发展的重要举措。第一届古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我校的成功召开，无疑为商丘古城的文化内涵的挖掘以及商丘市的文旅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平台。我们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能够进一步推动商丘市的文化事业发展，为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商丘以及商丘古城提供机会和渠道。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各位领导、专家学者的到来，感谢各位来宾的支持和参与。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深入探讨和研究古城文化，努力推动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越办越好，为商丘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郭文佳，商丘师范学院副校长）



会议现场



主会场



吴金山、刘道明为研究会揭牌



吴金山



郭文佳



薛明志



刘道明



史新艳



宋圣英



陈星



黄英杰



曹思航



沈祥山



赵 耀（代表赵海涛）



周文和



刘秀森



王良田



李可亭



谢君善



高建立



张学勇



朱洪涛



刘春正



刘万华



薛立芳



贾建涛



白鹏



陈功文



于志刚



解远文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工作职责及研究会组成人员名单

为进一步挖掘商丘古城文化，讲好商丘故事，繁荣商丘文化事业发展，经研究，成立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

一、研究会主要职责：研究商丘古城历史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艺术文化、家族文化、姓氏文化、考古文化以及古城保护与利用等。

二、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组成人员名单

顾 问： 郭文佳 薛明志 赵云峰 刘道明 刘瑞芳（女）
刘秀森 李可亭 王良田 潘海鹰 谢君善

名誉会长：吴金山 班奎星

会 长：高建立

执行会长：张学勇

副 会 长：朱洪涛 陈士京 刘爱萍（女） 刘万华 马学庆 马发营
白 鹏 王海英（女） 薛立芳（女）

秘 书 长：张学勇（兼） 薛立芳（兼）

副秘书长：吴超群 李雨耕（女） 舒笛

（商丘市文联副主席 曹思航宣布）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人员组成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顾问



郭文佳



薛明志



刘道明



赵云峰



刘瑞芳



刘秀森



李可亭



王良田



潘海鹰



谢君善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吴金山



班奎星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会长、执行会长



高建立



张学勇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朱洪涛



陈士京



刘爱萍



刘万华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马学庆



马发营



白 鹏



王海英



薛立芳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张学勇



薛立芳

商丘古城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吴超群



李雨耕



舒笛

· 古城历史研究 ·

明清归德府城防御功能概述

◎王良田

明清归德府城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由外城郭、城湖（护城河）、砖城三部分组成，平面格局保存基本完好，1996年，归德府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以来，睢阳区党委政府重视古城环境保护，逐步拆除外城郭与砖城之间的危房及违章建筑，目前城湖面积广大，远远看去砖城部分就象座落于水域面积广大的湖水之中，如海市蜃楼般漂渺变幻，犹如镶嵌在豫东大地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明清古城中一个优秀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一、古城的基本情况

商丘古城（归德府城）始建于明代弘治十六年九月（1503）。明弘治十五年六月黄河泛滥，明归德州城被冲毁，次年九月，以老城北墙为南墙，重建归德州城。据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城池》载：“弘治十五年圯于水，正德六年重筑，乃徙而北之，今南门即北门故址也。”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灾祥略》载：“明弘治十五年夏六月，河决入城，廨舍荡然”。《明史·地理志》载：“归德府……旧治在南，弘治十五年圯于河，十六年九月迁于今治。”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升归德州为归德府，置商丘县，府、县衙

署同设在归德府城内。直到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巡抚章焕檄知府陈学夔在夯土城外包以砖，历时55年，归德府城全部修建完成。

明清归德府城由外城（城郭）、城湖、内城（砖城）三部分构成，三位一体至今保存完好。

外城墙，即城郭、护城堤，夯土筑成。始建明嘉靖十九年春（1540年），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记载：“城堤距城1里许，围十六里，阔二丈，址阔六丈一尺。明嘉靖年间，巡抚都御使魏有本檄知州李应奎筑”，后迄明清两代均有修葺。由于受后代建筑破坏，土城墙大部分已变为高出附近地面2-3米的土岗，近年来，当地政府为了更好地保护土城墙，把城墙本体及周边环境进行大力度整治，把墙体上及两侧晚期建筑及附属物进行拆迁、绿化，目前城墙保存状况良好，修复后的城郭环境优美，成了市民旅游休闲的场所。底宽20米左右，顶宽7-10米不等，周长8公里。

城湖位于砖城墙与外城郭之间，由原来的护城河演变而成，土城墙外侧有宽窄不等的护城河。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城池》记载：“池距城丈余，阔五丈二尺，深二丈。”以后明清两代均有开挖修复。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春修建

土城墙以来，土城墙有效的阻挡了黄河水患对古城的毁灭性破坏，但每次大水过后，水患泥沙沉积逐步抬高土城外地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城至砖城间地面与土城外地面相比，变得越来越低洼，再加上城内建设常年取土形成坑塘，遇到雨水大的年份，坑塘与低洼地相连形成大面积水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20世纪60年代航拍古城图像中土城墙与砖城间大面积水域的原因。近年来，睢阳区委、城府又对城湖水面进行整治、绿化，拆除了砖城与土城之间的建筑，进行大力度环境整治，现在的城湖水面开阔，水波荡漾，水鸟众多，环境优美。

内城墙为夯土筑成，外包青砖，又称砖城墙，始建于明弘治（明孝宗朱祐樞的年号）十六年九月（1503），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城池》载：“（城墙）围七里二分五厘，共一千三百四丈二尺五寸，高二丈五尺，广一丈三尺……嘉靖三十四年（1555），知府王有为重修，又建西、北门楼各一，东南门楼二，俱加修葺，又建角楼四，敌楼一十三，警铺三十二。三十七年（1558），巡抚章焕檄知府陈学夔，包以砖。”明清归德府城有四座城门，东为宾阳门，西为埵泽门，南为拱阳门，北为拱辰门，南门东西两侧各有水门一座，四门外各有瓮城一座（二十世纪初被破坏，现在仅存基址），每一座瓮城各有一门，东、西瓮城门向南，南瓮城门向东，北瓮城门向西，故明清归德府城有四门八开之说。

内城墙平面近方形，南北略长，南墙长950米、北墙长993米、东墙长1210米、

西墙长1201米，周长4354米，城墙底宽10米，上宽6.7米，内为夯土，外包青砖，墙高7米，上砌1.8米高的女儿墙，城内面积1.13平方公里。

古城内93条街道，呈棋盘式布局，明清时期的街道布局基本保存完好，据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载：“”。城内还保留有30余处明清时期的四合院建筑

二、古城墙的防御功能

商丘古城墙除具有与全国其它古城相同的军事防卫功能外，还有防御水患的功能。

1、军事防御功能

古城正门外建造瓮城，主要是军事防卫的需要，瓮城是在城门外增加的一道防卫屏障。瓮城又称月城、曲池，是在城门外口加筑的小城，依附于城门，与城墙连为一体的附属建筑。一般高与大城相同，其平面有圆形、半圆形或方形，圆者似瓮，故称瓮城，方者亦称小城。瓮城门设在侧面，从而增加了防御能力。瓮城是古代城市主要防御设施之一。瓮城在我国出现较早，西汉昭宣时期甘肃居延甲渠侯官治所坞门门外有类似瓮城的曲壁，可能是瓮城的雏形，匈奴所筑统万城也已出现了瓮城。目前发现较早的是高句丽国内城6个城门的所置的瓮城。在我国古代城池中，瓮城的设置兴盛于五代和北宋时期，在北宋仁宗时期的文臣曾公亮和丁度编著的《武经总要》中，第一次出现关于瓮城的记述“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

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在南京明城墙修筑前，中国传统瓮城的制式是将其设于主城外，南京明城墙一反此旧制，将瓮城设于城内，在城体上革命性的设置了“瓮洞（藏兵洞），大大加强了城门的防御能力，南京聚宝门（今中华门）瓮城最为庞大复杂。

商丘古城除瓮城外在砖城墙上还建有1.8米高的女儿墙、马面、角楼、敌楼、警铺等军事防御设施。女儿墙在古代时叫“女墙”，包涵着窥视之意，是防照女子“”之形态，在城墙上建起墙垛。《辞源》给“女儿墙”的定义是：“城墙上上面呈凹凸形的小墙”；《释名释宫室》：“城上垣，曰睥睨，……亦曰女墙，言其卑小比之于城”，意思是因为古代的女子是卑小的，所以就用来形容城墙上上面呈凹凸形的小墙，这就是女儿墙名字的由来。商丘古城女儿墙，墙高1.8米，垛口宽0.70米，高0.90米，墙垛瞭望孔近方形，高0.30米，宽0.20米，女儿墙的防御作用在于守卫城墙的兵将可以凭借它隐蔽身体，通过垛口和瞭望口又能观察攻城者的情况，可见是女儿墙也是城墙防御设施中很重要的部分。

马面是古城墙防御系统的一部分，是指城墙体外，每隔一定距离凸出主墙外侧的一段，或称为敌台、墩台、墙台，平面有长方形或半圆形，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马面的使用是为了与城墙相互作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马面至少在我国战国时期已用于城市防御了。从目前考古资料看，最早在城墙上构筑马面的是燕下都的宫殿区，但直到北宋

时期才被普遍使用，现存最早的马面实物，见于甘肃夏和县北的汉代边城八角城。商丘古城墙的马面平面为长方形，凸出墙外5米左右，正面宽13米左右，南、东、北三面城墙外各有马面2处，西墙外有马面3处。

商丘古城四角各建角楼一座，角楼也是城墙防御设施的重要部分，建于角台之上，角台是突出于城墙四角，与墙身连为一体的墩台，战时角楼内守御者可以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可以监控、痛击来自多角度进犯之敌，角台和角楼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位置。

清乾隆十九年《归德府志》记载，商丘古城墙上原建有敌楼13处，敌楼筑在马面上，又称楼，敌楼具有治安防范和军事防御的双重功能。商丘古城墙上敌楼早年被破坏。

商丘古城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在城墙上建警铺三十二个。警铺是建于城墙上，三面伸出城墙外，一面在城墙上的防御设施，伸出城墙外的三面均没有瞭望孔，警铺的设置更强化了城墙的防御功能。商丘古城上的警铺现已不复存在。

归德府城4座城门中，南门与北门有隅首街相连，南北正对照；西门与东门错一条街，不对应。东门对义字街，西门对泽字街。据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记载，归德府街道呈棋盘式布局，共有93条街道（其中化字一街、二街均重列）。其中有义字北街等多条街道不贯通，这种东西城门不对称，城内街道不贯通的设计，也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我国古代城池

道路的设计都是严格按照王城图的规划设计的，城池为方形，城门都是相对的，道路都是直通的，“但是我国许多地方由于军事防御的需要，竟把城池里的基本原则，逐步改变，所以就没有完全遵守王城制度，再加之各军阀割据，土匪横行，城池内部多少有所改变。例如‘城门不相对，道路不直通’一直作为当地建城的标准”。（张驭寰《中国城池史》，第55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文中还列举了“山西长治城、兰州古城、庆阳城等14座古城”城门不相对，道路不直通的例子。

此外，外城墙、城湖（护城河）、吊桥也是古城军事防御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2、防水患功能

商丘位于黄泛区，从北宋至清代约700年间，黄河南泛，夺淮入海，黄河水患给商丘一带常常带来灾难性破坏，明弘治十五年（1502）黄河水灾，冲毁了归德府城，十六年九月在被冲毁的归德府城北，以旧城北墙为南墙建新城，即我们现在看到的归德府城，为了抵御黄河水患，于明嘉靖十九年春（1540）在城湖外

一里修建护城堤（外城墙），外城墙平面近圆形，近圆形城墙外壁可以分解、减缓水患对城墙的冲击，从而抵御了水患，确保了古城安全。明李嵩《护城堤记》记载：“（嘉靖）庚子（1540年）春……时嵩待罪禁垣，与魏公言堤障水便，公恍然是之，慨然趣所司以从事。堤四面环郭门，周十有六里，高视城半之，厚倍之，

上树之以柳，不数月而立竣，遂成巨障云。呜呼！堤之功用大矣哉……岁复大水，舟楫由于树梢，平野悉为津汇，然竟赖是堤以忘患。”从修建了圆形外城墙以来，商丘古城避去多次黄河水患，至今安然，可见外城墙对防御水患，保护古城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三、结语

商丘古城是我国明清时期府级古城中很重要的一处，它的平面布局、建筑风格、规划设计等方面都有待深入研究，商丘古城因其地处黄泛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其营造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城市军事防卫功能，还要考虑抵御黄河水患的侵害，只有这两种功能齐备，才可以确保古城的安全。我们认为商丘古城外城墙，所以建成圆形没有建成长方形或方形的形式，主要原因还是为抗击水患考虑，圆形的外墙面比平直的外墙面更具有抵抗水灾冲击力的能力，历史证明了这种设计理念的无比正确，黄泛区古城平面都是这种外圆内方的形式。

（作者：王良田，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从应天归德说起

◎白鹏

商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诞生中华圣人文化圈的中国古代重要都城。商丘，不但有举世瞩目的商文化、火文化、宋文化，还有始祖文化、根亲文化、圣人文化、汉梁文化、木兰文化、书院文化、古城文化等众多文化品牌，至今熠熠生辉，在中华文明起源及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华文明之源的商文明源于商丘；数千年来薪火相传，商丘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商宋文化；商丘古城，是商宋文化核心载体之一。商丘应该大力弘扬商宋文化品牌，并明确把商丘古城作为商宋文化的核心载体予以重点推介。

五千年不断代的商丘古都城有过很多曾用名，史上赫赫有名的“应天”与“归德”，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一、应天，何以应天？

商丘的曾用名应天府，北宋之前叫宋州。通俗的讲，应天曾是一座像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华盛顿、中山、秦皇岛等一样，以帝王或开国领袖之名所命名的城市。

应天之名，来自宋太祖赵匡胤的尊号。应天，是“顺应天命”之意，而宋太祖所谓的“顺应天命”，相传来自商丘的帝昶、阍伯的两次“天命”占卜暗示。

赵匡胤在后周时为归德军节度使，先去宋州（商丘）城南四十余里的高辛帝昶

庙，后去城西南的火神阍伯庙占卜前途，两次占卜结果都是他有“天命”，以后要做皇帝。他从此精神大振，后来做了后周的殿前都检点，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帝位，忆起龙兴之前在做宋州归德节度使时得神灵预示一事，将自己创立的朝代命名为“宋”。

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因赵匡胤曾于乾德元年（963年）受群臣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宋州为圣祖（赵匡胤）龙兴之地，遂将宋州升格为应天府，仍为京东路路治，后为京东西路路治。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分天下为十五路，设置京东路，路治应天府（初名宋州），管辖：应天府、襄庆府、兴仁府、东平府、济南府五个府；徐州、济州、单州、濮州、拱州、青州、密州、沂州、登州、莱州、潍州、淄州十二个州；广济军、淮阳军两个军。合计八十一县。熙宁七年（1074年），京东路被拆分为京东路、京东西路，京东路治青州（今属山东），京东西路治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京东西路包括四府：应天府（南京）、襄庆府（兖州）、兴仁府（曹州）、东平府（郓州）；五州：徐州、济州、单州、濮州、拱州以及广济军，大致包括今天的江苏省北部，山东省的中西部，河南省东部，安徽省小部等。应天府共辖七县：宋城、

宁陵、柘城、谷熟、下邑、虞城、楚丘，府治宋城。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建应天府为南京，成为陪都，宋真宗亲自驾临应天府，主持隆重的授命仪式，改圣祖殿为鸿庆宫，并赐宴三日，又下旨修建归德殿，接着规划京城和宫城。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赵构于应天府南京城南门外幸山筑“中兴坛”。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登基即皇帝位，为了延续宋朝皇统和法统，定国号仍为宋，改元建炎，史称南宋。

应天府不仅曾是大宋王朝“龙兴之地”、北宋陪都“四京”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南宋开国之都，并成为大宋王朝“再兴之地”。值得注意的是，应天府还曾是京东路的治所，相当于现在的省会。北宋的京东路，金改京东路为山东路，明置山东布政使司，清至今相沿称山东省。

因此说，京东路治所应天府宋城（今商丘市）曾是一座管辖包括今山东省大部地区在内、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地区的“省会”城市。

二、归德，何处归德？

归德之名同样和曾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有关，甚至可追溯到更早的五代时期。

五代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宋州（今商丘）升为宣武军。五代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唐庄宗将宣武军改为归德军，始得名归德。

后梁太祖朱温有个外甥叫袁象先，宋州下邑（今属安徽砀山）人，《新五代史》记载他：“为梁将未尝有战功，徒以甥故

掌亲军。”也就是说他没有什么战功，仅仅靠亲戚关系做了后梁的大将。他一生历任宣武军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宿、洛、陈三州一刺史，左龙武统军，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等官职。朱温当了皇帝后，不理朝政，贪恋女色。父子、兄弟之间明争暗斗，互相厮杀。袁象先帮助后梁末帝朱友贞夺得了政权，末帝便拜袁象先为镇南军节度使，后来又拜为宣武军节度使，坐镇宋州（今商丘）。袁象先“在宋州十余年，诛敛其民，积财千万”，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

公元923年，庄宗李存勖灭掉了后梁，建立后唐，定都洛阳。袁象先带着盘踞宋州十多年掠夺的数十万赃银跑到洛阳，投降了李存勖。李存勖万分厚待袁象先，并赐他姓名李绍安，改原来的宋州宣武军为归德军，仍让他回原地镇守，李存勖对袁象先说：“归德之名，为卿设也。”意思是说，袁象先投降了后唐，就是归顺后唐的有德之人了。

后周时，设宣武军于宋州（今商丘），后改归德军。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驾崩，继位的周恭帝柴宗训年仅七岁。赵匡胤时任殿前都点检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登基即位，因其藩镇在“宋州”，遂以“宋”为国号，建立宋朝。又因五德终始说，陶唐氏之火正阍伯居商丘，宋州为大火星房心分野之地，故宋朝又自称“火宋”“炎宋”。

绍兴二年（1132年），金朝所扶持的伪齐皇帝刘豫将宋朝南京（今河南商丘）降为归德府，是归德府设置之始。金天兴

元年(1232年)十二月,金哀宗迁都归德府,蒲察官奴发动归德政变在归德之战中大败蒙古兵。民国二年(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撤销归德府。归德府设置将近800年之久。

现存的商丘古城又称归德古城,为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重修,历时八年于正德六年(1511年)竣工,距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归德州升为归德府,始置商丘县,归德府附郭商丘县,府县同城,此城即为归德府城(商丘县城)。归德府领睢州及商丘县、宁陵县、鹿邑县、永城县、虞城县、考城县、柘城县、夏邑县等一州八县。清沿明治,这一格局直至清末。

三、应天归德与何为“商丘古城”?

应天归德,赫赫有名,均是商丘古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辉煌篇章。而商丘最早的城既不是应天,也不是归德。

商丘最早的城是亳,其次是商,再次为宋。

亳,是帝誉都城、商国最后一个都城,也是商朝第一都,位于今商丘古城东南、谷熟西南三十五里。商,是契所居之商,后为宋国国都。宋、商、睢阳为一地,均位于今商丘古城附近。

张善余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中,把商丘作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发祥地。记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商丘是商部族的起源和聚居地,商人商业的发源地,商朝最早的建都地。商朝及先商,由于交换的发达,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文

明发达的国家,由于商业的发达,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往来很多,今天“商人”一词,源自当时周边国家对商朝国人的称谓。商丘是商文明之源。把商丘作为中国最早的城市发祥地,是言之有据的。

自帝誉都亳、商契居商为始,商丘至少已有4000余年的建城史;从商代第一都南亳算起,商丘已有3600余年的建都史;现在已经考古确认的周代宋国故城,距今已有3000余年历史。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始置碭郡睢阳县,商丘及睢阳设置郡县至今已有2200余年历史。

商丘曾先后称为亳、商丘、宋国、碭郡、梁国、梁郡、宋州、睢阳、应天、归德等,历代均设国、郡、州、府。由于年代久远,兵祸天灾,商丘古城曾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但范围大都在南北十里之内。

商丘,历为名都大邑,是一座建制齐全、沿革连续、文脉相承、底蕴丰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商丘古都文化、圣人文化交相辉映,其连接点是商丘古城。

何为商丘古城?

商丘古城,不是一座城,而是包括帝誉都亳、商契居商、商都南亳、宋国故城、两汉梁国都城、宋朝南京应天府城6座都城,以及秦碭郡睢阳城、三国南北朝梁郡睢阳城、隋唐宋州睢阳城、金元归德府睢阳旧城、现存的明清归德府商丘县城5座州郡府城,约11座城在内的传承数千年历史的数座古都、古城的集成体。

(作者:白鹏,商丘日报社主任编辑)

长安三万里“吹台”在哪里？ ——杜甫诗“气酣登吹台”考辨

◎ 贾建涛

影片《长安三万里》火爆出圈，感动无数人，主要原因在于该片以历史原貌为主题，以高适和李白、杜甫相识相知、互帮互助为主线，弘扬积极向上的人生正能量，揭示了梁园由汉朝鼎盛到唐朝衰败的文化遗产。李白、杜甫、高适文坛三杰“梁宋游”是历史上的文化盛事，三人同游梁园，游览过程中诗作较多，李白写下了《梁园吟》，杜甫写下了《遣怀》，高适写下了《宋中十首》等。杜甫《遣怀》诗：“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说明三人应该登临过吹台，饮酒赋诗。但此“吹台”到底在哪里？

关于杜诗“吹台”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杜诗“吹台”在开封，高李杜三人同游汴州开封时曾登临。二是杜诗“气酣登吹台”应为“文台”之误（《全唐诗》在“吹”字后加注：“一作文”），三人同游“梁宋”登上的是宋州文台，即今商丘古城湖东南的文雅台，简称文台，因为商丘并没有吹台。此问题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至今开封、商丘两地的学者及相关专家仍各执一词，没有定论。但笔者认为，两种说法皆有可取和不妥之处，现考析如下：

一、开封有吹台，应是春秋时期琴师师旷抚琴教学之台，应不是高李杜三人

同游“梁宋”共登之吹台。

目前，开封禹王台公园内专门建有古吹台景区，十分有文化气息，从高处俯瞰古吹台形同一只乌龟，四周边缘地形低，中间一块高地如同乌龟的龟背，造形独特，十分优美。公园内除古吹台外，还有御书楼、禹王庙、水德祠以及高适李白、杜甫三人同游“梁宋”的三贤祠等，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文景点。

开封的古吹台，应是春秋时期被称为“乐圣”的琴师师旷教授琴艺的地方。据传春秋时卫国的宫廷乐师高扬因为得罪了卫献公的宠姬被逐出了京城，无奈之下他带着女儿来到了仪邑（今开封东附近），靠传授琴艺为生。后来师旷慕名来到仪邑拜高扬为师，学习琴艺。三年过去了，师旷的琴艺仍没有长进。高扬认为师旷只喜欢看好看的东西，不能专心学琴，因此非常生气，训斥了他一顿。师旷感到非常羞愧，他决定改变自己的坏毛病，于是用绣花针刺瞎了自己的双眼，以示决心。高扬得知后非常懊悔，于是把毕生所学都传给了师旷。师旷虽然双目失明，但他的听力却十分灵敏，经过老师的教导和自己的不断努力，终于超过了师傅，成为春秋时期远近闻名的琴师。师旷博学多才，尤精音律，辨音力极强，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据说师旷可以听到天庭之音，他艺

术造诣极高，著名琴曲《阳春》、《白雪》即为其所作，后人尊之为“乐圣”。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师旷琴艺方面的贡献，把他曾经教授琴艺吹奏乐曲的地方改建为“吹台”，这就是开封“古吹台”的来历。后来因为开封距黄河很近，黄河水肆意泛滥，百姓屡遭水患。于是，就有了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为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在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在古吹台上建了禹王庙，至此，开封古吹台就又称为禹王台了。

据商丘师范学院王增文教授考证，李白、杜甫初次相见的地点不是洛阳，而是宋州商丘的梁园。故李白、杜甫、高适三人能结伴同游“梁宋”故地梁园时所登之吹台，决不是开封之古吹台。“梁宋”在唐代特指宋州商丘，故此吹台也应在商丘。长期以来，“梁宋”一词学界一直认为是指开封和商丘两个地方，这种说法有待商榷，“梁宋”就是指当时的宋州，并不包括开封。商丘历史上曾先后被称为宋国、梁国、梁郡、宋州，所以在唐代被人称为“梁宋”。今天的开封在唐代称为汴州、陈留、古大梁等，确实与“梁宋”无关。这可在众多唐代诗歌中得到证明。高适《别韦参军》云：“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高适生活在宋州商丘长达26年，“兔苑”、“雁池”都在宋州，诗中之梁宋肯定是指宋州，无关汴州。李嘉佑《宋州东登望题武陵驿》诗云：“梁宋人稀鸟自鸣，登舫一望倍含凄。”直接将宋州称为“梁宋”。韦应物《睢阳感旧》诗云：“张侯本忠烈，济世有深志。坚壁梁宋间，运筹吴楚利。”

此诗说的是唐代张巡坚守睢阳城抵抗安史叛军的事，诗中梁宋也是指宋州，更无关汴州。杜玉俭在《中州学报》2004年第3期上发表《李白杜甫高适为何并未共登开封吹台》一文，明确指出：“汴州虽然在早期存有吹台、蓬池以及信陵君和侯赢活动的夷门等古迹，但自王赧引河沟水灌大梁后，古大梁就湮于茫茫黄沙，变成一片废墟，之后长期未能恢复原貌。”并引高适《古大梁行》诗“古城莽苍绕荆榛，驱马荒城愁杀人……全盛须臾那可论，高台曲池无复存”为证，说明当时包括吹台在内的古大梁名胜已不复存在，“高台曲池无复存”，有的只是战后留下的满眼荆榛的荒城，自然也就无“吹台”可登了。高适本人写的此诗，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与李杜两人同登开封吹台的可能性。

二、杜诗“吹台”非“文台”之误，商丘有“吹台”，是汉梁孝王所建古梁园“七台八景”之一。高适、李白、杜甫同游“梁宋”约有一年之久。

杜甫《遣怀》诗云：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讎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一作文），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弃如泥，尺土负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乱离朋友尽，合沓岁月徂。吾衰将焉托，存殁再呜呼。萧条益堪愧，独在天一隅。乘黄

已去矣，凡马徒区区。不复见颜鲍，系舟卧荆巫。临餐吐更食，常恐违抚孤。

此诗写于公元766年，是杜甫在夔州时对自己壮年时期宋州之游的回忆，其中写到宋州都会形胜、风俗民情以及与高适、李白的交友。其中“气酣登吹台”一句，《全唐诗》在“吹”字后夹注云：“一作文”，现在通行本皆作“登吹台”。关于这一点，李正华先生在《商丘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杜诗“气酣登吹台”辨误》中认为，此“吹台”是“文台”之误，与《全唐诗》观点一致。“文台”即商丘的“文雅台”，在今商丘古城东南护城河畔，诗中登临的“吹台”应是商丘的“文台”，决不是开封的“吹台”，也认为诗中的“吹台”不在宋州，并进行了详尽论述。

笔者赞同多数专家意见，即杜甫与高李二人同游“梁宋”登临“古吹台”之地在宋州商丘，不在汴州开封。但有专家认为“气酣登吹台”为“文台”之误，因为商丘并无“吹台”。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商丘在西汉梁国时期确有“吹台”，是梁孝王所建梁园“七台八景”之一。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5126号中华经典藏书《水经注》卷二十四《睢水、瓠子河、汶水》载：“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为梁王……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台苑、屏榭、势并皇居……城内东西道北，有晋梁王妃王氏陵表，并列二碑……营陵于新蒙之，太康九年立碑。东即梁王之吹台也，基陞阶础尚在，今建追明寺”。以上记载很明确，吹台就在西汉梁国睢阳城中，即今天的商丘古城一带。《水经注》是南北朝时期北魏

酈道元所著，北魏离唐朝只隔一个短命的隋朝，年代很近，况且酈道元又是著名地理学家，他的记载是切实可信的。之后到唐代，商丘睢阳城又是隋唐大运河上的“明珠”，商贸繁荣，杜甫《遣怀》诗“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就是对当时宋州商丘最真实的写照，可以说，作为当时运河上的著名旅游城市，梁孝王之“吹台”肯定要修缮并保存完好的，加之台上还建有追明寺，在当时肯定是一个旅游热点，高李杜三人同游宋州梁孝王之“吹台”是可信的。既然商丘有梁孝王之“吹台”，那么杜诗“气酣登吹台”一句中“吹台”就不可能再是“文台”即文雅台之误了，现在通行本皆作“登吹台”是完全正确的。

高适、李白、杜甫三人“诗记”同游“梁宋”的行踪。高适本为渤海郡（今山东滨州市滨城区）人，在20岁（公元735年）时雄心勃勃赴京城长安想谋取一官半职，结果处处碰壁，一无所获。于是，满怀怨恨的高适来到了“文雅”之地的宋州商丘定居下来，一住就是26年。他在《别韦参军》诗云：“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常苦”。他在《途中酬李少府赠别之作》诗云：“余亦愜所从，渔樵十二年，种瓜漆园里，凿井卢门边”。他在《宋中十首》诗云：“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时”、“逍遥漆园吏，冥没不知年”、“唯见卢门外，萧条多转蓬”、“阙伯去已久，高丘临道旁”。

从他诗中涉及“兔苑”“雁池”“梁苑”“漆园”“卢门”“阙伯”等地名来

看，高适当时就住在宋州睢阳城南门（卢门）附近。漆园是春秋时期种植漆树的园子，庄子曾做过宋国漆园吏，在今天梁园区李庄乡黄河故道森林公园一带。《春秋》云：“华氏居卢门里叛。杜预曰：卢门，宋城南门也。”可见，卢门是春秋时期宋国都城的南门，唐代睢阳城的南门沿续了卢门的名称，但城门位置大致在宋国故城东南门附近，高适在商丘的家就安在这里，即睢阳城南门（卢门）里附近。而宋国故城的卢门早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目前正在唐睢阳城正南门（即卢门），也就是宋国故城东南门附近进一步考古发掘。止2023年6月，已发掘出一片1000年前的桑树枝，东周时期的1口古井、陶罐、陶盆、磨石等，以及唐代的6座墓葬和两宋时期的陶片等。伴随着《长安三万里》的热播，我们完全可以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在商丘古城南复建高适故居项目，还历史以原貌，就说考古发掘出的这口东周古井，谁敢保证不是高适又二次开凿的？因为唐代及以前商丘的古地貌与汉代基本相同，并无大的水患，自北宋杜充决黄河东流经商丘后，商丘地貌才改变巨大。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五月的一天，高适就是在宋州睢阳城遇见了李白和杜甫，三人开启了光照中国文学史的“梁宋游”。作为东道主，高适在睢阳城南门（卢门）里的家中招待李杜两位重要客人，饮酒赋诗当是必备节目。

李白《梁园吟》：“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淶水扬

洪波”。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在《书赠蔡舍人雄》中有“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之语。

杜甫《昔游》：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藿去裴回。清霜大泽冻，禽兽有馀哀。是时仓廩实，洞达寰区开。猛士思灭胡，将帅望三台。君王无所惜，驾驭英雄材。《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从以上这些诗句，我们可以大致了解高适、李白、杜甫三人游梁宋的行踪。唐天宝三载（744年）五月，“我浮黄河去京阙”，李白乘船经洛阳、开封来到了宋州睢阳城，当时睢阳是隋唐大运河上的枢纽城市，“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是当时睢阳城最真实的写照，交通便利，高楼林立，热闹而又繁华。李白在这里遇到了来宋州游玩的杜甫，二人又慕名找到了客居宋州多年的高适，三人在睢阳城南门附近高适的家中多次开怀畅饮。三人都才华横溢，诗名卓著，又都怀才不遇，经历坎坷，于是同病相怜，情趣相投，相约一起同游梁宋，借酒浇愁。他们一起登上睢阳城中梁孝王的吹台和城东边的平台等梁园古迹，吟诗作赋，追忆梁孝王奖励文人雅士写辞作赋的文坛往事，遥望东边的芒砀烟云，追思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斩蛇起义的壮举。杜甫诗“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文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就是此时

的真实写照。当然，三个同游宋州时喝酒，李白乘兴在酒店房间的墙壁上题诗《梁园吟》，发生了“千金买壁”的故事最为人津津乐道。不过，李白在宋州终娶故事女主人公、前朝宰相宗楚客之孙女宗煜也是史实。

秋天，他们一起来到宋州孟诸泽田猎。孟诸泽在今商丘市东北40公里处，是古代一个大泽薮，今属山东单县。李白有《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一诗：

“出舞两美人，飘飘若云仙。留欢不知疲，清晓方来旋。”单父县即今天的单县，唐时属宋州，单父县有单父台，即琴台。《寰宇志》载：“琴台在单父县北一里，高三丈，即子贱弹琴之所”。在宋州，三人也曾一起登上单父县北的琴台，追怀孔子弟子宓子贱，吟诗抒怀。高适在《登子贱琴堂赋诗三首序》云：“甲申岁，适登子贱琴堂，赋诗三首。”而天宝三载正是甲申年，大约在这年深秋或年底，高适就离开宋州南游楚地了。高适《宋中别周梁李三子》云“李侯怀英雄，肮脏乃天资”，可能就是南游时留别李白等人之作。高适走后，李白、杜甫又在宋州游玩数月，李白娶了“千金买壁”的宗氏之女为妻，这是李白的最后一任妻子，对李白忠贞不渝。

从以上来看，高适、李白、杜甫三位“大咖”在宋州商丘同游的时间前后有一年左右，这绝对是中国文学史的“高光”时刻，而李白娶妻宗氏后，就是“十载客梁园”了，商丘也应有李白的家，故商丘古城李白故居项目也是可行的。而“吹台”，只是他们三人同游“梁宋”时的其中一个景点而已。

三、商丘梁孝王“古吹台”具体位置考证

关于商丘梁孝王所建之“古吹台”的具体位置，如上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四《睢水、瓠子河、汶水》所载十分清楚，原文如下：

秦始皇二十二年以为碭郡。汉高祖尝以沛公为碭郡长，天下既定，五年为梁国。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为梁王，太后之爱子、景帝宠弟也。是以警卫貂侍，饰同天子，藏珍积宝，多拟京师；招延豪杰，士咸归之，长卿之徒，免官来游。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观、台苑、屏榭，势并皇居。其所经构也，役夫流唱，必曰《睢阳曲》，创传由此始也。城西门即寇先鼓琴处也。先好钓，居睢水旁，宋景公问道不告，杀之。后十年，止此门鼓琴而去，宋人家奉事之。南门曰卢门也。《春秋》：华氏居卢门里叛。杜预曰：卢门，宋城南门也。司马彪《郡国志》曰：睢阳县有卢门亭，城内有高台，甚秀广，巍然介立，超焉独上，谓之蠡台，亦曰升台焉，当昔全盛之时，故与云霞竞远矣！《续述征记》曰：回道似蠡，故谓之蠡台。非也。余按《阙子》，称宋景公使工人铸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迟也？对曰：臣不复见君矣，臣之精尽于弓矣。献弓而归，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台，援弓东面而射之，矢镞于孟霜之山，集于彭城之东，余势逸劲，犹饮羽于石梁。然则蠡台即是虎圈台也，盖宋世牢虎所在矣。晋太和中，大司马桓温入河，命豫州刺史袁真开石门，鲜卑坚戍此台，真顿甲坚城之下，不果而还。蠡台如西，又有一台，俗谓之女郎台。台之西北城中

有凉马台，台东有曲池，池北列两钓台，水周六七百步。蠡台直东，又有一台，世谓之雀台也。城内东西道北，有晋梁王妃王氏陵表，并列二碑，碑云：妃讳粲，字女仪，东莱曲城人也。齐北海府君之孙，司空东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嫁于司马氏，泰始二年妃于国，太康五年薨，营陵于新蒙之，太康九年立碑。东即梁王之吹台也，基陞阶础尚在，今建追明寺。故宫东即安梁之旧地也，齐周五六百步，水列钓台。池东又有一台，世谓之清冷台。北城凭隅，又结一池台。晋灼曰：或说平台在城中东北角，亦或言兔园在平台侧。如淳曰：平台，离宫所在，今城东二十里有台，宽广而不甚极高，俗谓之平台。余按《汉书·梁孝王传》称：王以功亲为大国，筑东苑，方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复道自宫东出杨之门，左阳门，即睢阳东门也。连属于平台则近矣，属之城隅则不能，是知平台不在城中也。梁王与邹、枚、司马相如之徒，极游于其上，故齐随郡王《山居序》所谓西园多士，平台盛宾，邹、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屡陈，是用追芳昔娱，神游千古，故亦一时之盛事。

据考古发现，宋国故城城墙上部发现有汉代夯土墙，这用考古材料证明了汉代梁国睢阳城是在宋国故城城墙基础上修建使用的，即宋国故城与汉代睢阳城城墙是基本上重叠的，两座城基本上在同一个城圈内，城周长为 12985 米，面积 10.5 平方千米。北魏酈道元所写的睢阳城，肯定是汉代的睢阳城，那么，我们就可以以考古发现的宋国故城（老南关古城）城圈为

座标，去考证梁孝王“古吹台”的具体位置。

据以上记载，睢阳城南门叫卢门，南城门外有卢门亭，城内有蠡台，又叫升台，寓意步步高升，进南门应能立即看到，应在离南门不远正北方向；蠡台西边不远有女郎台；蠡台西北城中有凉马台，则凉马台应在西城门内附近，凉马台东面有曲池，池北有两个钓台，此钓台有可能是宋国蒙人庄子的钓台。蠡台正东不远有雀台，雀台附近有一条横贯城东西的大路，大路北面对应雀台的地方有晋朝梁王妃王氏墓，墓前并列两块石碑。陵墓东面就是汉梁孝王的“古吹台”，台址和台阶柱础保存完好，台上现在建了追明寺。至此，梁孝王古“吹台”位置酈道元标注的已十分清楚。即以考古发现的宋国故城（老南关古城）位置示意图来看，商丘梁孝王“古吹台”的位置应在现在正考古发掘的唐代睢阳城南门（汉睢阳城东南门）和今天商丘古城南门连线的中间位置靠东边一带，也就是今天古城南湖以南、华商大道以北、商鹿快速路以东、紫荆路以西的地带。杜甫他们在这里登上吹台，东望芒砀山烟云，追思汉高祖伟业，“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是十分符合全诗意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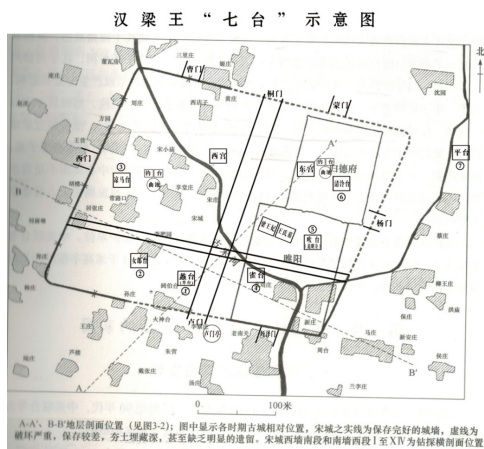
《左传·庄公十二年》载：“遇大宰督于东宫之西，又杀之。”说明汉梁都睢阳城内有东宫建筑，那么按照汉制也应该有“西宫”建筑，另外见于史载的睢阳城里居有“南里”等。《水经注》“故宫东即安梁之旧地也”即是梁孝王的东宫，“周五六百步”，东宫外有水池、钓台、清冷台，睢阳城外东北有平台，是梁孝王的离

宫所在。至此，酈道元《水经注》所载梁孝王所建“七台”全部到齐，即蠡台（升台）、女郎台、凉马台、雀台、吹台、清泠台、平台，方位十分清楚。

《北征记》讲“凡二十四门”是指宋都睢阳城城门。《左传》记载的睢阳城门名称有卢门、杨门、鱼门、蒙门、垓泽门、曹门、桐门、桑林门等。清光绪《归德府志》卷十一记载各城门的位置：“府城，春秋宋国城也，其城东门曰杨门，又东北门曰蒙门。南门曰卢门，东南门曰垓泽门，西北门曰曹门，北门曰桐门，又外城门曰桑林门。”根据以上及《水经注》所载，睢阳城内贯穿东西的大道至少有一条。南北大道至少有南门至北门的一条。城内东门至西门，东南门和东北门，西南门和西北门有无直通大道没有记载。《水经注》载南门即卢门城里边不远有东西大道。据此，梁王所建“七台”及东、西宫殿具体位置示意图如下：

长安万里火出圈，高适故居寂寞冷。以上来看，我们应该抓住《长安三万里》电影热播的历史机遇，尽快策划论证“商丘古城高适故居暨汉梁王吹台”文旅项目，同时把“李白故居项目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项目放在一起来打造，把高适、李白、杜甫同游梁宋、共登吹台、饮酒赋诗、“千金买壁”等历史情景再现。位置就选在目前正在考古发掘的唐代睢阳城南门（宋国故城东南门）发掘现场一带，或者放在已发掘出的东周古井附近，这有可能就是高适“凿井卢门边”的生活用井，并充分利用已有考古成果和发掘现有工程，做好顶层设计，策划、设计、打造商丘古城一个新的文旅融合高地和旅游亮点。

（作者：贾建涛，商丘演艺集团副总经理）



注：根据宋国故城（老南关古城）遗址位置示意图制

壮悔堂、李香君、李姬园史迹钩沉

◎张学勇

一、侯方域的读书楼壮悔堂

壮悔堂位于商丘古城刘隅首东一街路南，是明末才子、《桃花扇》的主人公侯方域读书和著书立说的地方。清康熙四十四年《商丘县志》载：“侯氏壮悔堂，尚书恂子方域读书处，在刘家隅首东。所有杂庸堂、翡翠楼者，亦即此处。”壮悔堂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面阔5间，明三暗五，前出后包，上下两层十分壮观。东西楼各三间，过厅五间，均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其青砖堞瓦，明柱净窗，古朴典雅，是一处四合楼院建筑群，更是商丘古城现存“八大家”建筑风格的典范，距今已有三百七十多年的历史。

2006年6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批准其为古代暨近代居民间建筑保护项目。

壮悔堂的堂楼上下两层，宽20米，深10.12米，由上下贯通的4排（每排6根）圆柱和88根栋梁交织而成木间架结构。青砖堞瓦，门窗木雕剔透，柱角有龙凤浮雕，瓶式栏杆环立，庄重别致，古朴典雅。堂楼名曰壮悔堂，是主人念其一生的坎坷经历，表示壮年悔恨之意。

位于壮悔堂两侧的东西配楼，东为侯方域元配夫人常氏所住，西楼为翡翠楼。两楼均面阔三间，上下两层。20世纪90年代按原式样结构修复，其建筑风格与壮

悔堂浑然一体。翡翠楼后有古井一眼，名曰“神惠”，为侯方域所凿。现存壮悔堂前有一过厅，面阔五间，硬山式砖木结构，始建于明末。此堂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它教给人的是聪明才智，阐述的是一条永恒的真理。

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号雪苑，明末清初归德府城人。出身于仕宦家庭，明末时被称为天下“文章魁首”。祖父侯执蒲，明天启年间（1621-1628）官太常寺卿，因反对宦官魏忠贤专权，而被罢官归乡。叔父侯恪，天启年间（1621-1628）也受阉党迫害，崇祯年间（1628-1644）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父侯恂，天启年间（1621-1628）累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崇祯初年（1628-1644）迁太仆寺少卿，复以兵部侍郎视师昌平，督练兵马，后又迁户部尚书，中间两次入狱，在明代末年的军事中有一定地位。侯方域的祖父和父辈都是明末东林党人，因而倍受阉党的迫害。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使侯方域很早就很关心国家形势，而且痛恨阉党，这对他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侯方域自幼天资聪颖，少年时期在家乡东园读书，当时其祖父侯执蒲已罢官归乡闲居，对方域兄弟管教甚严。方域博闻强记，八九岁时即能诗文，乡人誉为“神童”。崇祯元年（1628）冬，方域时年11岁，

即随父至京师，拜国子监司业倪元璐为师。侯方域后来在《倪涵谷文序》中曾写道：“余少游倪文正公之门，得闻制艺诸论。公教余为文，必先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崇祯五年（1632）春，侯方域15岁，回乡应童子试，县、府、道皆第一。当时他已经是才华横溢，常慷慨扬眉，议论国家大事，为文若不经思，下笔千言立就，为商丘雪苑社诸子所称道推服。17岁时，侯方域又随父至京师，曾代父草拟《屯田奏议》，广征博引，洋洋近万言，表现出了经世治国的杰出才能，名声播誉公卿间。此后他便出事公卿，交往士林，逐步走向了社会。

崇祯十二年（1639）夏，侯方域赴南京应举，寓居南京。他这次应举，虽以策语触犯时讳而落第，但却使他结交了许多文坛名士，成为了南京城的知名人物。当时四方文士云集南京，方域以其雄才豪气，挟重金结交。太仓人张溥创复社，青浦陈子龙主盟几社，两社成员皆东南名流，共同推重侯方域，因而海内名士皆以结交侯方域为荣，侯方域名声大噪，与陈贞慧、冒襄、方以智并称为“复社四公子”，一时主盟江南会社。他们好名节，持议论，品核执政，裁量公卿，以东都清议自持，成为了当时南京城中左右舆论的主要力量。在这之前，阉党余孽阮大铖罢官后也寓居南京，时时想谋求东山再起，复社名士陈贞慧、吴应箕等起草《留都防乱公揭》，揭露阮大铖的丑恶面目，使之潜迹牛首山，不敢再入南京城。阮大铖正在无可奈何之际，恰巧侯方域来到南京，因侯方域与复社名士陈贞慧、吴应箕等人交情甚厚，而且阮大铖与方域父侯恂为同年进士，因而

阮大铖就遣其门客来拉拢侯方域，想让侯方域从中说项，求解于南京清议，遭到了侯方域的断然拒绝。阮大铖也由此衔恨侯方域。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马士英、阮大铖一伙对复社文人恨之入骨，一旦重掌大权，便大兴党人狱，捕杀东林党人和复社人士。这时清兵已经入关，侯方域便逃往扬州史可法军中，史可法让他到兴平伯高杰军中任监纪推官，随高杰北上抗清。清顺治二年（1645）正月，高杰为降清将领许定国所杀，侯方域又返回江南，不幸在宜兴被阮大铖亲信捕获，囚于南京。四月出狱，重返扬州史可法军中，后清兵渡淮，史可法见扬州难守，促侯方域离开扬州逃生。侯方域又在江南流连，但清兵很快又占领江南，侯方域不愿降清，只好返回故乡隐居。

侯方域返回商丘后，又曾派家人前往江南打听消息，得知江南复社人士所组织的抗清斗争大都失败，只好安心归隐。他和复社友人相约，终身不仕清朝，以保持晚年名节。后来，他和贾开宗、徐作肃、徐邻唐、徐世琛、宋荦等人重振雪苑社，痛吟悲歌，抒发内心的郁积，而专心于诗歌古文创作。顺治八年（1651），侯方域参加了河南乡试，被录取为副榜贡生。后来有人据此指责他“失节”，其实侯方域这次参加乡试是被逼无奈的，而且他此次应试并未完卷，所以仅中副榜。李敏修《侯方域传》云：“顺治初，河南巡抚吴景道廉知方域豪横状，将案治。宋权方家居，从容语景道曰：‘公知唐有李太白、宋有苏东坡乎？侯生，今之李、苏也。’景道

笑而止。或谓当世欲案治方域以及其父恂，有司趋应乡试乃解。顺治八年中副榜，实未完卷也。”侯方域虽然用“未完卷”的方式，拒绝被录取授官，但这之后，他仍然非常懊悔，因于顺治九年（1652）筑壮悔堂以明志。至顺治十一年（1654）抑郁而死，年仅37岁。侯方域以散文见著于世，他和魏禧、汪琬被时人称为“国初三大家”。当时，王士禛论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远近无异辞。”

侯方域一生坎坷，这和明代末年那个动乱的时代及朝政的腐败是密切相关的。他在政治上有真知灼见，对当时国家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今天下之患，殆有不可言者，内之寇、外之边是也。愚以为寇之患，非寇能为患也，患在任寇事者，武臣养祸以自利，文臣文饰以避害；边之患，非边能为患也，患在任边事者，因循而不知变计，畏缩而不敢奋发。当夫寇之起也由于民贫，民贫由于赋重，赋重由于增兵，增兵由于备边；迨夫边事之坏也由于兵弱，兵弱由于饷薄，饷薄由于粟不登，粟不登由于田荒而民多为盗。”（《南省试策四》）他特别痛恨当时吏治的腐败，他说：“古之驭吏胥也，必有选而任之之道……今则不然，奸滑者为之，无赖者为之，犯罪之人为之，缙绅豪强之仆、逃叛之奴为之，吏胥之子孙相沿袭、亲若友相援引者更迭为之。……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夥，每县殆不止千人矣。以三百计，是一城社中而有三百狐与鼠，一郊原之中而有三百虎与狼也。其凶焰之所及者，或代之役、代之税，或无故而鱼肉、有事而勾摄。”（《额吏胥》）而造成吏治如此腐败的原因又在于朝廷用宦官而不用真正

的人才。他在《宦官论》中详细论述了宦官专权是当时朝廷起祸的根源。他说：“夫宦官，日奔走于人主之前，伺其喜怒，而乘意窃发，出则扬言于众曰：‘是主上之所欲也！’……宦官之邪媚煽惑甚似于狐，假人主之声名以为皮毛，借人主之威权以为爪牙，天下焉得不畏之哉！”他把国家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朝廷扫荡权阉奸佞而任用贤才上，但他的这种进步主张却为当朝的权阉奸佞所不容，他所崇拜的东林党人屡遭迫害，他所在的复社在朝廷中又不占优势，所以他每次应试都因文章触犯时讳而落第，他虽然忠于朝廷、关心国事却怀才不遇，他为挽救明朝的危亡而奔走疾呼，却还要时时躲避权阉的追捕。他坚守民族气节，不愿出仕清朝，但又不得不为自己和父亲免遭“案治”而应试，他虽然以不完卷的方式躲避了清政府的录取授官，但还仍以没有“全节”而懊悔终生。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他虽然还有着种种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他的人格还是光明磊落的。

壮悔堂前的西楼名为翡翠楼，也叫香君楼。据说，侯方域当年去南京赴考期间，曾经人介绍，与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相识，两人一见钟情，演绎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友谊和爱情。陈其年在《妇人集》说：“姬（香君名姬）与归德侯方域善，曾以身许方域。设誓最苦，誓辞今尚存湖海栖篴衍中。”他在《答田中丞书》说：“仆之来金陵也，太仓张西铭偶语仆曰：‘金陵有女妓，李姓，能歌《玉茗堂词》，尤落落有风调。’仆因与相识，间作小诗赠之。未几，下第去，不复更与相见。”据陈贞慧的后人说，陈家和侯家是世亲，陈家世

代传承说，李香君不知原来姓甚名谁，本为一武将之女，因其父被阉党陷害而被抄灭全家，她侥幸被人搭救得以活命，后来沦落为妓，因依靠侯方域报国恨家仇的愿望破灭，自尽于南京葆真庵。据说，侯方域得信后将其尸骨和遗物解来归德，尸骨葬于李姬园，遗物存放于一座楼中，并塑香君像以纪念，因此有了香君楼。

二、侯方域与雪苑社

雪苑社是明末清初活动在商丘一带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西汉梁孝王所筑东苑，后人称为梁苑或兔苑，南朝宋著名文学家谢惠连曾作《雪赋》咏梁苑，故又有“雪苑”之称。明末商丘文坛名流慕昔日梁苑风雅，又钦佩谢惠连的才气，于是组织文学社团，便命名为“雪苑社”。

雪苑社当成立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据《侯方域年谱》“崇祯十三年”条下载：“司徒公（侯恂）系狱，公归自金陵，主雪苑社。”在此之前，《侯方域年谱》中未见有关于雪苑社的记载。雪苑社最初的成员是徐作霖、刘伯愚、吴伯裔、吴伯胤、贾开宗、张谓、侯方域等，全是商丘名士，由侯方域主持，经常研讨诗文。崇祯十五年（1642）三月，李自成起义军攻入商丘，徐作霖、刘伯愚、吴伯裔、吴伯胤、张谓等人皆死于战乱，雪苑诗陷于瘫痪。清顺治八年（1651）秋，侯方域重建雪苑社，除他和贾开宗二人外，又有徐作肃、徐世琛、徐邻唐、宋荦四人加入，称为“雪苑六子社”。此后，社事日多，诸子往复辩质，谈诗论文，并与各地文坛名士多有交流，使商丘文坛日趋繁荣。王士禛《西山倡和诗序》云：“朝宗

（侯方域）之文，牧仲（宋荦）之诗，自当抗行中原。梁园风雅，自邹、枚、庄忌夫子之徒，于今为盛矣。”

三、壮悔堂的建筑风格

壮悔堂的建筑，青砖堊瓦，明柱净窗，古朴典雅，是商丘古城现存“八大家”建筑风格的典范。整个建筑为明清硬山式砖木结构建筑群。整体建筑有基座、屋体、屋顶三大部分组成。

一）壮悔堂的建筑基座

壮悔堂的基座又称台基，在房屋的底部，建一个四面砌砖，里面填土，上面墁砖的长方形台子。具有承重、加固、保护房屋作用，也是等级地位的象征。有道是：“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引自唐李白诗）

基座，在古代典籍里被称作“堂”。《墨子》说：“尧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这是讲建造，是典籍里出现最早的建造。《礼记·礼器篇》说：“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早期基座，就是一个土台子。基座按外部样式可以分为平素座和须弥座两种。平素座多见于等级较低的建筑中；须弥座常用于宫殿、庙宇、牌楼等建筑。壮悔堂的基座为平素座，是用素土或灰土或碎砖三合土夯筑而成，约高一尺多。

二）壮悔堂的建筑屋体

壮悔堂的建筑屋体是由柱础、柱子、大梁、栏杆、雀替、门窗等部分组成。

壮悔堂的柱础是中国建筑构件的一种，俗称礅（sǎng 柱子底下的石墩）盘，或柱础石，它是承受屋柱压力的垫基石，这种木架结构的房屋，可谓柱柱皆有，缺

一不可。这种柱础的功用，一是为使落地屋柱不使潮湿腐烂，在柱脚上添上一块石墩，就使柱脚与地坪隔离，起到绝对的防潮作用；二是加强柱基的承压力。壮悔堂的柱础是圆鼓式的，以简化、单纯的形式稍作调饰，但图案则崇尚简朴，为清代流行的风格。因此，古代对础石的使用十分重视。有道是：“谁悲础柱起沉埋，残阙巍巍慢台阶。城背西风空霸业。潮回东水涨秦淮。六朝休恨歌遗曲，千古无非梦绿槐。壁上依然王谢燕，年年归省自天涯。”

壮悔堂的墙与柱构成房屋建筑立面的组成部分，这种建筑三面围墙，正面为木质楹柱与门窗，左右墙面称为山墙。四根木头圆柱围成的空间称为“间”。建筑的迎面间数称为“开间”，或称“面阔”。建筑的纵深间数称“进深”。一般以奇数为吉祥数字，所以平面组合中绝大多数的开间为单数，每两根立柱之间为一间；而且开间越多，等级越高。

壮悔堂的柱子是建筑物中用以支承栋梁桁架的圆形构件。工程结构中主要承受压力，用以支承梁、桁架、楼板等。有道是：“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引自北宋苏轼诗）

壮悔堂的柱子分两大类，一类叫立柱，顾名思义就是站在地上的柱子。包括抱厦柱和里面的立柱。还有一种短短的，站在下层大梁上，托着上层大梁的叫童柱，意思是没长大的柱子，也有叫金瓜柱、金柱。柱子按位置来分，由柱头、柱身和柱础三部分。

壮悔堂的大梁是柱子之间横向水平的支撑，要是没有大梁撑着。柱子就要东倒

西歪了。清代管垂直于建筑物正面的叫梁，平行于建筑物正面的叫枋。

壮悔堂的栏杆，中国古称阑干，也称勾栏，是建筑上的安全设施。栏杆在使用中起分隔、导向的作用，使被分割区域边界明确清晰，设计好的栏杆，很具装饰意义。清代的木栏杆比较纤细，以榫接为主。

壮悔堂的雀替是中国建筑中的特殊名称，安置于梁或阑额与柱交接处，承托梁枋的木构件，可以缩短梁枋的净跨距离。也用在柱间的挂落下，或为纯装饰性构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梁头抗剪能力或减少梁枋间的跨距。清代称为“雀替”，又称为“插角”或“托木”。这种雀替的装饰作用往往大于结构作用。

壮悔堂的门，在字典上是这么说的：“门，建筑物的出入口或安装在出入口能开关的装置，是分割有限空间的一种实体，可以联系和阻断两个或多个空间的出入口。”

在官场上说：“门第、门风、门望、门楣”。这些形容词往往是一个家族的表征。在媒婆儿嘴里说：“门当户对”，“小门小户”。这意思是说，男女两家的出身一样，或者说某一方出身低微。在老百姓嘴里说：“没门儿！”这个意思是指一件绝无可能的事。而且这口气拒绝得很干脆的。若有妄人问别人借老婆，得到的基本是这种回答。八成还得加一个大耳光。可见，“门”这东西无论作为实体，还是虚无的意义，都是很重要的。壮悔堂的门具有室内、室内外交通联系交通疏散的作用，也具有通风采光的作用。

壮悔堂的窗具有通风、采光作用，也具有观景眺望的作用。

三) 壮悔堂的建筑屋顶及其附属

壮悔堂的屋顶对商丘古城建筑的形象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种传统建筑的屋顶,在中国建筑之林更是独树一帜。使建筑物产生独特而强烈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可以说壮悔堂的屋顶是商丘古城建筑的另一个立面。

壮悔堂的屋顶采用施工弯曲的屋面。一是为了排水和采光。雨水下到屋顶上,如果屋顶是直线的,那水就会老实实在地从屋檐往下滴答。你还没出门儿呢,先溅一脚水。可如果是曲面,下大雨时雨水就会沿着曲面被往外抛出。二是屋檐的下端抬起来一些,屋里进的光会多一些。三是为了好看。古人形容这样的屋顶:“如鸟斯革,如翬(huī 五色鸟的意思)斯飞”。意思是屋顶的起翘好像鸟儿展翅欲飞,很是轻巧。四是认为这种形式是受了古代车盖的启发。

壮悔堂的建筑采用硬山顶建筑。它是硬山顶五脊二坡,两侧山墙从下到上把檩头全部封住(屋顶左右屋檐不出山墙)。这种建筑是随着明清时期房屋墙壁广泛使用砖砌以后才大量采用的。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硬山式屋顶。具有硬山防风火的作用,在北方多使用硬山顶建筑。

壮悔堂的建筑屋顶上面好热闹。屋顶最上方为一条横向的屋脊,称为正脊。四条垂直正脊的脊,称为垂脊。垂脊上都有同样用来显示身份高低的走兽。他们一般有一位骑着凤的仙人带领,一字儿排列在屋角的垂脊上。这种顺序在北京故宫里是丝毫不能乱的。

壮悔堂的建筑屋顶垂脊上的走兽分别

是:凤、狮、押鱼、天马、海马。这些走兽品种也多不一样,表情却都是木木呆呆的,太听话的样子。

为什么要弄这些小东西呢?好玩吗?其实它们是带着重大任务才不辞辛苦地站在上面的。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有走兽的垂脊是有坡度的,在这种地方安放筒瓦,一个不留神是要溜下去的。于是这里的筒瓦在制作时就预留了一些小洞,以使用大钉子把瓦钉在下面的泥背里。但外露的钉子不但不好看,而且容易生锈。用这些小东西当钉子帽,又好看又可以显示建筑等级。也就是说,他们身兼两职啊。

比走兽更加夺人眼球的,大概要算是正脊上的正吻了。正吻是身兼三职的:一方面,几个方向的屋面集中到屋脊的两头,需要有东西把衔接处捏在一起;另一方面,为了美观;还有一条,古时候建筑物经常遭雷劈而毁于火灾。那会儿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年)还没出生,人们不明白雷其实是电,是可以金属线疏导到地下(避雷针)。可是古人知道水可以灭火,于是在屋顶的最高处放上一条大鱼,象征水,人们就安心多了。

壮悔堂屋顶上的瓦当是一种装饰,也属于屋顶的范畴。瓦当就是最前面的一块筒瓦前的那个圆片片。瓦当上的花纹各朝各代都很重视,不厌其烦地铸造他们。这带来一样好处:考古学家们一看瓦当,大概就能判断出建筑物是哪朝哪代的来。

总之,屋顶垂脊的外端排列着一系列脊饰,最外面是若干个小动物称为蹲兽,最后面龙头状的,称为垂兽。壮悔堂屋脊上的鸱吻、蹲兽、垂兽,这是明清古建筑所共有的。

四、壮悔堂典范的雕刻艺术

壮悔堂典范的雕刻艺术是特别值得我们欣赏的，其木雕为徽派艺术精品，内容丰富，工艺精湛，寓意深刻。特别是前檐下的额枋上，采用镂空木刻艺术，其动物造型逼真，栩栩如生，寓意深刻，反映了官宦之家追求“富贵安康”、“祥和兴旺”的思想意识。

一）门饰雕刻

从门饰内容就能看出房主人对中国传统观念和文化艺术魅力的敬仰。壮悔堂明间和两侧次间门上部榻(gé)花心板以“灯笼锦”形式布局，门下部裙板饰以简洁的“双枝卷草纹”，中绦环(腰)板和上下绦环板均为简洁的环绦纹。左右两梢间的门上均刻有透雕的“蝙蝠衔钱”图。上榻(花)心中间深雕“福、禄、寿、喜”图饰。中间绦环(腰)板为“梅、兰、竹、菊”浅浮雕，下裙板浅浮雕为“渔、樵、耕、读”图案。东侧梢间右扇门榻(花)心为“加官进禄”图，周围扣以“卍”(wàn)字纹门棂(líng 旧式窗户的格子)，绦环(腰)板刻有“竹叶”图，下裙板为“农夫出耕”图。右扇门榻(花)心为“天官赐福”图，天官怀揣如意，仙童引领蝙蝠。腰板雕以“兰草”图饰，下裙板为“樵夫进山”图。西侧梢间左扇门榻(花)心“寿星赐桃”，不老松下老寿星手捧仙桃微向前倾，仙童持扇服侍，十分亲切庄重。绦环(腰)板上的“寒梅”图与下面裙板上的“书生走读”上下呼应，表现了古代文人艰辛求学的历程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明间檐柱与阑额（檐枋）间及两侧配楼雕刻

当我们面对壮悔堂，明间檐柱与阑额

（檐枋）间的三角形雀替，别具一格，吸引着众人的目光。这种雀替面积大，结构简洁，支撑作用强，十分少见。位于上下明间的四个雀替为浅浮雕“鳌鱼喷花”图饰，两侧次间上下皆为“凤凰展翅”图。鳌鱼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动物，生长在大海之中，传为龙子。另外，在木结构上使用鳌鱼图案还标志着有灭火功能。两侧次间上下雀替上为浅浮雕的“凤凰展翅”图案。凤凰，又名丹鸟，火鸟，威凤等。古代称为瑞鸟，传说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象征祥瑞、和谐、美丽和幸福。所以，两侧配楼上的雀替也都饰以同样图案，折射出当时士大夫家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追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美好愿望。

三）前过厅檐下雕刻

前过厅建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其木雕为徽派艺术精品。特别是前檐下面额枋上垫板间云朵盘形的木雕，动物花鸟栩栩如生，饱含寓意。

“鹿鹤同春”图 位于明间的中间一组为“鹿鹤同春”图，鹿鹤同春又名“六合同春”，鹿与陆谐音，鹤与合谐音，六指：天、地、东、西、南、北，天下万物皆春的意思。花丛中一只奔跑的白鹿回首紧衔一枝灵芝，一仙鹤腾空俯视。相传鹿鹤同卫仙草灵芝，象征长寿。鹤还解释为与“贺”谐音，鹿与“禄”谐音，所以又寓意“贺禄”赐福。

“马到成功”图 在“鹤鹿同春”左侧为“马到成功”图，马为古今将士之无言战友，在唐代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李世民的“六骏”犹如战神的代名词。古代

有“天马行空”“马上封侯”“马到成功”的谚语。

“麒麟送子”图与“马到成功”对应的右侧是一幅“麒麟送子”图，麒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动物，称之为“仁兽”，象征吉祥，寓示天下太平。

“福寿双喜”图与“喜事连枝”图“麒麟送子”图东侧次间中间一组为“福寿双喜”图，图中葱葱芙蓉花饱含“福”意，一双回首对望的“绶带鸟”，寓意“福寿双全”。位其左侧为“喜事连枝”图，图中的喜鹊展翅俯视缠绵的连枝花草，寓意“喜事连连”。

“锦上添花”图与“双狮戏球”图与“麒麟送子”图对应的右侧是一幅“锦上添花”图，昂首欲飞的锦鸡与盛开的淡黄色花瓣是前程锦绣的意思。东侧次间作为上首呈现的是一组以鸟寓情的场景，是否表达着主人对于爱情的忠贞和留恋。西侧次间正中一组为“双狮戏球”画面，一雌狮引领一小狮子戏耍。狮谐音“世、师”寓意“官登太师”“世世平安”等。

五、壮悔堂的故事多

我对壮悔堂的了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原商丘县一高读书时，听我的语文老师侯有祺讲的侯方域的故事。

一）巧做葫芦诗

听侯有祺老师讲，明清时期，归德府城里出了个侯才子（侯方域），聪明超人，读书过目不忘，7岁能诗。因此，不仅他的老师喜欢他、器重他，而且在街坊邻居面前也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孩子。后来又听他讲到侯方域巧做葫芦诗的故事：

有一次，几个在菜园里种菜的和尚到

路旁的葫芦架下休息，正在说笑，忽然看见侯方域下学时路过。和尚们都乐了，因为这孩子有趣得很，平常无论谁拦住让他作诗，只要你能出上题来，他不但作得很快，而且作得很妙，总是出人意料之外。

侯方域从学堂里出来，肚里饿得咕咕叫，巴不得一步迈到家吃个菜香饭饱，却偏偏碰上这几个和尚并排儿站在那里，堵住了去路。侯方域知道他们又要缠他作诗，便央求道：“师父们行行方便，放我过去吧。”他用手拍了拍肚皮，有趣地说：“常

（肠）家正和杜（肚）家打架哩，我得快找范（饭）家拉架哩！”和尚们一听，不禁一愣，什么“常家”“杜家”的，哪儿有人打架呀？他们一转念，才忽然明白了：原来是他肚里饿了，急着要回家吃饭呢。有的说：“这小家伙差点儿把我们给蒙混住了！”他们更不放他走了，一齐上去把他拽住，说：“不怕你拽文，不给我们作几句诗听听，常（肠）家跟杜（肚）家打掉头，也不准你回家吃饭！”侯方域没法儿，只好跟他们来到葫芦架下，无可奈何地说：“出题吧。”和尚们把东、西、南、北，天上地下瞅了一遍，也没有想出好题目。忽然一个和尚指着头上的葫芦架说：“我看就以这葫芦架为题好了。”

侯方域抬头一看，见满架的葫芦藤和那一簇簇肥大的葫芦叶儿把这小小的葫芦架遮得严严实实；几个已长得发白的大葫芦垂下来，闪闪发光。和尚们的光头一仰，碰得那肥大的葫芦摇摇晃晃，非常有趣而可笑，他高兴得一捂鼻子，差点儿笑出声来。心中暗道：“好题好题！我每次从这儿路过，这些和尚都要找我的麻烦，实在令人讨厌！我趁他这题目，正好作几句诗

要笑要笑他们！”他怕和尚们听了诗之后不放过他，便先和他们讲下条件：“我若作出诗来，你们得马上放我回家吃饭，不许再缠我。”和尚们都道：“那当然，把诗作出来，你情跑你的！”

侯方域眼珠儿一转，望着葫芦架作起诗来：“葫芦架上葫芦藤，葫芦架下葫芦明。葫芦碰住葫芦头，葫芦不疼葫芦疼。”

和尚们一听，都连连拍手称妙。他们正竖着大拇指你一句我一句地称赞这诗作得好，忽然一品味：不对，这不是在戏弄我们出家人吗？都要抓侯方域算账，谁知侯方域在他们的称赞声中早已跑远了。这一故事说明了侯方域是何等的聪明，怪不得他后来诗文出类拔萃。

二）侯方域“吃书”

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侯有祺老师给我讲了多年来流传着一个童话般的故事：侯方域“吃书”的故事。

读书人若能把书吃到肚里，对书的内容就能永远不忘。这故事原来发生在我国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侯方域身上。

侯方域幼年时候，归德古城有人要到江南买书，侯方域的父亲听说了，让侯方域跟人家一同去。谁知，等侯方域同人家一起从江南返回来，连一本书也没带回家。父亲疑惑地问：“没买吗？”他笑笑回答：“买啦。”“书呢？”他拍拍肚皮：“都在这儿呐。”

父亲有些不耐烦了，心想：这孩子在我捣什么鬼？问道：“难道你把书吃了不成？”侯方域抿嘴笑说：“也算是孩儿把书吃了吧。”父亲更是不解。

侯方域恭恭敬敬地给父亲解释说：“俺老师曾经对我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

如抄书。意思是自己把书买到手里，就会认为反正书是我的了，我什么时候看都中，因此装到箱子里好长时间也不看；如果借人家的书，因为到时间还得还人家，就会抓紧时间看；如果自己读书很用心，生怕以后再温习时借不到这本书，就下功夫把书抄下来，这样对书的内容就记得死一些。孩儿觉得抄书还不如‘吃书’哩。若能把书背得滚瓜烂熟，就算是把书‘吃’到肚里了，啥时候也不会忘。”

原来，他从江南买了书以后，回来的路上，趁乘船和骑马的工夫用心地读啊，读啊，读完一本扔一本，再读完一本，再扔一本，到家了，书也被他扔完了。

父亲不解地问：“你为什么要把书扔掉呢？”

他回答说：“如果我把书带回来，就会觉得现在记不住，以后还能再读，懒得下狠劲儿，干脆把书扔了，堵死我脑子里懒惰的路儿”。父亲点点头，但对他还不完全相信，又问：“你真都背下来了吗？”他说：“听我给你背来。”说罢，一本一本地背起来，父亲听了，高兴地夸奖他说：“这孩子记性真好！”他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肯下苦功，谁都能记得住。”

从此，侯方域“吃书”的故事便在家乡传开了。

三）衣袋里的秘密

还有一个故事是衣袋里的秘密。史书上有很多关于侯方域才思敏捷的记载，说他“为文若不经思，下笔千万言立就”。他为什么会这样聪明呢？要知其中原因，听我讲一个关于他作诗的故事。

有一次，侯方域出去游玩，遇到一班

文人学士，大家知道了他是归德才子，便纷纷拥过来，邀他对诗。侯方域欣然应邀。在对诗当中，有的诗来得很快，但诗意浅薄，干燥乏味；有的诗句虽然相当美，但拉得时间太长；还有的上半篇做得不错，下半篇却凑合不上。轮到侯方域，不但出口成章，诗句精美，而且构思巧妙，寓意深远，耐人寻味。参加对诗的人个个佩服，旁边观看的也都赞不绝口。

对诗结束后，人们还都舍不得离开，纷纷议论：“侯才子的诗为什么做得这样快，又总是这样好呢？”一时谁也解不开这个谜。于是大家都悄悄跟在侯方域的后边，仔细观察，只见侯方域辞别众人而去，一路观鸟赏花，有时仰首高视，有时低头沉思；有时取出纸笔，奋笔疾书，并把记下东西的纸条一个个都塞进衣袋。大家赶上前去，向侯方域施礼道：“侯兄慢走，众弟兄有一事相求……”要求看他的衣袋。侯方域毫不避讳，掀开衣襟，任他们看去。众人见侯方域衣服上这个口袋，比平常人的衣袋要大几倍；用手一掏，里边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纸条儿，拿出来一看，上边写的都是诗句，有的是整篇，有的是半篇，有的仅开个头，有的没头没尾，只写了中间两句。人们看了，恍然大悟：怪不得人家那好诗就像在嘴边挂着似的，原来他随时都在深入思考，勤奋积累啊！

关于壮悔堂的故事，我记在还有：小小归德四尚书、谁配要大的、杂庸堂、“只因留都少光明”、“天下第一才子”、嫁妹、画虎、写“当铺”、小才子智取金元宝、小才子焚帐戏掌柜、小才子拦轿戏知府、柳敬亭和侯方域交朋友等故事。

六、李香君与李姬园

李香君（1624—约1652），苏州人。本姓吴，名香，字香君，秦淮名妓，李贞丽之养女。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士大夫贤否。香君身躯短小，洁白如玉，丰神俊婉，调笑无双，人送绰号“香扇坠”。明朝末年，李香君与陈圆圆、马湘兰、寇白门、卞玉京、董小宛、顾横波、柳如是被称为“秦淮八艳”。李香君曾在秦淮河与商丘才子侯方域相识，力劝方域勿与阮大铖接近。方域下第离南京时，又置酒送行，暗示他应爱重名节。后巡抚田仰仗势让她接待，她坚决拒绝。南京失陷，李香君曾去栖霞山投奔卞玉京，自尽于南京葆真庵。据说，后侯方域将其尸骨葬于归德府南李姬园村东。现有香君井和香君墓等。2011年4月，李香君墓被商丘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商丘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侯方域为其立碑，上书“李香君之墓”五个大字，并题一联：“卿含恨而死，夫惭愧终生。”碑前有一石桌，桌前有一圆形“愧石墩”，侯方域经常去香君墓，坐在愧石墩上久久不忍离去。

（作者：张学勇，商丘市睢阳区政协三级调研员，商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商丘地名来源与文化内涵探析 ——说商与归德

◎薛立芳

商丘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其地名曾多次变革，前后共使用过11个地名，其中多与商族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商、宋、商丘、归德等名皆与商族或商代祖先有关，表明商丘为商文化之发源地并且有着长久持续的影响力。长期以来学界主要集中对于这些地名最初来源与所指之区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地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则鲜有论及。本文拟对商丘历史上“商”及“归德”地名之由来及其文化内涵进行辨析，希望能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商丘的历史，了解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阙伯与商丘火文化内涵——尊天道、敬人事

阙伯与商丘火文化之史事主要见于《左传》的记载：

《左传》昭元年“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阙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阙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1]1217-1218}

《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阙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1]964}

《左传》昭公十七年：“宋，大辰之虚也，大火谓之大辰。”^{[1]1391}

著名史学家王国维先生据此三条材

料，说明早在春秋时期人们便认为阙伯所居之商丘在宋地，也就是今天的商丘地区。

^{[ii]327-328} 这一说法 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也存有不同意见。如孙淼先生在《古商丘考》一文中提出今商丘之名定于明代，上述三条材料仅能说明春秋时期宋国又称商或商丘，并不能证实封宋之前此地有“商”名。并且认为分野之说反映的是春秋战国时人的地理概念，而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常将宋与商混称，因而不能据此说明宋地早有商名。这样的质疑虽非无据，但也并不能完全推翻王氏的观点。孙先生又提出阙伯及相土所居之商丘皆为古商丘，并不在宋地，而在帝丘（今河南濮阳）。

但这一观点同样存在颇多疑点，其所据之材料同为《左传》，并无更早之材料佐证。^{[iii]222-228} 同样根据《左传》的记载，则可确证春秋时期人们不可能认为帝丘是为阙伯与相土祀大火之商丘。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

宋，大辰之虚也；陈，大皞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天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裨灶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鬯玉瓚，郑必不火。”子产弗与。^{[1]1390-1392}

长期以来，人们在讨论阍伯所居之“商丘”究竟在何地的问题时，常以王国维先生所举的三条材料为证，注重三条材料之间的关联性，但却忽视了材料的完整性。如果从整个事件来看，昭公十七年对整个事件的记载不仅说明春秋时人认为宋地星为大火，同时也说了卫地星为大水。阍伯居商丘祀大火与相土因之，商主大火这些记载历来是没有异议的，而所谓的“帝丘”卫地在春秋时人看来其星为大水，不可能为阍伯及相土祀大火的商丘。因而相比较而言，阍伯所居之商丘在宋地仍是较为可信的。

从阍伯时代开始，商丘便与火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后商人祖先相土继承了阍伯祀大火之职，商人便以大火星为主祀，宋地被视为与大火星对应的分野，即大辰之虚也。而传说中的燧人氏也被视为在这里活动。阍伯为火正，最初的职责主要是观测天象，观测大火星的运行规律来安排人们的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据郑杰祥先生研究，阍伯在高台上观测大火星的形象便是商字字形之最初来源。商字上从辛，像大火星象，下从丙，象高台。^[2]商字的最初意思即在高台上观测大火星。而阍伯之商丘二字也往往特指古观象台旧址。

址。

由于商族祖先相土后来继承了阍伯祀大火的职责，对自然规律的重视，对天的崇敬都成为火文化的重要内涵。商朝灭亡之后，火文化进一步发展，在宋地逐渐形成了结合天道与人事的新的火文化内涵。发生在春秋时期襄公九年的一件事特别突出地表现宋地的火文化内涵。

《左传》襄公九年记载：

九年春，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陈畚揭具，备水器；量轻重，蓄水潦，积土涂；巡丈城，缮守备，表火道。使华臣具正徒，令隧正纳郊保，奔火所。使华阅讨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讨左，亦如之。使乐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郈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备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宫、巷伯儆宫二师令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1]961-963}

这则材料记载了发生在宋国的一场大火灾，而宋国的执政面对火灾，沉着应对，举措得当，有条不紊。考虑到各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调度有方，秩序井然，不仅及时扑灭火灾，而且兼顾灾后秩序重建，及国家防卫等多方面的问题，将火灾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多国的注意。

《左传》襄公九年：

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陶唐氏之火正阍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公曰：“可必乎？”对曰：“在道。国乱无象，

不可知也。”^{[1]963-964}

由此可知当时人们认为宋国人作为商人的后裔，因此对火的规律有着非比寻常的认识。所以说“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火文化是商人也是宋人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这则关于火灾的记载则为我们揭示出了商地火文化新的内涵——尊天道、敬人事。宋人在充分了解火的特性及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正确的应对，这就是尊天道，充分了解自然规律。而在此基础上认真部署救灾工作，环环相扣，调度有方，各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职，充分体现了敬人事的特点，积极利用一切人力物力与灾难相抗争，这正是商丘火文化的深层次内涵，对我们今天的工作生活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契与商之玄鸟文化内涵——商祖文化

根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商人祖先契曾被封于商地。虽然关于商在何处还有争议，但商丘被视为商人兴起的的地方，是其文化圣地，西周封宋于此也正因其为商祖旧地。在商人追述祖先功业的史诗中，契被称为玄王。

《诗经·商颂·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诗经·商颂·长发》：

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

《史记》记载契为简狄吞玄鸟卵而生。

《史记·殷本纪》：

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尝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v] 91}

根据这些记载，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商人是以玄鸟为图腾的部落，而这一图腾亦是商地名之来源之一，认为商字象形鸟图腾，是其族名而转为地名。而这一点在《左传》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左传》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1]1386-1389}

根据这则记载东方少皞一族以鸟为图腾是比较可靠的，即使到了春秋时期人们仍然清楚地知道这段历史，因而孔子也要向郯子学习这一古代历史知识。商人追述其祖先为玄王也反映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因此玄鸟文化又成为火文化之后商文化的又一重要内容，玄鸟与商祖契有着密切的联系，玄鸟文化之内涵突出地体现在商祖文化这一概念中。

今日之商丘“商”字地标字形即是玄鸟之象形，玄鸟形象一方面追溯了商族的起源可能来自东方，而更为重要的是突出

了商丘为商祖之地的文化内涵，这也是商丘地区玄鸟文化的重要价值。近年来商丘兴建华商广场、举办华商大会等等文化活动皆是以此为依托发展的文化品牌，而玄鸟文化中包含的商文化对于宣传商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商丘地区悠久而神圣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是展示商丘历史文化的一张光彩照人的名片。

三、商汤与归德之文化内涵——因民之利，以民为本

“归德”是商丘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地名，后唐始用其名，其后经宋、金、元、明、清五代皆沿用归德之名，可见归德之名能够得到历代人们的认同，才能够一直沿用多朝。“归德”一名从字面上来看为人慕其德，从之而归之意。而商丘之地为何能够称得上这样的名字，并且历多朝而不换，这其中原因究是为何呢？

据《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载：“改宋州宣武军为归德军，汴州开封府复为宣武军。”^{[vi]421}新命宋州掌军为“归德节度使”。这位首任归德节度使为袁象先，《新五代史》之《杂传三十三》记其人：宋州夏邑人，父为梁太祖朱温妹夫，未尝有战功，仅因攻杀皇帝朱友珪，扶立梁末帝有功，镇宋州宣武军。“在宋州十余年，诛敛其民，积货千万。庄宗灭梁，象先来朝洛阳，辇其资数十万，赂唐将相、伶官、宦者及刘皇后等，由是内外翕然，称其为人。庄宗待之甚厚，赐姓名为李绍安，改宣武军为归德军，曰：‘归德之名卿设也。’遣之还镇，是见卒，年六十一，赠太师。”^{[vii]495}

虽庄宗语“归德之名卿设也”，

然“归德”之名显然并非因这位贪官买官之袁象先而起。但“归德”之名却由此沿用五朝未改，其缘由则要追述到商丘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位以仁德而闻名的贤王——商王成汤。商汤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曾经以商丘为根据地发展灭夏事业，文献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商汤仁德，天下归心的事迹。例如：

《孟子·滕文公下》载：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viii]148}

《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载：

昔者商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ix]171-172}

《史记·殷本纪》载：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5]95}

《逸周书·殷祝解》载：

汤将放桀于中野，士民闻汤在野，皆委货扶老携幼奔，国中虚。^{[x]1040}

商汤仁德为天下所称善，而有“诸侯归德”之名。《尚书·中侯》曰：“天乙在亳，诸邻国襁负归德。东观乎洛，降三分沈璧，黄鱼双跃，出济于坛，化为黑玉，

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xi]

卷十二帝王部

正是因为商丘历史上曾经出现商汤这样一位“天下归德”的贤王，所以“归德”之名才能够得到历代人们的认同而不加以更改。今天商丘虽已不名“归德”，但“归德”之名中所蕴含的德治思想仍然具有现代之价值。“归德”一词在文献记载中有专门的解释，见于《逸周书·大聚解》：

泉深而鱼鳖归之，草木茂而鸟兽归之；称贤使能，官有材而士归之；关市平，商贾归之；分地薄敛，农民归之。水性归下，农民归利。王若欲求天下民，社设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民自来。此谓归德。^{[10]407-408}

所谓“归德”，正如“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民自来”，而要做到如此，必须在为政中充分考虑人民的利益，以民为本，才能真正实现“归德”。

结语

在历史的长河中，商丘地名历经多次沿革，不仅这些地名之变迁需要我们去认真考证，而地名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更值得我们去认真探求。火文化、玄鸟文化、归德文化都曾在历史上大放光彩，今天我们仍要继承与发扬商丘历史文化中的优秀内容，为进一步打造新时代的在地域文化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2] 王国维. 观堂集林卷十二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 孙森. 古商丘考 [A]. 唐嘉弘主编. 先秦史研究 [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

[4] 郑杰祥. 释商 [J]. 驻马店师专学报 1988 (2).

[5]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宋)薛居正. 旧五代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7] (宋)欧阳修. 新五代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杨伯峻. 孟子译注 [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9] 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 [M]. 北京：中华书局，2016.

[10] 黄怀信. 逸周书汇校集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1] (唐)欧阳询. 艺文类聚 [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作者：薛立芳，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副教授；博士)

· 古城家族研究 ·

北宋应天府虞城王氏藏书世家概述

◎王玉顺

宋代经济快速发展，私人藏书风气十分盛行。宋代世家大族，十分重视对家族成员的教育，因此，宋代是一个藏书名家辈出的时代。藏书和对家族成员进行教育，成为世家大族在宋代社会进行文化竞争的重要手段，而且所获得的社会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作为世家大族的应天府虞城王氏，起家后继承传统，以王洙为中心的家族成员长期对图书汲汲以求，收藏了大量图书典籍。虞城王氏藏书在当时非常有名，时人多有好评，成为知名一时的藏书世家，在宋代大藏书家排行榜中居第六位^[1]，成为北宋时期著名的藏书世家。

一、王洙家世

北宋应天府宋城虞城王氏，先祖为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北宋欧阳修给王尧臣写的墓志铭中记载有：“公（尧臣）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为唐辉州（州衙在今山东单县）刺史，遭世乱，因留家砀山。砀山近宋，其后又徙宋州之虞城，今为应天虞城人也。”^[2]故称为虞城王氏。欧阳修给王洙写的墓志铭中，记载了王洙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名字和官职情况，“公（洙）应天宋城人也，曾祖讳厚，祖讳化，赠太傅。父讳砺，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3]

王洙，字原叔，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人。举进士，为庐州舒城尉。因事免官，

起复为富川主簿，召为国子监直讲，遇大理评事、史馆检讨、知太常礼院、天章阁侍讲，同判太常寺。知濠州，徙襄、徐、亳州。召还，复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拜知制诰，权判史部流内铨。嘉祐二年九月卒，年六十一。洙著述颇丰，尝预修《崇文总目》、《国朝会要》、《集韵》、《祖宗故事》、《三朝经武圣略》、《乡兵制度》，有《易传》十卷、杂文千余篇。^[4]

王洙的儿子王钦臣，《宋史》记载：王钦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赞欧阳修，修器重之。用荫入官，文彦博荐试学士院，赐进士及第。历陕西转运副使。元祐初，为工部员外郎。奉使高丽，还，进太仆少卿，迁秘书少监。开封尹钱想入对，哲宗言：“比阅书语，殊不满人意，谁可为学士者？”想以钦臣对。折宗曰：“章惇不喜。”乃以想为学士，钦臣领开封。改集贤殿修撰、知和州。徙饶州，斤提举太平观。徽宗立，复待制、知成德军。卒，年六十七。钦臣平生为文至多，所交尽名士，性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正，世称善本。^[5]

应天府虞城王氏家族，自太原祁县迁入虞城后，在科举入仕的大环境下，利用家庭藏书的优势和社会上的地位，加强家族成员文化方面的素养教育，参加科举，继续为官，使家族兴盛繁荣。虞城王氏

家族科举的成功无疑与其家族注重藏书和家庭教育分不开，藏书作为财富和文化思想教育传给后世，才有了虞城王氏“五代三十六进士，一状元一探花”的盛世。书籍是虞城王氏几代人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在文学、史学、军事、经学、医学、音律、收藏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应天书院滋养了王氏几代人，枝繁叶茂、荣耀显赫。张方平评价为“世绪炽昌，遂为睢阳冠冕”，欧阳修称为“宋多名家，王实大族”、梅尧臣评价为“衣冠今盛族，兰玉旧家声”，虞城王氏成为中国宋代文学家庭^[6]、中国文化世家^[7]，称之为“王砺之后，他的子孙们代有隼（读俊）秀，多登台阁，甚至位列公卿”。

二、虞城王氏藏书活动

（一）藏书溯源

虞城王氏藏书可以溯源到王洙的曾祖父王厚。据王庸敬《王氏通谱》（上海图书馆藏），王厚出生于梁开平四年，生长在“五代十国”时期，王厚的父亲王垠在唐朝末年任辉州刺史。王厚“高隐不仕，藏书甚富，以道德教乡里，以惠施人。”^[8]王厚虽然没有仕宦经历记载，但以丰富的藏书，教化乡里人，并培养出了优秀的儿子王化。王化是最早进入应天书院的虞城王氏家族成员，当时同乡戚同文继承师业，在睢阳学舍办学，聚徒教授。南通大学王树林教授在编著的《应天书院志（征求意见稿）》中记载了王化是应天书院宗师戚同文的好友。^[9]后来，王化成为戚同文的女婿。《王氏通谱》记载：“化，厚子。赠太傅。配戚氏正素先生女，封曹国太夫

人。子一砺。”王化死后追赠太傅，其妻戚氏是戚同文的女儿，追封曹国太夫人。戚夫人重视教育，教子严格。王钦臣记录的《王氏谈录》“训子条”中记载：“闺门之内，承顺父母颜色为先。吾先公中令，奉戚氏太夫人极为子之道。太夫人每有小不如意，未尝与先公一言，先公必朝服再拜，候其色悦而退。”^[10]

正是这严厉的教子，儿子王励成为虞城王氏第一个踏入仕途的人。在太平兴国五年（980）中进士，通礼学，踏入仕途后，官至屯田郎中。后因子孙显贵，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八个孙子中有王洙等七人考入进士；曾孙王尧臣天圣五年（1027）状元、王陟臣探花及第，官至参知政事，虞城王氏成为宋代显赫一族，这与王氏家族刻苦向学之风和丰富的藏书不无关系。

（二）藏书发展

世家大族藏书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多能世代藏书。丰富的藏书作为家族财富代代相传，是宋代藏书人的基本愿望。

王洙是北宋仁宗时期一位具有多方面：学术才能和建树的博通学者、显达文臣。欧阳修在《翰林侍读侍讲学士王公墓志铭》称他“其生始能言，已知为诗，指物为赋。既长，学问自六经、史记、百氏之书，至于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官、算法、训诂……故自其少也，一时名音，无所不学，学必通达，如其专家。臣贤士，皆称慕之，其名声誉天下。”^[11]《宋史》本传概括其学术成就时云：“泛览传记，至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诂训篆隶之学，无所不通…著《易传》

十卷，杂文千有余篇”^[12]，范仲淹推崇其才能云：“文词精赡，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缙绅之中，未见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镐方之，不甚过也。”^[13]

在当时文官学者中具有颇为卓著的治学之绩。王洙个人雅好藏书，对前代典籍颇有利用之便，其所撰述也多是本着当时政治文化的实际需要，汲取前代文献资源完成。

王洙在当时以家藏富庶、学问渊博闻名。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云：“藏书之富。如宋宜猷、毕文简、王原叔、钱穆父。王仲至家及荆南田氏、历阳沈氏各有书。”^[14]可见王氏藏书在当时的盛名。王洙训练其子王钦臣从小检习书史，知目录之学，王钦臣官至集贤殿修撰。王钦臣继承其父家学与家藏，不断充实私家藏书，使王氏家藏书成为两宋间最为知名者。

宋城王氏藏书始自王厚，聚藏之王洙，盛之王钦臣，积达四万三千卷，成为北宋著名的大藏书家。其书留传给王洙的第三代王彦朝，散之第三代王楚老、第四代王问。

（三）藏书类别

王洙家藏众多典籍善本，既多且精。“王钦臣藏本校勘的精细是很少见的。”^[15]宋城王家的藏书，其版本价值和学术性都很高，在后世影响深远。

南宋学者徐度《却扫编》卷下载：“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千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虽秘府之盛，无以瑜之。”^[16]王钦臣家藏取材广泛、内容浩瀚、卷帙巨大的大型类书，

书籍内容丰富，广博繁多，四万余卷的藏书，其藏书之丰富堪比中央“秘府”，即使禁中藏图书秘记之所，也不能超过之精良。

北宋前期，类似杜甫诗集、韩愈文集等文学类典籍还未引起官方的重视，很多典籍应当都是宋绶、王洙等这些素有学术根柢的馆图文臣先通过过录、传钞或互相讨论链对而形成的家藏传本。王得臣《座史》卷下云：“退之有《读皇甫提公安园池诗书其后》。此篇尝病难读，盖多脱漏。予亲家李勉之收永叔、王原叔、宋子京三公所传韩文，最为全本，悉多是正。于是知此篇乃脱八字。”^[17]欧阳修、王洙、宋祁三人均为北宋仁宗朝的著名藏书家，三者“所传韩文”，则指其家藏韩愈文集版本，王得臣用此三本以校世传本韩文，“悉多是正”，说明三位学者的藏本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南宋学者对韩愈文集的刊刻，就参考了王洙的家藏方秘卿《韩集举正叙录》。

王洙家藏本《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代刘孝标注，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主要记载了东汉后期到魏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但《那斋读书志》载有北宋以前《世说新语》的两个版本系统：八卷本和十卷本。两版本“一本极详，一本殊略，未知孰为正，然其目则同”，惟八卷本为刘义庆原本，十卷本为刘孝标注本。绍兴八年（1138）董棻刻本《世说》题跋云：“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后得晏元

献公手自校本……最为善本。”^[18]可见王洙的家藏本《世说新语》在南宋被董棻收藏并加以重视，将其与晏殊家藏本共同成为董棻校勘整理《世说新语》重要版本。

（四）藏书交流

南宋学者徐度《却扫编》卷下载：“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闻之其子彦朝云，其先人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较，至无差误，乃缮写之。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页，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专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已不得见也。镇库书不能尽有，才五千余卷。”^[19]据其子彦朝所述，王钦臣每得一书，王钦臣先用鄂州蒲圻县纸缮写，每书分两本缮写，再装订成册，一本供子弟传阅，另一本以绢素包背，以供收藏。只有他本人才可以看到，并美其名曰“镇库书”。

王钦臣的藏书交流还有一个创举，在扩充其藏书规模的过程当中，王钦臣结识了藏书大家宋次道、宋敏求，他们并以藏书目录作为交换工具，诸家目录互相对比，以互相补充自家收藏所阙。私家藏书目录互通有无、发现珍本的独特功能，直接促进了目录学在两宋的发展，又为后世曹溶《流通古书约》、丁雄飞《古欢社约》以及黄宗羲刘城等藏书家所仿效，取长补短，以臻完善，使得家藏书籍不断充实。^[20]

（五）藏书散落

虞城王氏藏书众多，但最后仍然逃不脱散落的格局。

每当改朝换代、新朝甫立之时，为恢复国家藏书，朝廷总要向民间征书。而在承平年代，政府也会不时地向民间征求图书，因为苦心经营的私人藏书家，往往会收藏有连国家图书馆都没有的珍本秘籍。朝廷如果知道谁家藏书丰富，有时会直接索取。从北宋到南宋历朝都积极搜访书籍，或者下令民间献书，或者派专人搜访求购。为了鼓励人们献书，往往给予献书者优厚的赏赐，或赐以钱帛，或给以官职，或赐予科名。高宗南渡以后，又下求书说“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书之盛，视古为多。艰难以来，网罗散失，而十不得其四五，令监司郡守，各谕所部，悉送上官，多者优赏。”^[21]民间对政府搜访书籍的响应，将家藏书籍及珍贵的字画献给国家。向朝廷献书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既可显示自己藏书丰富品位高，又可得到皇帝口头甚至爵位的奖赏，王氏家族的藏书也分多次献于政府书库。

《却扫编》卷下记载，宣和中，王钦臣以镇库书献。^[22]

《却扫编》卷下记载：“宣和中御前置局求书时，彦朝已卒。其子问以镇库书献，诏补承务郎，然其副本具在。建炎初，问渡江，书尽留睢阳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23]

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绍兴六年（1136）十一月二十五日，故翰林侍读学士王洙孙男楚老，上庆历、皇祐御劄、手诏、飞白等，赐银、绢各一百匹两。楚老兼进四朝御容，故有是赐。”^[24]

王氏藏书、字画等多次进献，是藏书

的部分散出,为其后人换来了官职和奖赏。但大部分藏书基本毁于靖康之变,京陷落后,图书除被金兵掠去外,其余多焚坏于战火。最后是全散失了,部分流落民间。

王氏藏书《世说新语》流落日本。2012年,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潘建国先生考证,日本江户时代所建的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有“数量可观的中文古籍善本,其中尤以宋刻本《世说新语》最为世人所重。宋刻本《世说新语》盖有“睢阳王氏”印章。“睢阳”即河南商丘之古称。检索文献,明顾起元《说略》卷十二“典述上”载:“又古《易》五家,吕大防、晁说之、睢阳王氏、东莱吕氏、周燾,见《续书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易类”著录《古易》十二卷,解题云:“出翰林学士睢阳王洙原叔家。”其后连续著录吕大防《周易古经》十二卷、晁说之《古周易》八卷、吕祖谦《古易》十二卷等书,据此可知:顾起元《说略》所称“睢阳王氏”即为“睢阳王洙原叔”。令人注目的是,王洙、王钦臣父子与《世说新语》关系密切,宋汪藻《叙录》著录的《世说新语》诸藏本中,就有“王原叔”家藏十卷本,汪藻甚至还引用了一段王仲至《世说新语》手跋文字;而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校刻《世说新语》的董弅,也在跋语中声称“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因此,综合上述资料推测,尊本所钤“睢阳王氏”,盖即商丘王洙后裔之藏书印,其中第五代(王问之子)或第六代(王问之孙)的可能性最大。^[25]

三、藏书的保护

(一) 藏书保护

在书册装帧方面,王洙有独到之处。王钦臣《王氏谈录》之“录书须粘叶”条中王洙说:“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情,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横之弊也。尝与宋宣献谈之,公悉令家所录者作粘法。”^[26]王洙一生为官,但多与书打交道。他以切身的经验体会,道出了典册缝缀的端及典册粘叶的优越。认为蝴蝶装法糊粘,粘叶装的形制最可取。以王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的方法来看,其修复的重点在于防止书页的错乱颠倒。王洙与宋绶交往甚厚,学者切磋,互相交流经验,王洙尽述其经历,粘叶装的好处也为宋绶所认同。影响所及,宋绶甚至将其家中过录来的抄本书籍全部装帧为粘叶装的形制。蝴蝶装法臻于成熟,多改线订为糊粘,粘法甚精,历久不脱落,被定为国家的书籍制度,并博得好评。如今影印古籍,也常用这种装帧方法。^[27]

(二) 藏书修复

《王氏谈录》“水渍书册”条云:“藏书之家,书册或为雨漏及途路水潦所渍者,皆可大

甑中蒸而暴之。至一二番,乃以物镇压平处。逮干,色虽微渍,而略无损坏。”^[28]介绍藏书在被雨淋、水淹的破坏之后,可以在蒸饭锅中蒸,然后晒干,再用重物压平这样处理过的水渍书即使原本的色泽会有浸渍的痕迹,但是仍大体上会恢复原状。

（三）书校工具

王洙校勘典籍数量众多，曾总结创造出一套校勘用雌黄墨的制法。《王氏谈录》“雌黄墨”条云：“雌黄为墨，校书甚良。飞研极细，坚胶揉为锭。无油瓷器中磨。加以少藤黄，尤佳。”^[29]雌黄是树皮渗出的黄色树脂，经炼制可作绘画用的黄色颜料。将雌黄研磨成为极细的粉末，以粘结力良好的胶水将其糅合，以模压制成墨锭。在研磨的过程中，如果放在干净无油的瓷器中，加以少许藤黄“颜料”，则制出的雌黄墨质量尤其好使用雌黄校书是较早已有的一种典藏方法。贾思《齐民要术》卷三说王洙云“尤佳”，可以想见此为王洙进行校勘书籍时经常使用的一种自制墨。此外也说明，若非经常整理和阅读藏书、进行书籍的校勘，则不必殚精竭虑地思考如何制造更加优良的雌黄墨。王洙用精良的雌黄墨来校勘藏书，此更显示王洙校书之勤，足以说明其对书籍典藏的讲究。

四、藏书的整理

（一）书籍编目

王氏藏书最初的书籍编制目录是为了方便交换，互通有无。据宋徐度《却扫编》卷下：“尝与宋次道（即宋敏求）相约传书，互置目录一本，遇所阙，则写寄，故能致多如此。”^[30]可见王钦臣和宋敏求都备有藏书目录，相约传书，遇有所缺，则交换阅读或传抄并不断交换，相互补充。曹之著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唐代发明雕版印刷的旁证（下）一章中，分别载入“王钦臣藏书目录（宋）王钦臣撰”“宋敏求藏书目录（宋）宋敏求撰”。^[31]

北宋苏象先为述其祖父苏颂遗训遗事的《苏魏公谭训》，在卷四中说：“祖父竭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32]可见，王钦臣的藏书目录被当时的文人所赏识。

在目录学方面，虞城王氏做出了很大贡献。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于左升龙门东北建崇文院，收藏昭文、史馆、集贤三馆之书，端拱元年，别设所谓“秘阁”之书库，特购禁中书籍，然于真宗时皆罹于火。仁宗时再建仁宗时再建崇文院，景祐元年，命修书目。《崇文书目》是“宋王尧臣等奉敕撰。盖以四馆书合并著录者也。宋制以昭文、史馆、集贤为三馆，太平兴国三年，于左升龙门东北建崇文院，谓之三馆新修书院。端拱元年，昭分三馆之书万余卷别为书库，名曰“秘阁”，以别贮禁中之籍，与三馆合称四馆。景元年闰六月以三馆及秘阁所藏或渗滥不全，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造李淑、宋祁等看样，定其存废，谁渗者删去，差漏者补写。因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校正条目，讨论撰次，定著三万六千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于庆历元年十二月己丑上之，赐名曰《崇文总目》。”^[33]《崇文总目》，是三馆秘阁收藏书籍的一部联合目录，后来当各馆阁逐步都充实了一套《崇文总目》所著录的书籍时，它就成为各馆阁可以共用的通用书目。这部书目按照唐代开元年间的四库法著录了图书，又把佛教、道教经

典纳入四库子目中，彻底完成了中国古代的四库分类法。著录丰富、体例完备，每类有叙释即类序，每书有解题，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家书目。对宋代及宋代以后的公私藏书目产生了很大影响，起到了示范作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为“今观其书，载籍浩繁，抵件诚所难保，然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百世而下，籍以验存失，真鹰，固不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34]

（二）书籍整理与撰著

虞城王氏及子孙们不仅藏书，而且时常编次校勘那些散乱失序的藏书。除了王尧臣、王洙参编、整理官方的《崇文总目》外，进行了大量的书籍阅读、校勘、补录、整理工作。王洙泛览传记，至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诂训、篆隶之学，无所不通。著有《易传》十卷，杂文千有余篇。

王洙是杜诗传播的奠基者，最早编纂《杜工部集》。唐五代所编杜甫集，由于时间久远和战乱，多毁灭湮没。王洙多方收集世间残存的杜甫集和小集，加以整理，去其重复，编成《杜工部集》二十卷，有诗1405首，文29篇。这是宋代编的第一部杜甫集。更难得的是，它收罗的杜甫诗文相当完备，与我们现代所存杜甫诗文差不多。王洙所编《杜工部集》后经王琪整理，雕版印行，是后世所有杜甫集之祖。王洙所作《杜工部集记》尚存，是研究《杜工部集》的重要文献，也是考索宋初和宋以前杜甫集的有关情况的重要文献。刘文刚《王洙的杜甫研究》认为：“王洙注杜

诗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精美的校勘。王洙对不同版本的杜诗异文作了详细的校勘，并作了校勘记。由于是杜甫集散佚后第一个所编集的校勘，故无比珍贵。

（二）较全面注释。注释包括写作时间或背景；典故；名物制度，包括人名、地名；语典。应该说，一般该注释的地方，大多都做了注释。注释的总体风格是简明扼要。

（三）阐释诗意。对难以理解的诗、具体诗句进行解说，使读者读懂。对于隐含深意的诗，阐明微言大义。”^[35]

王洙是张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一书的发现者。王洙自少努力，有良好的目录学功底，后入朝工作，有机会接触查阅大量官藏古书，同时也是《崇文总目》的主要参编人员之一。基于王洙在馆阁书简中的这一重大发现，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才能校订出今通行的《金匱要略》。孙奇《金匱要略方论序》说：“张仲景著《伤寒卒病论》，合十六卷，今世但传《伤寒论》十卷，杂病未见其书，或于诸家方中，载其一二矣。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乃录而传之士流，才数家耳。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36]庆历四年时，王洙曾兼直龙图阁，再加上上述编撰《崇文总目》之原因，在崇文院秘阁进行图籍的整理和校勘。崇文院既是当时国家的藏书中心，又是国家的官书整理中心，他必定有机会得见各种珍贵书籍，因而在搜寻古书方面独具慧眼，发现《金匱玉函要略方》不足为奇。

王洙还热衷于古籍的整理工作，大部分精力投入在图书的编纂、古籍的整理上。据现有资料统计，王洙的著述，包括王洙参预编修的图书、王洙主持编修的图书、以及王洙的个人撰著共有十四种，《集韵》十卷、《礼部韵略》五卷、《类篇》十五卷、《祖宗故事》二十卷、《三朝国朝会要》一百五十卷、《大亨明堂记》二十卷、《纪要》二卷、《地理新书》三十卷、《皇祐方域图志》五十卷、《太常新礼》四十卷、《庆历礼仪》六十二卷、《乡兵制度》卷数不详、《三朝经武圣略》十五卷、《青囊括》一卷、《周易言象外传》十卷、《昌元集》十卷、《宋元史质》一百卷、《崇文总目》六十六卷。他所整理修订的古籍有：校订《史记》、《汉书》、《后汉书》，修订《方言》《春秋繁露》《高适诗》《易纬》，编订《杜甫诗集》，口述《王氏谈录》儿子王钦臣记录。^[37]

王尧臣是王洙的侄子。“天圣五年举进士第一，授将作监丞、通判湖州，改秘书省著作郎·直集贤院。景佑四年，擢知制诰，同知通进银台司，进翰林学士，知审官院。西夏用兵，为陕西体量安抚使。还朝，以户部郎中权三司使。皇祐三年，拜枢密副使。嘉祐元年以户部侍郎参知政事，进吏部侍郎。三年八月卒。年五十六，谥文安。尧臣以文学进，文辞温丽，典内外制十余年。当与欧阳修等编撰《崇文总目》六十六卷。”^[38]庆历年间，王尧臣安抚陕西，《请于陕西缘边四路益屯兵马奏》《上陕西备御夏兵五策奏》《乞敕防边兵将毋得轻出奏》等，都是很出名

的军事论述。“庆历五年五月己未，仁宗正式发布语令，任命“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集贤院王尧臣，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张方平，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判史馆修撰余靖，并同刊修《唐书》^[39]”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王尧臣与太常礼院参议阮逸所上乐谱法，以用于明堂。连上《参议阮逸编钟四清声谱法奏》《详定五常酌献音曲议》《将近降御制乐曲谱注入合用清声奏》^[40]等五个奏章，改进宫廷礼仪用乐，对宫廷音乐的乐谱编排、演奏都很有研究。

王钦臣交游甚广，元祐年间，与当时的文豪苏轼交好，并与钱勰、蒋之奇等交游密切频繁，组成“元祐四友”，经常在一起交游唱和、题诗吟咏、切磋竞技，评书赏古，留下大量的诗篇。王钦臣的著述可分为个人撰著与校订之作两类。其著述多已亡佚，只能从各种目录书、文集中寻觅其痕迹。个人撰著的有《广讽咏集》五卷、《王仲至诗》十卷、《王氏谈录》一卷，校订之作有《韦苏州集》十卷并以署名太原王钦臣序、《杜诗刊误》一卷、《钱仲文集》八卷。

五、结语

宋代建立之后，应天府宋城成为陪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在这种背景下，整个宋代社会读书藏书蔚然成风，文化教育迅速普及开来，读书人大大增多。特别是应天书院的兴盛，直接影响了应天府藏书和文化思想的传播与进步。应天府虞城王氏，王化、王励、王读、王洙、王尧臣、王钦臣、王陟臣等几代人在应天书院执教、

讲学、读书,为应天书院的兴盛做出了很大贡献,应天书院同时也滋养了王氏后人。他们参加科举,继续为官,又有王梦臣、王稷臣、王延老、王俊明、王问、王干等一批后继之人,使家族兴盛下去。王氏家族在文学、史学、经学、乐理、军事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家族藏书丰厚,良好的家族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世代生活在应天书院的良好环境,在科举竞争和文化影响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地位的获得,主要是王氏大族重视藏书和对成员进行教育的结果。

[1] 范凤书著,《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07,第88页

[2] 张春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01,第856页。

[3] 张春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01,第837页。

[4]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8.卷478第23册第1页

[5] 脱脱等撰,《宋史》,22,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07,第6993页

[6] 王毅著,《宋代文学家庭》,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09,第165页

[7] 曹月堂,王树林卷主编,《中国文化世家·中州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05,第481页

[8] 王庸敬:《王氏通谱》卷七《辉州刺史派世系》,上海图书馆藏,1894年,第2299页。

[9] 王树林,《应天书院志(征求意见稿)

见稿)》卷之十一人物志三名师二王洙、王洙。

[10] 朱易安,傅璇琮:《全宋笔记第一编(十)》,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10,第155页

[11] 张春林:《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01,第837页。

[12] 脱脱等撰,《宋史》,22,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07,第6993页

[13] 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第9册》,成都:巴蜀书社,1990.05,第481页

[14] 张邦基,《墨庄漫录》,上海进步书局,卷五第3页

[15] 王云海,裴汝诚著,《校勘述略》,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06,第65页

[16] 徐度《扫却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01年版,第4527页。

[17] 朱易安等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1编10》,大象出版社,2003.10,第65页

[18] 余嘉锡撰,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筹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3页。

[19] 徐度《扫却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01年版,第4527页。

[20]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01,第94页

[21] 倪士毅著,《中国古代目录学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05,第106页

[22]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修订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01,第130页

[23] 徐度,扫却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01年版,第4527页。

[24] 苗书梅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09,第343页

[25] 潘建国《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宋本《世说新语》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1 第87-88页

[26] 朱易安等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1编10,大象出版社,2003.10,第164页

[27] 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重订本,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21.02,第144页

[28] 朱易安等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1编10,大象出版社,2003.10,第172页

[29] 朱易安等主编,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1编10,大象出版社,2003.10,第172页

[30] 徐度,扫却编,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2001年版,第4527页。

[31] 曹之著,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04,第442页

[32] 周少川著,古籍目录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01,第7页

[33] (清)永溶、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第758页

[34] (清)永溶、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十五,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2.6,第759页

[35] 刘文刚,王洙的杜甫研究,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第1期,第56页

[36] 傅延龄,陈明,付长林,张仲景医学全集张仲景医学源流第3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12,第28页

[37] 张丽娟,北宋学者王洙及其著述,文献季刊,2000.3,第92-103页。

[38]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8.卷478第28册第189页

[39] 杨共乐总主编,《史学史研究》文选中国古代史学卷下,华夏出版社,2017.02,第75页

[40]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8.卷478第28册第204—208页

(作者:王玉顺,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研究员;王尧臣第三十一世孙)

明清归德府“八大家”简论

◎高建立

商丘在先秦时期占有重要地位，早商曾为商都，周代为宋国国都，汉代为重要诸侯国梁国的国都，唐代一度为抗击安禄山反叛的屏障之地，宋元时期一直都是淮北地区的中心，但到明清时期，地位下降，明初归德降府为州，现在的商丘古城就是明正德六年（1511）所建，经清代、民国，一直完整保存至今，有 512 年的建城史，积淀了丰厚的古城文化。自明代嘉靖年间到清初，在商丘古城形成了沈宋侯叶余刘高杨八大家族，这些家族以其显赫地位，直接影响了明末清初商丘社会的发展。

一、八大家族发家的军户背景

明末清初商丘八大家的起家，几乎都与军户背景有关。沈氏家族出自苏州昆山，先祖沈道兴生于元末，育有二子：沈福一、沈福二。明洪武四年（1371），沈福二代父兄行军役，辗转于开封、商丘一带，最后隶籍于归德卫李百户伍下。洪武二十二年（1389），沈福二迁居城东南 15 里。年老不能行军役时，儿子沈铭代父从军，后在靖难之役中战死，沈铭 17 岁的儿子沈祥入伍，三次跟随朱棣北征，建有军功。正统之后，沈氏家族人口增多，沈祥的长子沈忠为了家族发展，在归德城东南 70 里的界沟集和城北 40 里的冉占集购置田产，并获得寄籍军户的身份，以后子孙参加科举为官，家族日渐兴盛。

侯氏家族始迁祖侯成于明初由祥符迁入归德，奉明太祖诏隶属归德卫，遂为归

德卫人，为屯田军户。

叶氏家族始迁祖为叶受，原籍江西太和，元末明初“以军功隶归德卫”，居于城东 45 里谷熟镇。叶受有二子：叶福兴、叶福善。至第五代，家族成员的不断向外迁徙，屯所军户只剩下叶梦阳一人，也正是叶梦阳，把他留守屯所的这一支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余氏家族的商丘始祖是余克，从征军户出身，因随明太祖征战有功，赐名余安，官至三千户侯、昭信校尉。洪武二十二年（1389），余克调睢阳卫，统领千骑，并在睢县、宁陵、杞县周边领封地千顷。

刘氏家族的始迁祖是安徽绩溪人刘显，刘显在元末追随朱元璋东征西讨，初授宁国卫所百户，后“以军功授归德卫指挥使”，授封昭勇将军，世袭千户职，从此刘氏一族落户商丘。刘氏二世祖刘贵授诏武都尉，三世祖刘振授诏武都尉，四世祖刘江授昭武都尉，后任山东鲁王府斋郎，五世祖刘輶，授武信左骑尉。几代人都授武职。

高氏家族的商丘始迁祖是高第，高第出身于陕西榆林军阀世家，明末时任山海关总兵，先降李自成，后降清朝，与宋权关系密切，多次得到宋权的庇佑。顺治十年（1653），高第入籍商丘，直到康熙十一年（1672）去世。其子女多与商丘名门望族宋、叶等家族联姻，宋萃第五女嫁高第次子高拱弼，高拱弼之女嫁叶增高次

子叶廷桂曾孙叶嘉栗。高第有二子：长子高拱枢，钦命分巡甘肃庄浪等处水利兵备道，次子高拱弼为御前侍卫。高拱弼长子高崇为御前侍卫，高崇子高时农，授陕西延安府参将、御前侍卫。高第以下世袭四世二等阿达哈哈番，直至高时农。

杨氏家族的商丘籍始祖为杨敬，在景泰元年以军功，升归德卫前所试百户，直至嘉靖年间，杨氏还承袭着百户的军职。明万历年间，后人杨镐官至兵部左侍郎，经略辽东。杨镐之妹嫁沈鲤从父沈黯之孙沈大坊，沈大坊武举出身，历任辽东、金复等处参将。

商丘古城八大家中，七家都与军功有关，只有宋氏家族无军功经历，宋氏的商丘始迁祖是宋贵，其后世以科举起家，尽管不像沈氏出于军户，但与出身军户的沈家有联姻。

二、八大家族的兴衰

归德府八大家，其中七家都与军户出身有关，只有宋氏家族例外，但也与其他几家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八大家总的情况是七家于军户，兴盛于科举，在科举之途上取得了骄人成就，从而为家族兴盛奠定了基础。这些家族主要盛于明朝中后期，李自成攻占归德之后，家族受到很大打击，入清之后，已经步入衰微。雪苑“六子”之一的贾开宗诗云：“迁延厄运壬午春，城破人亡多苦辛。空堂繁星为灯炬，城窟犹看鬼火磷。于今鼎革见尧日，中土流亡渐安集。上元依旧放彩灯，当年繁华十无一”。

沈氏家族自第五代沈忠日渐发达（沈道兴—沈福二—沈铭—沈祥—沈忠），沈忠因孝闻名，被列入嘉靖《归德志》中的“孝友”，其子沈瀚于成化二十年（1484）

中甲辰科进士，成为沈氏家族中第一个获得进士功名的人。沈忠的侄子沈潮（沈杰之子）于成化二十二年（1486）中丙午科举人，但在参加会试不久就去世了。沈忠的另外两个儿子沈泽、沈潜皆为诸生。沈瀚官至福建省建宁知府，这一支逐渐成为沈氏家族中最为显赫的一支。“沈氏始大，衣冠显贵者渐多”。正德六年（1511），杨虎攻破虞城，沈瀚一支由虞城迁回归德郡城，“以流贼之乱复还居郡城，置世业”。至沈瀚的孙子沈鲤（1531-1615），沈氏家族进入鼎盛期，位居“古城八大家”之首。沈鲤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中乙丑科进士，选庶吉士，兼翰林院学士，加太子少保，万历十二年（1584）冬，拜礼部尚书，万历二十九年（1601）沈鲤入阁，使得沈氏家族成为归德巨族。其子孙获恩荫数十人，不通过科举考试即可做官。但到崇祯十五年（1642），因李自成攻破归德府城，沈氏子孙殉难多达34人，家族受到极大冲击，清朝初期迁居乡野，不愿再清朝为官，家族遂衰。

商丘宋氏的始迁祖是宋贵，宋贵有二子宋谨和宋让。宋谨有四子：宋云、宋霓、宋雷、宋霞。其中宋云为归德州生员，宋霓为乡饮大宾，为人厚重，德望乡里。宋霓有三子：宋照、宋煦和宋纁，宋纁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中壬子科举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授永平府推官，历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山西巡按、顺天府丞、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保定巡抚、南京户部右侍郎、户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宋氏家族由此进入鼎盛。

宋氏家族不同于沈氏家族有军户背景，商丘宋氏以科举起家，自宋纁以后，宋氏家族考中举人以上功名达数十人，官

居二品以上者有4人，宋纁官至礼部尚书，其长子宋治因恩荫入国子监读书，后官至刑部员外郎，其孙宋杅官至南京户部郎中。宋纁的从孙宋权，明末任顺天巡抚，入清后官至国史院大学士，深受朝廷器重，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宋氏家族有5人中进士，5人中举，生员数十人，数十位族人在朝中或地方任职。宋权子宋莘14岁就擢拔为侍卫，官至吏部尚书，为官近50年。宋莘次子宋至为康熙四十年（1701）进士，官至浙江学政；宋莘幼子宋筠，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官至奉天府尹。宋氏家族出现了一门父子兄弟同朝的盛况，成为清初商丘的世家大族之首。乾隆以后，宋氏家族有些衰微，但仍有族人17人中举，1人考中进士，家族荣誉依然存在。

侯氏家族商丘的始迁祖是侯成，由开封迁入商丘。北绪三十年（1904）的《侯氏家乘》显示，其历代传承世系是一世为侯成；二世为侯英；三世为侯滑、侯雄；四世为侯显、侯礼；五世为侯山、侯和、侯举；侯和之子侯进重视子女教育，“始课子弟以博士业，辟塾延师，督训有加，不令其与治生计”（清·陈重《西陂曲·宋牧仲尚书园》），侯进有三子：侯瑀、侯玘和侯琳，侯玘之子侯执蒲，因父亲早逝，寄养于侯瑀家。侯执蒲有二子：侯恪、侯恂，兄弟二人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同时中举，次年又同中进士。侯恂官至户部尚书。万历年间侯氏家族四人考中进士，“父子兄弟同朝，吾族之盛在明季业”（商丘《侯氏家乘》，光绪三十年本（1904））

和沈氏家族一样，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攻破归德，侯氏家族男子殉难者多达20余人。入清以后，侯氏家族渐进式微。

商丘叶氏家族始迁祖是叶受，元末明初以军功隶籍归德卫，居于今天的虞城谷熟镇叶老家村。后有子孙迁入古城内，大隅首东南有叶家老宅，文庙西原有叶家祠堂。叶受有二子：叶福兴、叶福善，叶福善有独子叶亨，叶亨生四子，到第四代，只有叶镇留驻归德古城；至第五代，屯所军户只剩下叶梦阳一人，他从事商业经营，为子孙从事科举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从而把留守屯所的这一支叶氏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叶梦阳有三个二子，五个孙子，孙子叶呈春的儿子叶廷桂，把叶氏家族推向兴盛。叶廷桂于天启年间中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家族成员也深受皇恩，自此始，“叶氏为睢阳望族，科第连绵，簪缨累世”（民国八年本《商丘叶氏家乘》）

入清以后，叶氏家族开始转衰，但仍是科举世家。叶元澍康熙十三年（1674）贡生，其孙叶鹏云，雍正十三年（1735）拔贡入国子监，官至山西垣曲知县。叶鹏云胞弟叶建封，雍正元年（1723）考中进士，官至长沙知府；族人叶丕葆，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官至汾阳同知；至晚晴，叶氏家族衰微。

商丘余氏家族始祖是余克，随明太祖征战有功，官至三千户侯，昭信校尉。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余克调睢阳卫，统领千旗，家族日盛。至嘉靖年间，家族科举业兴。嘉靖四十三年（1564），家族中的余钦在河南乡试中中举，后中进士，官至知县；弟余鏊隆庆四年（1570）河南乡试中中举，官至知县；余正元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官至知县。余城，崇祯十四年（1641）授南京兵部尚书，“建第归德城南十五里余火楼，城内俱有宅”（1986年本《睢阳余氏家谱》卷三下）。

余城第三子娶宋权之女，生四子。叶廷桂第四子叶元汇娶余城之女，叶元汇第二子娶余城孙女。宋、叶、余三家族建有密切的联姻关系。

余城生四子，第四子余应征，武科进士，官至江都尉，以后余氏家族逐渐衰微。

刘氏家族商丘始迁祖是刘显，原籍安徽绩溪，因跟随明太祖征战有功，授封归德卫指挥使，昭勇将军，千户职，从此刘氏居于商丘。其子刘贵袭千户职，昭武都卫；其孙刘振，袭千户职，昭武都卫。刘振有四子：刘江、刘淮、刘河、刘汉。刘江后人成为长门长支，明清两代世袭文武官职，门第显赫，主要居住在古城北门里；从四世祖刘江到十七世，多为袭职。期间也有科举进入仕途的，八世刘国光拔贡士，官至岳州府平江县训导；九世刘广誉万历十九年（1591）举人，官至知县（山东金乡县）；十二世刘辉祖，武科进士，陕西后补守备；十七世刘履安，同治七年（1868）进士，授中宪大夫。

刘江之弟刘淮，多居于古城南门里，刘淮曾孙刘应卜，万历十三年（1585）中举，历任陕西合阳县知县、湖南辰州府知府，授奉政大夫。刘应卜之子刘敏学，官至陕西榆林卫司马。崇祯末年，李自成攻破归德，刘氏一族多有殉节。入清之后，刘氏家族逐渐衰微。

归德高氏家族始祖为高第，据康熙本《商丘县志》记载：“高第，字汉翀，本陕西榆林人。故明时，以指挥从军，累迁至镇守山海关总兵。兴朝定鼎，率先投诚，仍以总兵官随征南下。定河南、江南诸郡县，平贼寨一千七百余。论功以左都督镇守河南开、归等处，驻襄城。抚绥士卒，地方安堵。襄故临汝河，值水泛滥，距城

尺许，第虔祷于神，愿以身葬鱼腹，为万民请命。不移时水退三舍，邑赖以全，民多异焉。顺治辛卯，又破山东贼李化鲸，纪功，授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袭，后以病乞骸，加宫保致仕。遂家于商色。偃息林泉者十有八年而卒，葬郡城南，子孙遂世为商人。”（《商丘县志》卷十《武功》，康熙本。）从县志记载可见，康熙本是把高第作为商丘的始迁祖的，而且高第以军功出身，镇守归德时，留籍归德，后世子孙遂为商丘人。

高第与宋氏家族的宋权关系甚密，曾因“擅杀”受到多尔袞诘责，宋权给予多方周旋方才无事。清顺治九年（1652），宋权去世，高第失去了政治上的护翼，于次年请求辞官，入籍商丘，优游乡里十余年，与康熙十一年（1672）辞世。

高第入籍归德后，与当地士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常召集文人雅士诗酒唱和。其子女与归德名门望族联姻，如宋率第五女嫁给高第次子高拱弼，高拱弼之女嫁叶廷桂曾孙叶嘉栗，深深融入了当地社会。

高第有二子：高拱枢和高拱弼。高拱枢诏授通议大夫，钦命分巡甘肃庄浪等地水利兵备道；高拱弼授荣禄大夫，世袭二等哈达哈哈番、御前侍卫。高拱枢之子高岑，授文林郎，丰城知县。高拱弼长子高崇，授荣禄大夫，世袭二等哈达哈哈番、御前侍卫。高崇子高时农，授昭勇将军，陕西延安府参将，世袭二等哈达哈哈番、御前侍卫。至高第五世孙，高氏家族逐渐走衰。

商丘杨氏家族始迁祖为杨敬，祖上跟随明太祖征战，属于军户出身。正统三年任总旗，代州一战立有军功，升归德卫前所试百户。（《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62册《归德卫选簿》)。到嘉靖年间,杨家还承袭着百户的军职。万历年间,家族后人杨镐把家族推向鼎盛,使得杨氏家族和沈氏家族并列为归德强大巨族。名士贾开宗说:“大姓吴兴与弘农,甲第巍峨如云翼”(贾开宗《溯园诗集·上元篇》道光八年刻本)。吴兴与弘农,即指沈杨两家。杨镐官至兵部左侍郎,经略辽东。杨家与沈家有联姻,杨镐之妹嫁给了沈鲤从父沈黯之孙沈大坊,沈大坊进武举,任辽东金复等处参将。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月,朝廷任命杨镐为右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立有大功,但因受诋毁去职。万历四十七年(1619),杨镐同金军进行萨尔浒之战,兵败被杀。归德杨氏家族自此衰败。

归德府八大家基本都兴起于明末,且大多出身军户,并因军功落籍归德。李自成攻破归德,使得八大家族深受影响,到清朝中后期,基本走向衰落。

一、归德八大家名人述略

沈鲤(1531—1615),字仲化,号龙江,世称沈阁老。19岁时中乡举,嘉靖四十四年(1565)举进士,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属设的庶常馆学习,攻读三年后晋升为检讨。此后累累升迁,历任讲官、侍讲学士、吏部左侍郎等职。万历十二年(1584)任礼部尚书。万历十六年(1588)

上疏辞官还乡。14年后被重召还朝,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

沈鲤为官清廉正直、刚正不阿,勤政爱民,体察民情,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也正因此,招致佞臣的诽谤,与首辅沈一贯也不和,多次上书托病辞官。即使辞官归田,仍心系国事,沈鲤病故后,受到隆重褒奖,赠太师,谥文端。

沈鲤不但官位显赫,政绩卓著,而且有文采,在文学上有很高造诣。著有诗文集《亦玉堂稿》10卷,续稿8卷,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忧国爱民、文学素养和个人旨趣等。

宋纁(?—1591),字伯敬,号栗庵,嘉靖三十一年(1552)乡试中举,嘉靖三十八年(1559)中进士,历任永平府推官、监察御史、应天府巡按、山西巡按等,政绩卓著,后升为户部尚书。万历初,因与张居正不和,托病辞官,张居正去世后复官。

宋纁为官清正,秉性刚直,恪尽职守,深受皇帝器重。后转任礼部尚书,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调动,全力很大,但他不徇私情,以身作则,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官场的风气。后逝于任上。万历皇帝给予宋纁很高评价:“赋性直方,褪躬清介,抱置宪台,百僚见惮”。追赠宋纁太子太保,谥庄敏。

宋纁有文采,著有《古今药石序》《四礼初稿序》《商丘县志跋》《重刻漕运议单序》等。

宋权系宋纁从孙,明末清初政治家、诗人,天启五年(1625)中进士,授任曲阳县令、并可左给事中、山西按察副使等,崇祯十七年(1644)任顺天巡抚。入清以后,于顺治三年(1646)任国史院大学士,次年任会试总裁官,顺治六年(1649)再次任会试总裁官,后加太子太保。顺治八年(1651)被弹劾罢官回归故里。次年病逝于归德家中。时年55岁。宋权为官清廉,身后无余财,死后卖田安葬。宋权博学有才,文采斐然,为后世称道。

宋权之子宋萃(1635—1714)为清初著名诗人,系“雪苑后六子”之一,14

岁受恩荫入朝做侍卫，康熙三年（1664）授黄州通判，康熙十六年（1677）为理藩院判，后历任山东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等职。康熙二十七年（1688）升任江西巡抚、江宁巡抚等职，康熙四十四年（1705）升任礼部尚书，三年后辞官回乡，因其为官清正，勤政爱民，颇受尊重。

宋荦作为雪苑后六子之一，一生著述很多，有《西陂类稿》《绵津山人诗集》《沧浪小志》《筠廊偶笔》等存世。在清初文坛享有盛誉。

侯执蒲，万历二十六年进士（1598），曾任御史台言官、谏议大夫、湖北按察使，明天启初年，任太仆卿、太常侍卿。其子侯恂、侯恪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同时中进士。侯恂曾任御史、广西道监察御史、太仆寺少卿、兵部右侍郎、户部尚书。侯恪曾任翰林院编修等职，崇祯时欲提拔侯恪入阁，因病未果。但其在文学上有建树，著有《眠云阁集》《嚶鸣集》《归田草》《片石轩存稿》《遂园诗草》等，对明清之际的商丘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

侯恂之子侯方域，是清朝散文三大家之一，也是雪苑六子之首，与陈贞慧、冒辟疆、方以智并称明末“四公子”，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起初参加了著名的“复社”，清军入关后，侯方域逃离南京，不久回归商丘故里。顺治八年（1651），为保全家人，被迫参加河南乡试，录为副榜贡生，37岁病逝于商丘古城。侯方域以才闻名，诗歌、散文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明末清初享有盛誉，其《壮悔堂文集》影响深远。

叶廷桂，明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历任陕西督粮道特赦监军、靖远兵粮道副使、陕西按察使、右佥都御史、山西大同

巡抚、户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监察员右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等，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称疾辞官回归故里。

余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天启初年任都察院御史，后因评定叛乱有功，任兵部左侍郎。清顺治五年（1648），授文华殿大学士，坚辞不受，告老归养故里。

高第，生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曾跟随吴三桂征战。明朝灭亡后，留高第镇守山海关，后随吴三桂降清，仍驻守山海关。顺治二年（1645）初，搞定随躲铎南征，不久刘高第镇守河南，出任开封府、归德府总兵。顺治三年（1646）清庭嘉奖高第，称其为清朝开国元勋，给予很高的荣誉。之后，高第率军征战，屡建战功，被特批世袭二等阿达哈哈番，荣封四代一品官。

归德府八大家主要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这也是社会急剧动荡的历史时期，八大家多有军户背景，后期以科举名家。随着家族的兴盛，以文名家的风气，良好的家风，也孕育了一批饱学文采之士，使得八大家成为明清之际归德府名门望族，对这一时期的商丘社会、文化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说明：此文尚待进一步完善）

（作者：高建立，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长、二级教授）

· 古城保护开发 ·

商丘古城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 赵云峰

商丘古城历史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其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开发是一个重大现实课题。笔者认为应重新审视和确定商丘古城发展方向与功能定位，高起点制定商丘古城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实施古城大遗址保护工程、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建设工程、5A级旅游景区建设工程，积极促进商丘古城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一、商丘古城的价值评介

(一) 商丘古城的历史

商丘于1986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商丘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载体。商丘古城历史上数次为都城，近四千年都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它是中国城市建设史的缩影、是商丘城市发展的元点。商丘古城作为衔接江淮、锁钥中原的历史重镇，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条件、灿烂的人文成就，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二) 商丘古城的现状

地上现存商丘古城为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所建。归德府城为古城堡式建筑，城池外圆内方，形似铜钱。城门为拱券门，城内地势为龟背形，俯瞰全城如棋盘状，城里共有93条古街道，纵横交叉，横平竖直，条条相通，经纬分明，规

划严整，格局合理，充满端庄、古朴、大气、儒雅的风韵，是典型的中州平原城市风格。现存有穆氏、侯氏、刘氏、宋氏等20多座明清四合院。

目前，古城内的很多文物古迹因自然风化、战火、改建等原因已经破坏。古城内改造建筑较多，除南北主街仿古建筑外，多数街道历史风貌缺失。部分文物建筑和明归德府城墙修复尚不到位。城郭内居民建筑密度很高，护城湖存在明显的生活和工业污染。城墙内建筑过于密集，人口密度过大，1.13平方公里居住着逾三万居民。城内原有基础设施落后，道路狭窄拥挤，车流人流混杂，难以发挥文化旅游功能。

(三) 商丘古城的价值

1、文物博物价值

商丘古城是商丘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原古城博物院。古城大遗址区内现有不可移动文物众多，其中有国家级4处（地上明朝古城、地下宋国古城、隋唐大运河古城南关码头遗址、隋唐大运河遗址）、省级13处、市级11处、区级40处。现存归德府城已有五百多年历史，是全国保存比较完整的四个古城之一；城墙、城郭、城湖三位一体，外圆内方，保留至今，全国独一无二，具有北方古城典范格局，堪称中国古城池的典范之作。商丘古城包括明清归德

府城及以下叠压的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都城、汉唐朝时期的睢阳城、宋朝时期的南京应天府城、元朝的归德府城等几层古城。商丘古城的稀缺性、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点，得到了国内外古建筑专家的一致肯定。

古城大遗址内有大运河南关码头遗址、中国最早天文台阍伯台、八关斋、文雅台、应天书院、侯府壮悔堂、六忠祠和淮海战役总前委司令部旧址等不可移动文物，城内还有很多古建筑，如四合院等古民居，也具有重大的文物价值。

2、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

商丘向为一方大城，为方圆百余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几千年来，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燧人氏钻木取火实现重要技术革命，睢阳区被命名为“中国火文化之乡”。阍伯观星授时，王亥服牛贸易，商汤以德立国建立商朝。孔子、孟子在这里游学，是墨子、庄子、惠子等思想家的故里。商丘古城名人辈出，仅明嘉靖至清初百年内，出过两位大学士、四位尚书以及十多位侍郎、巡抚、御史、总兵等。民俗文化丰富。月下老人穿红线、连理枝、闹龙街及桃花扇等故事传说广为流传。睢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现已认定 29 种，大部分与古城密不可分。

3、历史上的军事价值

得中原者得天下，商丘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商丘人民用勤劳和智慧修筑起易守难攻的城堡。外有城郭，次有宽阔城湖和吊桥，内有坚固高大的城墙，在冷兵器战争中有着

良好的安居固守的军事价值。古城里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商丘古城蕴藏承载着的巨大的历史军事价值对今人仍有启发教育意义。

4、治水兴利、生态和谐、节约资源的城市建设示范价值

商丘地处黄淮冲积平原，历史上受黄河、淮河支流睢水和汴水的水系影响，水患较多。在商丘古城建设历史中，治水与兴利相结合，所建外环城郭较大，具有防止抵御外来水患的作用；城内地势呈龟背状，天降雨水自然流入城湖，可避免城内积水。城湖是个巨大的人工蓄水池和自然生态湿地，与郭外河流相通联，涝时堵上防淹；旱时开口及时补水保持生态平衡。开挖城湖既解决了城墙、城郭烧砖用土问题，又解决了水患和生态平衡问题。隋唐大运河惠济渠的开通更是航运兴利壮举，使古城成为安居、宜居、乐居之城。近年，被命名为水利风景区。

5、发展文化旅游业的潜在价值

2005 年 11 月商丘市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商丘古城旅游区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设施不断完善，接待能力不断增强。2011 年商丘古城旅游区共接待游客 367.8 万人，门票等综合收入 2.75 亿元。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促进了餐饮、交通、住宿、娱乐等行业的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十分明显。商丘古城的文化旅游业的显在和巨大潜在价值正在已被社会大众公认。希尔顿（中国）投资集团曾规划预测：古城文化旅游项目年营业收入可达 200 亿人民币，可直接安排就

业六万人。商丘古城拥有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文化旅游资源,其潜在价值难以估量。

二、商丘古城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方向与原则研究

(一)重新审视和确定商丘古城发展方向与功能定位

商丘古城在几千年来都是一座广大乡村簇拥着的巨大城堡,是一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五十多年来,商丘古城的城市中心区功能逐渐被淡化。到2011年底,商丘城市建成区面积已达到100平方公里,而古城墙内面积只有1.14平方公里,城郭内总面积也只有6.6平方公里。商丘古城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功能需要重新审视和确定。

首先,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古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已基本消失。其次,在目前看,睢阳区委、区政府及绝大多数区部门机关迁出之后,它已不再具有区域政治中心的功能。第三,原有的区域商业中心功能已经萎缩,逐渐被快速发展的商丘新市区所取代。第四,古城正逐渐变成一个居住环境较差的弃居区。城内原住民大部分人口已迁出城外居住,留居者多是经济实力差的低保户,也有一部分周边农民租房做生意或带着孩子在城里上学。实施旧城改造在古城内建设现代居民区就地安置原居民显然也不是可行良策。

商丘古城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丰富的资源,决定了它具有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巨大潜力。所以在商丘市城市建设未来发展总体规划中,商丘古城应明确定位为一个文化旅游功能区。

商丘古城文化旅游区发展目标应是:充分保护和利用商丘古城的丰厚历史文化资源,立足中原和华东旅游市场,发展全国旅游市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将商丘古城建成融历史、建筑、军事、水利、生态文化为一体,以博物游览、寻根谒祖、访古修学、影视体验、文化创意、休闲度假、游憩娱乐、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美食购物等多形式组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区。

(二)商丘古城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原则

1、正确处理好古城文化旅游区与周边城区统筹发展的关系,坚持古城发展优先的原则

古城是商丘城市的根脉和原典,是商丘城市的精神灵魂所在,是商丘城市形象主要的标志性载体。文化旅游产业是生机勃勃的朝阳产业,是产业关联度很高的高端产业。古城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可以有效提升商丘整个地方和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可以有效提升商丘整个地方和城市的吸引力、影响力,可以对商丘的各产业发展产生带动、推动作用。古城为商丘城市发展贡献了母亲般的力量,发展起来的新城区应该反哺古城。商丘应举全市之力发展古城文化旅游业,周边城区的规划建设应为古城的规划建设让路和服务,在人才、用地、税收、生态等方面为古城的发展建设提供积极支持。

2、正确处理文化资源保护与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关系,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

商丘古城不是一般的旅游景区,首先

应是一个古城文化遗产保护区。文化资源保护越好,越有利于文化旅游业发展;对文化资源的破坏就是挖断文化旅游业的根脉。对文化资源的破坏往往是无知造成的,所以首先要深入研究发掘整理提炼文化资源,对文化资源家底全面深入研究掌握。历史文化资源一旦破坏不可再生,推进文化旅游开发宁可慢一些,但不能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文化错误。商丘古城的旅游业发展规划,要和古城文化遗产保护紧密结合,充分尊重文化资源保护的需要,对城市生态环境、城市建筑风格、城市功能建设,要综合考虑,在文化资源保护优先的原则下充分协调,达到和谐统一。

3、正确处理居民搬迁与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关系,坚持民生优先的原则

发展古城旅游业必须实施居民搬迁民居拆迁工程。只有拆迁才能为旅游景点设施腾出地方,为外来游客腾出空间。要坚持民生优先原则,保护原住民的利益。对民居予以合理补偿,先具备安置条件再搬迁拆迁,实施拆迁和谐安居工程。建立投资融资平台和机制时应考虑提供给原住民的投资优先机会。古城的发展成果应该与这里的民众共享。原住民搬迁可以量力而行,次第推进。旅游开发应由点连线,连线成片,滚动发展。

三、商丘古城保护与开发的主要路径展望

(一)实施商丘古城大遗址保护工程,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大遗址保护是国家文物局从“十一五”规划开始在全国实施的一项重要文化遗产

保护工程,主要指对学术价值高、面积比较大、保存相对较好的有代表性的遗址进行重点保护和支持。商丘古城以其城墙、城湖、城郭三位一体的独特性及其道路、框架保存的完整性,地上和地下文化遗产丰富的鲜明特点,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审美观赏价值,完全符合大遗址的相关条件标准。商丘古城是中原经济区华夏历史文化遗产创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古城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商丘人的责任,也是传承中华文明、丰富中原文化内涵、繁荣商丘社会文化经济的重要途径和举措。大遗址具有规模大、范围广、价值高、保护难度大、保护要求高等特点,所以商丘在进行大遗址保护的时候应该遵循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客观规律,重点突出规范保护、全民保护、科学保护。

1、科学规划,完善法规,依法保护大遗址

实施商丘古城大遗址保护工程,应科学规划,构建规范保护体系。委托国内外优秀规划单位,编制《商丘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商丘古城大遗址区文物保护规划》、《商丘古城、隋唐大运河古城南关码头、夏邑县济阳大运河古河道三处申遗点保护和申遗规划》等一系列保护展示利用规划。建议商丘市人大、市政府制定《商丘市旅游业管理条例》、《商丘古城旅游区管理实施办法》,以法治的理念开发、建设与管理保护区、旅游区,保障和促进古城文化旅游业在文化遗产良好保护基础上的健康发展。

2、规划建设一批文化遗产展示项目

一是复建一批能够代表古城文化精髓的古建筑。如府衙、侯府、沈府、应天书院等。二是新建一批能够提升古城文化内涵的文化项目。如尽快实现中国商文化博物馆开馆,建设中国火文化博物馆、中国星相露天博物馆、中国德文化博物馆、商丘古城博物馆、大运河遗址公园、宋国故城遗址公园、商丘历史文化名人雕塑公园等。

3、积极推动将商丘古城与大运河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大运河商丘段是大运河通济渠的重要一段,主要依靠古睢水开挖,始于战国时期开凿的鸿沟水系,历经汉魏汴渠、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北宋汴河等历史时期,前后沿用1500余年。大运河在我市西起杞县与睢县交界处,沿途经过睢县、宁陵县、梁园区、睢阳区、虞城县、夏邑县、永城市7个县(市、区),东南与安徽省濉溪县相接,全长199.7公里,大多埋藏于地下。

2006年6月,国务院将中国大运河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6月20日,国家正式启动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2010年中国大运河申遗委员会、省部级会商小组经过遴选,确定将“商丘古城南关码头遗址段”、“夏邑县济阳镇运河段”作为立即列入项目,“商丘古城”作为后续列入项目。2012年6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各地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进行评估和验收,确定最终申遗预备名单,正式向世界遗产组织

申报,2013年接受世界遗产组织专家的实地考察,2014年接受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审议。

商丘古城要单独申遗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大运河是线性文化遗产,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必须选择若干个作为支撑,首先将“商丘古城南关码头遗址段”作为大运河申遗的一个点是可行的。要充分认识和利用“商丘古城南关码头遗址段”申遗成功的重大意义,尽快做好古码头的全面挖掘工作,恢复古码头的原有风貌,建设古码头遗址博物馆,将南关码头、商丘古城、商丘博物馆、商丘文化广场打造成文化旅游景观区(带),增加其文化内涵和旅游的可视性,让游客充分感受到商丘古城文化的博大精深,能够有力推动商丘古城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二)、实施古城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建设工程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建设工程。

国内旅游业发展面临难得的黄金发展机遇期。“十二五”期间,旅游消费将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成为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休闲、度假成为居民消费新趋势,国内旅游成为旅游市场的主体,这种趋势将促进旅游产业爆发性增长。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办发〔2009〕41号),确定将旅游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对旅游产业的定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市要把旅游产业作为实现崛起、振兴商丘的一大优势、一大支撑、一大后劲,作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重点来培育,

作为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建设的先导产业、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产业、改善民生的富民产业、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动力产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引领产业、塑造我市形象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产业来打造。

结合《河南省“十二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我市要把商丘古城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建成文化旅游精品景区，全面整合古都文化、祖根姓氏文化、商文化、火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文博文化、军事文化、水利文化、宗教文化、功夫文化、生态文化、养生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美食文化等传统文化的典型元素，培育面向国际市场的文化体验产品，打造古都文化体验游、休闲养生游等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古城休闲旅游功能区；依托城市完善的交通体系，打造面向本地市民的环城游憩带和城市购物休闲、餐饮休闲、娱乐休闲等产品体系；依托陇海、京广铁路、郑徐高铁、商丘机场和东接鲁、苏、皖的区位优势，完善集散功能和旅游接待设施，培育面向中国东部地区三小时旅游圈内各城市进入我省的门户旅游集散地。

中共商丘市委、市政府 2012 年提出要在全市开始建设六个文化产业园区。商丘古城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是全市文化产业集聚区的重点龙头工程。要根据文化、旅游产业自身特点，以满足旅游者多元化需求为目的，在一定地域空间内聚集旅游核心吸引物，并通过旅游资源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服务设施和重大旅游项目集聚，形成功能完善、要素齐全的旅游产业

链，最终打造成国家 5A 级景区、国际旅游目的地和豫东旅游集散中心。

本文系商丘社科规划课题“商丘古城保护和开发利用研究”主要成果。

（作者：赵云峰，原商丘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二级巡视员。）

商丘古城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魏清彩

商丘古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经过多年发展，如今的商丘古城已经部分恢复了活力，文化旅游发展势头向好，节假日旅游人数大增。但是相比于其他一些全国知名的古城，商丘古城知名度低，文化旅游发展中还存在着各种问题。本文通过对商丘古城现状及问题的分析，试图提出一些切实有效的发展对策，推动商丘古城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商丘古城概述

商丘古城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商丘古城又称归德府城，由砖城、城湖、城廓三部分构成。现存的归德府城于明朝弘治十六年（1503）开始重建，正德六年（1511）竣工，距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由于商丘地处黄河沿岸，水灾频仍，现存归德府城之下还叠压着明朝弘治十六年之前元朝时期修建的归德府城、北宋时期的应天府南京城、隋唐时期的宋州治所宋城、秦汉时期的梁国国都睢阳城、周朝时期的宋国都城等6座都城、古城。商丘古城是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唯一一座集八卦城、水中城、城摞城三位一体的大型古城遗址。全城外圆内方、形如古铜钱，九十三条街道形如棋盘，内城地势呈龟背状，中间高，四周

低，略向南倾斜。内城四周城墙耸立，巍峨壮观，古城四面环水，仅有四门与外界相通，从空中看古城像建在水中一样，这种内城、城湖、城廓三位一体、保存完好的古城，堪称中国古城池的典范之作。

1986年，商丘古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1996年，商丘古城归德府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归德府城下叠压的宋国故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商丘古城被国家旅游局公布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2007年，首届中国旅游论坛评选商丘古城为“中国十佳古城”。2012年11月1日，商丘古城以其水利特色突出、文化品位高被国家水利部批准为国家水利风景区。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商丘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后续列入项目。2016年2月，商丘古城获评“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二、商丘古城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商丘古城近几年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内部一些旧建筑被拆掉，大多数居民被迁出，一些明清老建筑进行了修缮，公共设施也有了改观，重建了一些仿古建筑，打造了美食街、游乐活动、汉服展演、商丘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场所或项目。尤其是节假日期间，通过各种演艺活动，

吸引了不少旅游者参观游览，文化旅游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

总体来看，商丘古城文化旅游的发展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但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商丘古城文化旅游发展的优势

1. 交通区位优势。商丘位于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处，铁路、高速公路、高铁、国道等纵横交错，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这为商丘古城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2. 政府重视，政策支持。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旅游的政策、制度等，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商丘市市委市政府也十分重视商丘古城文化旅游的发展，聘请了相关专家团队进行规划，并出台了相关文件保障古城文化旅游的发展。如十三五期间，出台《关于全力打造华夏历史文明商丘传承创新区的实施方案》《推进商丘古城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实施专案》等。2022年8月公布了《商丘市“十四五”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该规划中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构建以古都古城为主体、以黄河故道生态旅游为依托、以乡村旅游为载体、以特色文化为品牌的全域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新格局。”在殷商文化之源融合发展核中，“以‘殷商文化之源’为内核，以商丘古城为龙头，以阼伯台、燧皇陵、宋国故城遗址等为支撑，打造集城市形象展示、文化体验、旅游观光、古都休闲、游客集散于一体的商丘市文化展示和旅游休闲融合发展核心区。”此外，要“加快商丘归

德府城墙保护性修复与展示工程进度，做好古城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编制和修缮工作，建设商丘古城历史文化创意创新区。”“重点提升商丘古城文化旅游竞争力，优化商丘古城特色旅游产品与消费业态布局，打响文化遗产旅游品牌。建设一批历史文化旅游项目，打造历史文化体验主题旅游线路。”

可见，商丘市政府十分重视商丘古城文化旅游区的建设，也意在打造古城历史文化旅游精品项目，做好古城的保护规划和旅游发展。目前，商丘市委、市政府正在努力把商丘古城创建为国家5A级景区。这为商丘古城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和管理保障。

3. 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商丘古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不仅古城墙保存完好，还有很多独具特色的其他历史文化资源，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壮悔堂、侯恂故居、穆氏四合院、文庙、天主教堂、陈家大院等，古城南门外还有张巡祠、应天书院、八关斋、文雅台等景点。古城内外重建新建的一些景点，如城隍庙、月老祠等也独具特色，吸引了不少游客参观游览。这些历史文化资源都是古城发展文化旅游的重要依托，只要开发利用得当，必将有助于商丘古城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

4. 文化旅游热的推动。当前，文化旅游备受游客喜爱，文旅融合日益深入，很多游客把感受历史文化氛围、学习了解各种历史文化故事当做旅游的主要目的，推动了文化旅游的发展。商丘古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于热爱文化旅游

的游客来说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为商丘古城文化旅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

(二) 商丘古城文化旅游发展面临的挑战

虽然商丘古城具有各种发展文化旅游的优势和条件,但是在当今时代,旅游业的竞争异常激烈,商丘古城的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 同类产品竞争激烈。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较好的古城有丽江古城、平遥古城等,相对来说,商丘古城在各方面很难与这些知名古城竞争,游客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更倾向于选择知名度高的发展较好的古城,这对商丘古城来说极为不利。要想吸引游客,必须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加大宣传力度。

2. 知名度低。虽然商丘本地人说起古城都比较自豪,觉得很有特色,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是,外地人知道商丘古城的不多,古城的知名度较低。要想吸引旅游者,必须想办法提高知名度。

3. 文化特色不够鲜明。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商丘古城作为当今世界上现存唯一一座集八卦城、水中城、城摞城三位一体的大型古城遗址,应该说独具特色,但是现实中游客除了能看到水中城之外,另外两个特点不易体现。古城下面叠压着的原有古城游客无法看到,八卦城需要高空俯视才可体会。水中城这一点,其他一些古城也有体现。所以,如何挖掘商丘古城的特色,突出其独特之处,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商丘古城文化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商丘古城的发展,多次聘请专家进行论证、规划,投资数亿元对古城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以适应文化旅游发展的需求。古城的文化旅游业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通过实地考察及学生反馈,以及网上搜索相关评论,发现商丘古城在文化旅游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商业化气息过于浓厚。

这一点在不少网友评论中可以看到,笔者及学生也有同感。漫步在古城内,虽然也有古色古香的氛围,可以看到一些古建筑、四合院等,但是商业化过于严重,游玩场所较多,小吃缺乏特色,在中山路及附近区域逛,感觉就是在逛商业街,缺乏古城该有的古朴味道。有评论甚至说“如今的商丘古城是一个披着文化古城外衣的商业街罢了”。

近几年游客更加注重历史文化景点的沉浸感,很多古城或仿古景区推出了各种体验式项目,让游客好像穿越回古代,感受历史文化气息。如开封的清明上河园、丽江古城等,均有游客可以参与的沉浸式旅游项目。但是商丘古城缺乏这种互动的沉浸式体验感,这就大大降低了对游客的吸引力。商丘古城深厚的文化内涵并没有很好地展示出来。

2. 旅游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服务质量有待提升。

古城内的环境整体得到改善,但是尚

不能满足游客需求。比如,卫生间数量较少,网络覆盖不到位,缺乏景点之间的交通工具等,共享电动车停车位缺乏,旅游旺季交通拥堵等。也有游客反映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门票过高,收费项目过多等。古城内虽然设置了停车位,但是城门比较窄,节假日容易拥堵,不方便游客通过。青年游客有的骑共享单车或电动车进入古城,进去后发现没有停车位,还要折返出去找停车位,然后再返回,这就给体验感大打折扣。总的来看,商丘古城还需要从游客角度出发,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设施,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

3. 景点过于分散,缺乏联动机制。

古城在网上的介绍中显示通票 100 元,包含了附近多处景点。实际上进古城参观是不要票的,一些小景点需要票。套票中的景点比较分散,又没有专门的交通工具,不方便游客游览。外地游客不知情的,买了票来了,有些景点却找不到,或者不方便去参观,体验感就不好。古城内部虽然有小交通车,但路线单一,不能满足游客需求。有些商丘本地居民反映,一些小景点位置不够突出,宣传不到位,找不到在哪里。这也与景点之间缺乏联动机制有关。

4. 文旅融合层次不高,缺乏优质产品供给。

如今古城古镇类景区成为文化旅游热门景区,但是古城古镇同质化严重,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包括售卖商品的同质化,餐饮种类的同质化等。商丘古城同样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古城内卖的食品、小商品

等,有特色的不多,多数是其他地方也有的一些商品。这就很难吸引游客再次参观。古城在文旅融合方面需要提高层次,开发优质产品,体现地方特色。

5. 宣传推广力度不够,知名度低。

目前虽然有商丘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商丘古城、重新发现商丘等公众号以及一些网站、电视台、抖音等 APP 会推出宣传商丘旅游发展的文章、视频等,但是总体上受众较少,浏览量不多。商丘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官网上也有一些栏目设置较好,如交流互动、问卷调查等,也能及时接收群众提的建议,但是网站速度较慢,阅览不便。网站上提到的精品线路,宣传也很少见到。总的来说商丘古城的宣传力度还很不够,来商丘古城的游客多数是商丘周边的居民,外地居民知道古城的不太多。

四、商丘古城文化旅游发展的对策

有学者指出:“知己知彼是搞好文化名城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方法”“应当保住原汁原味、原有风貌和古城特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古城保护原则”^[1]。平遥古城的成功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一方面,应该保证景区的基本完整,保护重点古迹,不能全部用现代技术填充,否则就失去了古城最基本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应该认真发掘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源,形成特色,并与现代元素进行结合,这样更能够吸引游客。但是,不可照搬照抄,不可看到成功的营销案例就急于模仿,这样只会造成自身特有资源的丢失,适得其反。^[2]丽江古城的成功经验也给我们很

多启示。

结合其他古城发展的经验或启示,针对古城文化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要认真总结,坚持保护性原则、原真性原则、特色性原则等,从各个方面着手解决问题,提升商丘古城文化旅游发展的水平。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保护为主,规划先行,权责明确,政策支持。

在古城的开发中,要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原有的古建筑要加以保护。其他区域如何开发,要做好规划。相关部门要权责明确,统筹规划。资金方面,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吸引民间投资。

古城保存最好的是明城墙、壮悔堂、文庙、穆氏四合院等明清建筑,在开发时应立足于这一基本事实,以明清建筑作为古城最基本的建筑特色,尽量展现这一时期建筑的风貌。其它时期的建筑如果是原有的,也要保护为主。仿造的建筑,一定要符合古城风貌,不能损坏古城整体建筑特色。

2. 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服务质量。

基础设施的完善是一个景区所必备的硬条件,建设符合商丘古城客流量的停车场、无障碍通道、配套酒店等都是必要的。景区中的服务则是软条件,必须给予游客以便捷的旅游指导和在餐饮、住宿、交通等方面提供舒心的服务。公共卫生间也要充足,且指示牌要明确、清晰,满足游客的需求。环境卫生也要注意,落实一天一打扫,但是不要拿喇叭喊。

景区的可进入性对于景区的发展起着

重要的作用。目前古城内没有共享电动车停车点,不方便游客出行,公共交通工具也不是很多。可以在火车站和高铁站等游客较多的地点设置到达商丘古城的旅游专线,配备公共交通工具,使游客更加便利,也能体现我们的热情和诚意。

为了给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可以在景区内设置服务台,提供人工讲解和智能讲解服务。也可以和商丘地方高校联合,让一些学生来实习,为游客做志愿讲解,既锻炼了学生,也服务了游客。古城内显眼的位置可以安放大屏幕,循环讲解商丘的历史,播放古典音乐营造古城氛围。各个景点的工作人员,包括古城内各个店铺的工作人员,要统一进行培训,提高服务质量。

3. 深挖古城文化内涵,体现古城文化特色。

游客来古城参观,更多地是要感受古城的特色文化,进行深度体验游。所以,古城内的商业气息不可过于浓厚,要深挖古城文化内涵,体现古城文化特色。要体现古城文化特色,首先要保护好古建筑,保证古城整体文化氛围是有古城味道的,此外,还要开发一些文化旅游项目,最好可以根据古城的历史文化及人物故事,设计一些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的项目,可以让游客感受古城的生活气息,感受古城的古风古韵。

近几年国风爆火,古城景区也紧跟潮流。2023 商丘古城国风文化周系列活动融合传统文化和时下潮流推出了一些特色文旅体验,有国风巡游、合唱快闪、张巡

巡城、天街市集、街头卖艺、通关文牒、变装挑战等活动,吸引了较多的游客。这种模式也是很好的,在此基础上应该多加强和游客的互动。比如,可以借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形式或者一些景区实景演出的模式,开发设计一些文化表演项目,如在张巡祠附近,借助南湖,开发睢阳保卫战表演;在应天书院展现师生上课的场景;在壮悔堂表演桃花扇的故事等。也可以把一些历史文化故事改编成沉浸式话剧,不同时期的故事连贯起来,给游客一种在历史长河中穿梭的感觉,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对于表演内容和演员的选择,可以由专门的公司负责。也可以和地方高校合作,在大学校园内征集好的剧本,由官方择优选出,打造出相应的文化节目。也可以让大学生现有的一些古风表演活动在古城内表演,吸引游客参观体验。总之,一定要体现古城文化特色,内容丰富多彩,能够给游客留下难忘的体验。

此外,商丘古城商业化气息过重的问题也要改善。商业可以有,但是要有好的规划,店铺要和古城的氛围相协调,要展现当地的特色美食、特色文创产品,或者开发一些游客可以参与的刺绣、打铁、手工作坊等,体现古城的文化特色。如果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不考虑古城文化氛围,小商贩叫卖声不断,会严重破坏古城的文化气息,给游客不好的体验感。

4. 景区联动,资源整合,开发精品旅游线路。

古城的旅游文化资源丰富,但各小景点相对分散,缺乏统筹,没有形成规模效

应,也不利于游客的游览。目前政府相关部门推出的也有旅游线路,但是宣传不够,知道的人不多,加上配套设施不完善,导致外地游客来了找不到景点或者游览体验不好。景点之间应该统筹规划,把各种优质资源整合起来,开发出精品旅游线路,完善配套设施,尤其是景点之间的小交通,要设置旅游专线,满足旅游者的需求。餐饮、住宿、购物等方面,也要有相应的配套设施。

5. 创新开发文创产品,满足游客需求。

目前商丘古城景区内缺乏优质的文创产品,多数店铺卖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且很多地方都可以买的玩具、小商品等,缺乏独特性和创意性。古城应建立专门的文创开发公司,组建专业团队,加大文创产品的开发研究力度,结合商丘历史文化,制造一些与商丘古城及商丘文化有关的特色产品,如印有商丘历史人物或故事的团扇、折扇、桃花扇、纪念币、范仲淹保佑上岸图、地方历史人物泥塑、特色剪纸、宋绣、书签等,也可以在一些产品上印上“商丘古城留念”字样。通过挖掘古城历史文化,创新开发文创产品,既可以满足游客的需求,也可以宣传商丘古城文化资源,同时也带动经济发展。

6. 加大宣传力度,建设智慧旅游平台。

在宣传方面,要运用多种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可以在车站、公交站牌、高速服务区等地方张贴宣传海报,提高商丘古城的知名度。也可以利用网络媒介进行宣传,借助抖音、快手、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电视等平台进行宣传。可以联系一些比较

知名的网络主播或摄影爱好者，来商丘古城拍视频，进行直播等，提高古城的知名度。也可以举办短视频大赛，文化节等活动，通过活动扩大古城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此外，建设智慧旅游平台也很必要。商丘市政府十四五文化旅游规划中提到要建设智慧文旅平台，加大智慧旅游建设，提高景区网络覆盖水平。如果这些规划能真正落实，一定可以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提高景区的知名度。

商丘古城应该建设一个官网和一个微信公众号。这方面可以借鉴丽江古城的做法。丽江古城官方旅游宣传平台上面有景点介绍、美食推荐、旅游攻略、历史文化介绍、规章制度、投诉热线、新闻动态、视频介绍、文学期刊、文学作品等。网站内容丰富，通过视频、图片、文字等详细介绍了丽江古城的方方面面，有助于游客了解丽江古城的历史文化。点开网站还能听到优美的讲解文字，娓娓道来，动听悠扬。商丘古城也可以建设一个官网，开设相关栏目，介绍古城的文化旅游资源，给游客推荐好的旅游线路，配合视频、图片等推介古城，方便游客了解古城的历史文化。还可以建设一个微信公众号，定期推出相关文旅动态、旅游活动、历史文化故事等内容。在网站和公众号中，要特别添加与游客互动的栏目，及时了解游客需求，帮助游客解决各种问题。

7. 坚持游客至上，体现人文关怀。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游客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个性化、精神化等特征，越来越多的游客对旅游服务质量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满足游客需求，商丘古城要坚持游客至上的原则，始终把为游客服务放在首位，开发设计旅游产品、建设相关硬件设施时都要考虑游客的需求。在旅游过程中，要全方位给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尤其是给游客更多的人文关怀。山东淄博烧烤的火爆正是由于当地热情好客，服务周到，所以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去。因此，商丘古城也应该大力提高服务质量，在细节上体现对游客的人文关怀。比如停车场距离远的话，附近可以设置小交通工具，让游客下车就可以乘坐交通工具前往景区门口；路边的指示牌要清晰、明确，用语要温馨、体贴。卫生间里面贴上温馨提示，留下服务电话，游客如有需要可以第一时间寻求到帮助；路边多设置一些长椅，供游客休息；门票可以多一些优惠，对特殊群体可以减免门票等。

总之，商丘古城文化旅游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团结协作，共同努力，切实把好的政策和措施落到实处。在文化旅游热潮的推动下，在旅游业的战略性地位日益突出的形势下，相信商丘古城的未来一定越来越好！

[1] 任致远、尹豫生：《关于平遥和丽江保护与发展的几个观点》，《城市发展研究》1999年第2期。

[2] 王轶群：《平遥古城经营成功的经验与启示》，《人文天下》2019年12月刊。

（作者：魏清彩，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师）

· 书院文化研究 ·

北宋应天书院史志研究发微

◎王树林

中国书院研究是中国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一块重要领地。书院之名虽然唐代既有，但五代以后才真正成为文人士子肄业之所。应天书院（时称应天府书院）是在五代杨悫、戚同文学舍的基础上于宋真宗时创建，后改为应天府府学，继而升为南京国子监学，在宋代教育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两宋书院大多有史志，甚者一修再修。而作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至今无史无志，其史志的历史分期问题、书院先师与书院名师的教育贡献问题、宋大臣辅相如晏殊、范仲淹、王洙、王尧臣、富弼、赵概、张方平等与书院的关系问题、应天府书院的授徒与管理问题、南宋以来学界对书院某些错误认知问题等等，等等，皆待研究廓清。应天书院史志研究的深入开展，是当今学术界的迫切任务。

一、书院起源及其功能的演变

清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四《书院》谓，唐玄宗时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1]。今检新旧《唐书》，袁说亦不尽然。

《旧唐书·职官志》谓：“集贤殿书院：开元十二年置。汉魏以来，职在秘书。梁于文德殿内藏聚群书，北齐有文林馆学士，后周有麟趾殿学士，皆掌著述。隋平陈之后，写群书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

实秘书外阁。炀帝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贮书，自汉延嘉至隋，皆秘书掌国籍，而禁中之书时或有焉……玄宗即位，大校群书，开元五年，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十三年，与学士张说等宴于集仙殿，因改名集贤，改修书使为集贤书院学士。”^[2]《新唐书·百官志》亦有“集贤殿书院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缉经籍。……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之说^[3]。可见唐玄宗时的“朝省”之书院，不仅是修书之地，还是藏书、刊书之所。

当时皇家书院是不是就没有“士子肄业”的功能呢？其实也有传道讲学、授徒肄业功能，只是不以此为主而已。集贤书院初成，以张说为学士，唐玄宗李隆基赐宴庆贺，时君臣应制唱和，现存这些应制唱和诗亦可说明。如唐玄宗《集贤书院成，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诗：“广学开书殿，崇儒引席珍。集贤昭袞职，论道命台臣。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辰。”诗中有“广学”“引席”“论道”之说，可见有讲席论道之事。张说《奉和圣制，送赴集贤院》诗：“侍帝金华讲，千龄道固稀。位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首命深燕隗，通经浅汉韦。……欲知朝野庆，文教日光辉。”源乾曜《奉和》诗有“盛业光书府，征人尽国英。司

纶贤得相，群俊学为名”句^[4]。《奉和》诗中也提到“金华讲”“学徒归”“文教”“征人尽国英”“群俊学为名”，皆为讲学教徒之事。不过当时书院师徒，不是一般士子，多为饱学文臣而已。关于唐丽正、集贤书院的创立与功能，宋王应麟《玉海》一六七考之甚详，这里只是说明盛唐时朝廷已有书院之建，虽为藏书、修书之所，业已具有讨论学术，传道授徒之功能。

书院为一般士子肄业之所当出现在中唐以后至五代时期，当时又称书堂、学舍、书楼、书斋等。初发只是学人高士自我读书修身养性之所，或富家大户之私塾。后人追绪，逐渐才有面对社会收授生徒之举。如衡阳北石鼓山之石鼓书院，前身即为唐秀才李宽结庐读书处，唐诗人吕温有《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诗：“闭院开轩笑语阑，江山并入一壶宽。微风但觉杉香满，烈日方知竹气寒。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诗好就步虚坛。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5]据《湖广通志》卷二三所载：“宋至道三年，郡人李士真援（李）宽故事，请即故址创书院，以居衡之学者。景祐二年，刘沆守衡，请于朝，赐额曰石鼓书院。”^[6]可见到了宋代才有收授生徒之举。其他提唐人有书院者多为后人所记，并非时人所称。如河北真定的西溪书院，本唐隐士姚敬栖息隐遁处，至宋才有是称（《明一统志》卷三）。四川巴州丹梯书院，本为“唐状元张曙读书地”（《四川通志》卷七九）。南岳书院，一名邨侯书院，唐李泌隐居于此，名端居室，宋建书院（《湖南通志》卷六九）。

关于富家大户私家办学最典型者见于《义门陈氏家乘》，《家乘》收有晚唐大顺元年（860）陈崇所立的《江州陈氏家法》，其中涉及本族家塾者有两条：

一是，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学成应举者。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

二是，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至月解散。量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书室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笔墨砚并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7]。

至五代，天下混乱，战争不断，官府无暇顾及教育，官府主导的官学衰落式微，有志文人开始从自我高蹈、修身养性的读书楼舍，面向社会士子而揽徒讲学。旧有的书院、书楼、书舍、学堂开始由藏书、自修、家塾的半封闭形式，向侧重于“士子肄业之所”的开放功能发展。如上文提到的陈氏东佳学堂，不仅教育陈氏子弟，开始面对社会而向四方游学之士开放授徒。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述及南唐时陈氏东佳书堂，谓“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8]。南唐徐锴《陈氏书堂记》，更明确记载了当时陈氏的东佳书堂既教陈氏子弟，又延社会四方游学之士而设教授徒，记中写道：

浔阳庐山之阳，有陈氏之书楼。……大顺中，（陈）崇为江州长史。乾宁中，崇弟勋为蒲圻令，次弟孜，本县令，能嗣

其业。如是百年，勋从子袞，本州曹掾，我唐烈祖中兴之际诏复除而表扬之，旌其义也。袞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自龙纪以降，崇之子蛻、从子渤、族子乘登进士第，近有蔚文尤出焉，曰逊、曰范皆随计矣。四方游学者，自是宦成而名立盖有之^[9]。

徐锴为五代南唐时期著名学者，徐铉之弟，世称“小徐”。此记虽撰于大宋赵匡胤开宝二年（969，宋立国第九年），所记之事皆为晚唐（唐昭宗乾宁中，896）至南唐间（896-969）史实。

正史对于此时置书楼、授学徒的教育方式亦有记述。如《旧五代史·罗少威传》：

罗绍威，魏州贵乡人。……绍威形貌魁伟，有英杰气，攻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每歌酒宴会，与宾佐赋诗，颇有情致^[10]。

《新五代史·一行传》：

石昂，青州临淄人也。家有书数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而昂不求仕进，节度使符习高其行，召以为临淄令^[11]。

学者藏书由读书自修到招延文士，是民间教育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宋初书院的创立与繁盛做了准备。应天府书院就是在五代时期杨悫、戚同文学舍的基础上创

立的。

二、北宋“四大书院”及应天府书院的创设

北宋史称有四大书院，而应天府书院是北宋“四大书院”之一。提出“四大书院”之说的大多是南宋的理学家，他们往往是热心的书院建设者，也是书院教育的践行者。如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写道：

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眡陂塘并庐山而东，得白鹿洞书院废址，慨然顾其僚曰：

“是盖唐李渤之隐居，而太宗皇帝驿送九经、俾生徒肄业之地也。”书院创于南唐，其事至鲜浅……某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承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祖宗尊右儒术，分之官书，命之禄秩，锡之扁榜，所以宠绥之者甚备。当是时，士皆上质实下新奇，敦行义而不偷，守训诂而不凿，虽学问之渊源统纪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进德之地矣^[12]。

南宋另一大理学家魏了翁在《全州清湘书院率性堂记》中亦云：

吾友林仲山岳守全日，得柳侯仲涂氏读书遗址，乃鉏荒筑室，馆士储书，与邦人讲肄其间，且以致怀贤尚德之意。嗣守者不替，有引斋庐廩稍，岁衍月益，今锡之号，荣殆与睢、岳、嵩、庐四书院相为侔等^[13]。

吕祖谦、魏了翁文中所谓“睢阳”“睢”，即北宋应天府南京，唐、五代时称宋州睢阳郡，睢之书院，即应天府书院。南宋末，

史学家王应麟撰《玉海》，运用大量史料，纵谈《天下四大书院》（见《玉海》卷一六七），以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之说为准。及至宋末元初的大史学家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卷四十六专考学校，于北宋“天下四大书院”中列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时虽另有“三书院”、“六书院”之说，而应天府书院（或称睢阳书院）多在其中。今邓洪波先生在《中国书院史》第二章第三节考“天下四大书院”云：

无论“三书院”“四书院”，抑或“五书院”，越过门户之见，它所代表的仅是一种称谓而已。其所指称者无非就是说，宋初有那么三家或四家、五家书院，可以称闻天下。今统计三四五家各说，除去重复，计有岳麓、石鼓、白鹿洞、嵩阳、应天府、徂徕、茅山七书院。它们是南宋的书院建设者们所认定的宋初天下著名书院^[14]。

应天府书院既为“宋初天下著名书院”，在宋代书院的研究中，应天府书院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今检宋以来书院研究的专门志书，典册灿然，甚者一书院的志书一续再续，多者达四五种（如《白鹿洞书院志》）。而应天府书院至今尚无一部志书，岂不让人扼腕兴叹！

北宋应天府书院，是北宋国家肇造之初，大宋皇帝第一个赐名的书院。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考北宋四大书院时说：“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邱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

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15]《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九朝编年备要》《宋大事记》《容斋三笔》及张方平《乐全集》等文献典籍，都将此视为北宋天下州郡置学之始。应天府书院自五代后梁后唐时期（公元907-936年）杨恂于宋州授徒，五代后晋（公元937-946年）至宋初戚同文建学堂（或称学舍）办学，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赐名应天府书院，再到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朝廷下诏将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前后经历了一百余年的私家（或半官方）办学历史。收为府学八年后，于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又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因素及显著的办学实绩，由应天府学升为南京国子监学，成为朝廷中央官学。二百多年间，为北宋王朝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英才，当时影响之大，对后世影响之远，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由金入元，应天府书院故址文脉续延，或称州学或云府学；或经战乱，或逢天灾，尊师重教，崇儒向学之风绳绳绵绵，传承不绝。至明清两代，或重建应天书院，或另建范文正公讲院，兴废振复，一线文脉，传承至今。

三、应天府书院的研究现状及亟待澄清的问题

应天府书院与北宋其他书院比，后世对其研究相对滞后。仅就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提到的北宋四大书院而言，历史上白鹿洞书院，有明人郑廷鹄编著之《白鹿洞志》、明周伟编著之《白鹿洞书院志》、清廖文英、钱正振之《白鹿书院志》

等；石鼓书院有明李安仁《石鼓书院志》、清李振华《国朝石鼓志》等；岳麓书院有清赵宁《长沙府岳麓志》、清丁善庆《长沙岳麓书院续志》等。以上三书院之志书一修再修。而截至今日，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应天府书院的史志专书问世。2001年10月，在时任河南省省长李克强的支持下，应天府书院复建项目得以启动，2003年被省政府批准立项为省重点项目，2007年一期工程完工。新的应天书院建筑由河南大学古建研究院设计，于商丘古城南城湖东南侧落成。而一部科学完整、资料翔实的《北宋应天府书院史志》的修撰，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更显迫切。

中国古代书院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教育史研究的重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的书院研究，曾掀起了一些热潮，在明清各种地方书院志书的基础，分省书院综志开始撰写。一九三一年《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第四期发表了柳诒征先生《江苏书院志初稿》，以通鉴纲目形式，就江苏一省书院发展历史，作了编年考述。一九三二年，吴景贤先生《安徽书院志》问世，全文发表在《学风》杂志一九三二年二卷第四至八期中。该志分县纂辑，每县以地方书院产生年代为序，每一书院又以时间发展先后排列，构稽文献史料，排纂而成。一九三六年，时任民国教育研究会专任研究干事的王兰荫先生撰成《河北省书院志初稿》、《山东书院志初稿》（未完），分别发表在《师大月刊》一九三六年第二十五及第二十九期上，其编撰体例基本与《安徽书院志》相同。20

世纪下半叶的前三十年，台湾、香港学者对书院研究颇多，三十年中约有40多篇书院研究的论文成果发表。但以上研究，基本没有应天府书院的专门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二十余年间，书院研究进一步深入，综合研究的重大成果陆续出现，如陈元晖、王炳照、尹德新《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陈谷嘉、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及一些地方书院史的出版。进入21世后，邓洪波先生又出版了《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这些论著的出版虽然与应天府书院的研究关涉甚少，但为应天府书院史志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应天府书院史志研究，需要澄清、探索的问题很多。

一是应天府书院的历史界定及历史分期问题。北宋历史上的应天府书院（又简称应天书院），应以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赐名为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以后，又有称“南京书院”者，如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七《南京书院题名记》。北宋应天府南京，唐至五代时为宋州睢阳郡，又有称“睢阳书院”者，如南宋的吕祖谦《白鹿洞书院志》、王应麟《玉海·天下四大书院》。近年一些地方资料，一些媒体资料，甚至一些学术文章有称宋

州书院、归德书院者，皆未规范，且无史料依据。应天府书院之名，应从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算起，至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升为南京国子监学为止。虽然仁宗景祐二年（1035）改应天府书院为应天府府学，但从改为府学至升为南京国子监的八年中，基本延用旧制，当时亦“书院”“府学”并称，可看作完全收入朝廷中央官学的过渡期。如果排除“府学”期，应天府书院的办学历史为26年，如果包括府学期，应天府书院的办学历史为34年。为此，史志的研究应以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至仁宗庆历三年（1043）34年的历史，作为北宋应天府书院史志研究的主要内容。

考虑到没有前期五代至宋初戚同文的筑室授徒所取得的显赫成绩，就没有应天府书院的创建，并且应天府书院的授徒方法及传授内容，基本延续戚氏课法与戚氏之学。那么五代后梁、后唐间的杨恣至后晋、后周、北宋太祖年间戚同文的授徒，理应做为应天府书院的初创阶段。为此，这一时期戚同文学堂（或学舍、睢阳学舍）也应是史志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以“睢阳学舍”命名亦有根据，应天府书院创建之初，时人还有时称应天府书院为睢阳学舍者。如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三收有他在应天府书院求学时的一首诗《睢阳学舍抒怀》，既称当时的应天府书院为睢阳学舍。今有人称戚同文讲学为“南都学舍”者（见：河南书院教育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北宋时期应天府书院的办学特色（J）。湖州师范学院

学报.2007（6）；应天府书院研究（D）。河南大学.2013年等），时为应天府的宋州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始升为南京，这以后才有“南都”之称，五代至宋初的戚同文讲学时期，何来南都？又何来南都学舍？亦有称“归德学舍”者，虽然五代后唐的同光元年（923），驻守宋州的宣武军改称为归德军，但作为军事驻地，并非地方行政州府，只有到了金、明、清三代，此地才有“归德”州府之称，所以谓戚同文学舍为“归德学舍”者似乎不妥。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应天府书院改升为南京国子监学。经金至元，下传至明清两代，继承先贤而文脉绵延未断。明嘉靖十三年（1534），河南巡按监察御史蔡瑗，拣郡中名士李昆等十二人，及属邑若干人，曾以象贤祠社学房舍聚郡中学子肄业其中，题匾曰“应天书院”，有意重振北宋应天书院盛业。昔蔡瑗在此留官很短，未及大成。明万历间知府郑三俊创建范文正公讲院，至清而发扬光大，实承范仲淹应天府书院讲学精神。这一时期的范文正公讲院（或称范文正公书院），于今日在商丘古城南重建之应天书院，即接续明清讲院之文脉。为此，以北宋之后宋地州、府之学及应天书院、范文正公讲院之发展，可作为应天府书院的余绪，而立载入应天书院史志的沿革研究。

二是应天府书院发展史上有大量需要澄清的历史事实，有很多问题需要重新清理、辨证。如关于先师戚同文的生平及授徒事迹问题、戚同文五十六位名弟子问

题、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的有关历史真实问题、应天府王洙、王洙家族与书院的史实记载问题、应天府书院的授徒与管理问题、石介、孙复与应天府书院的关系及后世文献的谬传与疏漏问题、应天书院英才与北宋政治问题，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对于这些问题有的史书记载相互矛盾，有的史实资料难以稽考，有此史迹不见完整记载而零零星星散见于南宋与宋以后的文献中，以至真伪互见。为此，书院史志研究要做一些辨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

以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的有关问题为例，从南宋至明清，直至当今，仍然存在着关于范仲淹与应天府书院关系的一些错误历史认知。如范仲淹的师承问题，《宋史·范仲淹传》、宋王应麟《赤城书堂记》（见《浙江通志》卷二六一）、明王鏊《姑苏志》卷四八《人物》六、《续通志》卷三三九《范仲淹传》、《江南通志》卷一八《人物志》、康熙刊《范文正公集》附《范文正集补编》卷二《宋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文正公傳》等，有范仲淹“依戚同文学”之说，以致历代延袭，个别当今学人亦有不加详考，持是说者（见《简明宋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5：477.）。其实范仲淹入应天书院读书时，戚同文已去逝二十余年，何来“依戚同文学”？再如，北宋应天书院与商丘明清时期的范文正公讲院的承绪关系不清，甚或混为一谈。由于范仲淹显赫的历史影响与高尚的人格品位，后世对其敬仰；再加上他不仅是应天书院的学生，又曾执教应天书院，成为书院名师，以致自明万历三十八年郑三俊为归德府知

府，建范文正公讲院，文人便把北宋应天府书院与范文正公讲院混为一谈。认为北宋的应天府书院就是范仲淹的书院，宗师是范仲淹，应天府书院传承的是范仲淹之学。这种错误认识自明清以来，一直影响至今。其实“应天府书院”之名在北宋历史上的存在近二十六年，而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掌教不足两年，怎么能认为应天府书院就是范仲淹的书院呢！

三是面临并必要解决的还有五代与宋初太祖、太宗时期的典籍缺失，文献难征问题。宋州地处中原，五代政权迭相更替，战争频乃，公撰私述的典献留下很少，几成空白。最早宋州办学的杨慆，学力深厚，能诗文，虽早逝，弟子戚同文也会为其整理文集，但杨慆著述早已荡然不存。五代中至宋太祖、太宗时期，戚同文高隐不仕，聚徒讲学，《宋史·戚同文传》说他“好为诗，有《孟诸集》二十卷”^[16]，曾与当时名诗人杨徽之唱和。戚同文两个儿子戚维、戚纶及孙舜宾、舜臣等在当时皆有集。特别是戚纶，据《宋史》本传记载，“既没，家无余赀。张知白时知府事，辍奉以助其丧。家人于几阁间得《遗戒》一篇，大率皆诱劝为学。有集二十卷，又前后奏议有机务利害、各边均田之策，别为《论思集》十卷，分上下篇。天圣中其子舜宾献之，诏赠左谏议大夫”^[17]。但戚氏的这些文集都散佚无传。戚同文作为高士名师，“所与游皆一时名士”，《宋史·戚同文传》记载他的好友，上蔡宗翼，好学强记，经籍一见即能默写；张昉有史材，滕知白善为诗，郭成范最有文。还有戚同

文的不少知名弟子,据《宋史·戚同文传》记载,“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见前)这些友朋弟子,大都身后有集,今皆不存于世。就虞城王砺而言,他雅好诗文,他的儿子涣、渎、渊、冲、泳、洙,有五人进士,孙稷臣、堯臣、梦臣等,皆进士高第,响誉文坛,而王氏文献存者甚少。这些文献的散佚无征,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另在应天书院、府学三十余年的运行过程中,当时书院的一些典章制度、档案文献亦荡然无存,资料勾稽困难重重。

四是史书记载及北宋中后期及南宋以后的地志、笔记等文献资料记述,亦多史实抵牾,应天书院史志研究存在艰难的辨伪考证问题。如《宋史》有关戚同文、戚维、戚纶等资料的记载,就戚同文卒年问题、戚维、戚纶仕迹问题,一部史书自身就存在相互矛盾。有些史实与时人文集记载互为印证,又不尽一致,甚或差异颇大。如王禹偁《小畜集》中有关与戚氏兄弟的诗文,与《宋史》有关记载的不一致,即是如此。再如两宋之交应天府谷熟县学者徐度,他在《却扫编》卷上记载宋初书院初建时的一些史实,认为宋建国之初,是“宋城富人曹诚者,独首捐私钱建书院城中”。并延请楚丘戚先生同文主之”。“曹氏益复买田、市书以待来者”^[18]。徐度是本府学人,对先辈史实记载却明显出现错误。府民曹诚乃戚同文卒后约二十年,于大中祥符初年前后,即同文旧居旁造室百馀楹,聚书数千卷,延生徒讲习甚盛,那来“延

请楚丘戚先生同文主之”之事?徐度对本地先贤的史实记载还会出现这样错误,其他文献就不待再言。如宋吕本中撰《童蒙训》卷下、《浙江通志》卷二六一《艺文三·记》载南宋王应麟《赤城书堂记》等谓范仲淹、富弼皆师事戚同文等,皆讹误相传,亟需一一辨证。

五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发表的研究成果,不管是一些出版的学术著作或期刊文章、或博硕论文,为繁荣应天府书院的学术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有些论著存在史实臆断,甚或毫无文献依据、或对历史文献中的误谬资料不加考证而引以为据,其说又为后来学人互为引用,陈陈相因,造成史实混杂,真假不辨。为此,半个世纪以来的有关应天书院研究的成果,应有一番全面的清理和总结。

以上就北宋应天书院史志研究略述看法,仅发其端,以求抛砖引玉,盼望有更多学者关注这一课题,使研究能逐步深入。

参考文献:

- [1] 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四书院[M].光绪石印本:16-17
- [2] 刘昫.旧唐书.卷四三职官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5.1851.
- [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七百官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12.
- [4] 李昉.,文苑英华,卷一六八应制一[M]//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1989:1334-498,499.
- [5] 曹寅.全唐诗.卷三七〇吕温[M]

//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1989:1426-565.

[6] 邁柱等.湖广通志..卷二三衡州府[M]//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1989:531-747.

[7]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23.

[8] 释文莹..湘山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6.

[9] 徐锴..陈氏书堂记..《江西通志》卷一二〇《艺文·记一》[M]//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1989-1989:1426-565.

[10]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十四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6:191.

[11]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6:371-372.

[12] 吕祖谦.东莱集.卷六[M]//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1989:1150-53,54.

[13] 魏了翁.鹤山集.卷四八[M]//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1989:1172-537.

[14]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94.

[15]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六[M]//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1987-1989:611-120

[16] 脱脱.宋史.卷四五《隱逸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418.[17]

[17] 脱脱.宋史.卷三〇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107.

[18] 徐度.却扫编.卷上.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19.

(作者:王树林,原南通大学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现任广州商学院语言文学研究院副院长。)

范仲淹思想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

◎李可亭

被朱熹称为“宋朝第一流人物”，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为孔子所谓“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的名臣，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范仲淹的思想内涵博大精深，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愈来愈醇厚甘甜，可谓历久弥香，在今天发挥着重要的育人作用，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范仲淹的理想与志向是一束光，穿越千年，照亮后人

范仲淹少小立志，他打小的理想，是长大后“要么做名医，要么做名相”。做名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宰相这个平台上，利用自己的能力和权力，发挥自己的作用，造福天下的百姓。如果当不了宰相，那就求其次，做一名医生，用自己手中的技术解除人们的病痛之苦。范仲淹的这个理想，无论是做宰相还是医生，都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人生在世，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不仅体现了做人的价值，也诠释了做人的意义，于自己、于国家社会，都非常重要。因此，范仲淹的理想，今天读来，常令人感奋不已。

有志者事竟成。理想是光，引领着人们努力前行。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又说：“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范仲淹深明此义。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范仲淹辞别母亲、继父、兄弟，带着书籍和琴剑，带着梦想，来到隋唐大运河穿流而过、交通便利、车旅辐辏的睢阳。睢阳有个应天府书院，在杨悫睢阳学舍的基础上，经曹诚捐资助学，皇帝赐匾，成为了远近有志青年读书学习、报效祖国的向往之地。

1011-1015年，范仲淹在应天书院苦读五年。其间，“真宗谒太清宫，幸亳，驾次南京，皆往观之，独公不出，或以问公，公曰，异日见之未晚。”在范仲淹看来，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读书，皇帝是要见的，但不是今天。考中进士后，在殿试时，范仲淹不仅见到了皇帝，而且与皇帝近在咫尺。在以后做官特别是“庆历新政”的过程中，范仲淹与皇帝几乎是朝夕相处了。范仲淹一句“异日见之未晚”，其淡定、自信与执着，令古今多少人拍案叫绝、击节长叹！

范仲淹在应天书院的读书生活是既刻苦又非常清苦。欧阳修撰《神道碑》云：范仲淹“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同时“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或同舍生馈珍膳，皆拒不受”，他说：“非不感厚意，盖食粥

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异日岂能啖此粥乎？”恶衣菲食，常人所不堪忍受，而范仲淹处之晏然，持之有恒。

“诗言志，歌咏言。”这期间范仲淹作有《睢阳学舍书怀》七律诗一首，描写了自己的生活感受，抒发了他不凡的抱负和理想。原诗云：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何人吹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鸛鹑。
飘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
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诗开门见山描写他当时的困境和心情：寄读他乡，身世飘零，犹如无根可倚的白云，只能无奈地遥望着东南的家乡；这时又听到了幽咽的洞箫声，更增添了他心头的凄凉。接着，笔锋一转，勉励自己虽然身处逆境，但不能自甘沉沦，象凤凰一样隐遁世外，而要向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人学习。接下去，范仲淹写自己虽然生活贫困，但自甘其乐，虽然出身寒微，但有宏伟抱负，他希望遇到知音、伯乐。两句用典，一为《论语》“贤哉回也”的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为《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诗的最后两句，表达了一种必胜的信念。年轻的范仲淹很自信，只要自己不懈追求，自强不息，理想终会实现。“但使斯文天未丧”，范仲淹化用孔子的议论，表达自己的志向。“涧松何必怨山苗”，引左思的《咏史》诗，借涧底的大松却不如山顶的小苗之高的自然现象，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

《睢阳学舍书怀》，直抒胸臆，格调

高迈，催人奋发，而且用典贴切，语言朴素，情景交融，达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

二、范仲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为后人提供了前行的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特别强调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极力提倡阳刚之气，反对自暴自弃，鼓励人们树立奋发进取的人生态度。范仲淹的言行完全体现了这种精神。

范仲淹多次被贬，但都能刚健有为、独立不惧，他“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以天下为己任”，坚持原则和道德标准，不苟且于世。

范仲淹称晏殊为师，引为知音，但在献寿章献太后问题上，范仲淹有不同观点，上奏以为不可。晏殊大惧，召范仲淹责怒之，以范仲淹为狂。范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误知，常惧不称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论获罪于门下也。”于是，又上书晏殊，内有“夫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人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有忧为。斯二党常交战于天下，天下理乱在二党胜负之间尔。”范仲淹为人刚毅不谄，正直不阿，有忠鲠之节。范仲淹每上殿奏事，多陈治乱，以开悟君上，京师有“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忧有希文”之谣。再如，献百官图，以是忤宰相吕夷简，遭贬知饶、润、越诸州，司谏高若讷言贬黜太轻，欧阳修上书责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坐朋党，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详其事。

范仲淹“发必危言，立必危行”“谏

则必黜，黜出益谏，陈善闭邪，宁以身蹈不测而不悔”，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打破了当时“以宽厚沉默为德”“以避谤为智”的官僚积习，开启了宋代士大夫议政之风。所以朱熹赞扬范仲淹“本朝唯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做成起来也”。

三、范仲淹孝亲与仁民的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道德规范

“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学说的核心和根本，它包括诸多道德范畴，其基本精神就是“爱人”。儒家的“爱人”，首先是“爱亲”，爱与自己有血亲关系的人。

从范仲淹的言论著述和政治实践中可以看到，爱家与仁民精神，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他人生实践的基调。

范仲淹敬爱母亲。到应天书院读书时，与母泣别，期以十年，接母奉养，后果践行诺言。范仲淹于朱氏父亲亦多感恩，常思厚报。后乞求皇帝赠朱氏父亲太常博士，对朱氏兄弟多有接济。

范仲淹曾语子弟曰：“吾吴中宗族甚繁；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范仲淹遂建义宅，兴义学，置义田，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范仲淹性喜施与，乐善泛爱，解衣推食，也不完全限于族人。

范仲淹为官期间，能“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即使在他母丧丁忧时，为了使“四海生灵长见太平”，依然能“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正是从仁民的精神出发，范

仲淹在他的仕宦生涯中，总是以“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诚心关注着民生与国事，提出了许多忧国忧民的思想主张。如他在《体仁足以长人赋》中认为：善政之要，在于“力行乎仁”“致恻隐以昭陈，敦惠爱以于心”。在《用天下心为心赋》中认为：为官之人应“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他还认为：“天下之政也，惟贤是经；天下之情也，得贤而宁”，“能政之处，民必蒙福；谬政之下，民必受弊”。他还请求仁宗皇帝“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于刑典，厚于恻隐：在物祝纲，于民泣辜；常戒百官，勿为苛酷”。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从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出发，针砭时弊，直陈天下危机，指出造成当时百姓困竭的原因在于“国用无度”，“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民力已竭则说明“天下无恩”，“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因此要想巩固社稷，就要对民施行仁政，使王道复行于天下。而他在《岳阳楼记》中发出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更是他忧国忧民精神的体现。

四、范仲淹的家国天下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范仲淹认为说，国家的兴盛在人才，人才的培养在教育，因此，办好学校至为重要，于是他提出对国家的教育及其教育背后的政治进行改革。在应天书院读书期间，范仲淹写下了著名的《上执政书》，

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教育的思想。范仲淹做官各地，每到一处，他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办学。他把应天书院的办学模式推广到他所有做官的地方，于是，“天下庠序，视此而兴”，应天书院成为了天下办学的样板工程。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以教育为先导，成为了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

范仲淹写下的响彻千古的《岳阳楼记》，更是体现了他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到国家、社会，小到个人、家庭，没有忧患意识是不行的，因为没有忧患意识，就会死于安乐。

范仲淹身在朝堂的时候，他想着天下百姓的生活怎么样；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时候，则替皇帝考虑天下的长治久安，这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思想，成为了中华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一直在激励着后人，树立理想，明确方向，造福人民。

庆历六年，邓州穰县人贾黯中了状元，同年九月，贾黯虔心敬意地到邓州州衙拜见范仲淹。范仲淹把自己一生做人做官的感悟送给了贾黯，他意味深长地说：“君不忧不显，惟‘不欺’二字可终生行之”。这便是范仲淹著名的“不欺”精神。

范仲淹的“不欺”，意为上不欺君，下不欺民，中不欺己。上不欺君主，那是对于君上的忠诚。在封建社会里，君主至高无上，虽说一味的“忠君”思想不值得提倡，但作为臣子，只要不属于那种“愚忠”，能够在“忠君”的前提下做好本职工作，那就是值得肯定的，因此，范仲淹才有“处

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感慨。下不欺百姓，那是无疆大爱。范仲淹感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心怀百姓，真心实意为民办事，这与“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道理相通。中不欺自己，是一种良心，可谓胸襟坦荡。范仲淹不欺自己的良心，没钱回家宁可卖掉唯一的马徒步而行；对于家风，他常以俭廉率家人，要求家人畏名教，励廉耻，知荣辱，积养成名。古人常说的“君子坦荡荡”，可能就是范仲淹之谓也。

范仲淹以“不欺”的精神，为官几十年，官职遍历朝中重臣、地方要员，但一生清廉守正。他持俭忍穷，乐善好施，以至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但留给后人的是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

范仲淹的家国天下情怀，集中体现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认同，他从孝亲出发而派生出来的爱民、爱国的仁爱精神，那种为了捍卫民众和国家社稷利益而独立不惧、刚健有为的人格特质，那种俭约自守、“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的大公无私精神，具有强大的精神内涵，至今仍然熠熠发光，显示出经久而重要的时代价值。

（作者：李可亭，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历史学博士）

文旅新时代应天书院定位与发展的思考

◎马发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省委、省政府将文旅文创融合战略确定为现代化河南建设的“十大战略”之一，“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是“十四五”及未来一个时期河南全域文化旅游的品牌体系。尤其是后疫情时代，全国各地文旅强劲复苏，科技赋能，文化创意，特色彰显的文旅文创产品推陈出新，异彩纷呈，为人民群众奉献了一道道文旅大餐。

宋真宗赐额“应天府书院”已经千年之余，当下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其存在的意义何在？文旅新时代下，应天书院如何重新定位焕发新的风采？值得我们进行深度思考。

一、应天书院的概况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古城东南湖岸边，2004年，在原址附近按照历史文献记载原貌，重新修建而成，占地五十多亩，书院由状元桥、大门、崇圣殿、讲堂等组成，建筑古朴典雅，书院三面临湖，环境幽静，湖水碧波荡漾，风光秀丽。是国家AAAA级景区商丘古城旅游区的重要景点，已成为广大游客领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学习传统国学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

应天府书院前身是睢阳书院，是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所创办。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改升应天书院为应天府书院，并正式赐额“应天府书院”，这也标志着私学向官学转变之始，故有“州郡置学始于此”之说。

二、应天书院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应天书院又称应天府书院、睢阳书院、南京书院、睢阳学社，后来升格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它也是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座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北宋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只有应天书院设立于繁华闹市之中，这成为应天书院主要的特色。正是因为应天府书院作为全国官学的标杆，所以，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栋梁之才，最著名的当属范仲淹。

应天书院在中国历史上与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在中国教育、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应天书院虽历经战火与黄河泛滥而屡建屡废，屡废屡建，就是因为应天府书院之范

仲淹精神一直激荡着后世有识之士，书院精神屹立不倒，为国培养栋梁之才的使命永存。

2001年10月，国务院原总理，时任河南省省长的李克强在视察商丘古城时指示：“应天书院的影响太大了，应该尽快把应天书院复建起来。”经市、区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多方努力，2004年应天书院复建工程开始建设，2007年对游客正式开放。

三、应天书院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自2004年应天书院复建后，由于资金短缺，十几年来，项目规划设计只实施了一小部分，按照历史记载的原貌仅恢复了讲堂和崇圣殿，藏书楼、教官宅、魁星阁、回廊、师生斋舍等还是空白。由于书院内内容简单，文化氛围不浓，运营形式单一，缺乏创新，一直以来，书院的现实价值没有体现出来，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尽人意，制约了书院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宋国故城考古的最新成果，应天书院下面又占压了宋国故城，完全限制了应天书院的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让应天书院重现辉煌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四、文旅新时代应天书院定位和发展的思考

我国已经进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

化，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和美好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新常态，为此，文旅行业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经历了三年多的凤凰涅槃，在新的时代下，文旅行业发展出了很多新的业态和场景。

近年来，河南借助“创意驱动、美学引领、艺术点亮、科技赋能”等先进方式，以全新的视觉表达和时尚体验，复活了传统优秀文化的精髓，创造出《唐宫夜宴》等一大批出圈出彩的文创产品。同时，在超级IP成功打造的基础上，河南不断拓展文旅文创的产业链和创新链，催生出考古盲盒、电影小镇、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等现象级爆款产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回归传统文化的热潮，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以文旅作为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河南，在“文化复兴之路”上，从1.0到5.0版本，河南文旅完成崛起之路。

1.0 文博引领，文创先行，迅速完成文化种草到旅游形象的转变。如《唐宫夜宴》，唐宫夜宴版仕女乐队系列盲盒，正式拉开了河南“文化复兴”的浪潮

2.0 通过数字科技，实现升级改造。河南博物院发行文创数字藏品每次上线即“秒光”；洛阳博物馆“河洛之光”数字馆，运用多媒体投影墙、多媒体互动、VR投影等技术和手段，打造出多种多样的互动体验形式，吸引游客纷至沓来；龙门石窟全息天幕《无上龙门》火爆“出圈”，

一票难求……通过创意驱动、科技赋能，河南古老文化破圈而出，站上时代潮头。

3.0 打造各类“新业态”，沉浸式成为突破方向。深入挖掘历史文化深厚积淀，持续丰富沉浸式文旅新业态，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原文化的博大内涵、精神和力量。一批集空间游玩、非遗体验、沉浸互动、古风歌舞演艺、文化社交休闲等为一体的新消费场景涌现，融入厚重历史文化的沉浸式体验。例如，《知道·老君山》沉浸式演艺及多种文创产品的供给，让老君山景区综合收入逆势上涨。还有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等，都带来了惊人的效益。

4.0 营销创新，年轻化+大平台，形成超级传播力。在营销传播方面，大胆互动新的媒介资源，创新表达方式，从文化传扬到旅游宣传，进一步开拓文旅市场，建立地方文旅爆款 IP。例如，在 2020 年，一句“远赴人间惊鸿宴，老君山上吃泡面”将河南传统的老君山景区带火了，一年时间，景区里到处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到访人次增长了 220%，周末时可达到最大承载量 1 万人。再如，安阳文旅局长刘洁华穿越三千年，化身中国第一位女将军“妇好”美飒出征应战，华丽亮相北京举行的“中华字都·安阳”红旗渠——殷墟文化旅游推介会，引客入安，惊艳众人。也引来了各地旅游局长的变装出圈。

5.0 项目为王：新景区新产品层出不

穷。《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是中国首座全景式戏剧群落，是一部以厚重的中原文化为题材的殿堂级作品，《只有河南》打破了以往观众对于戏剧的固有认知，用高浓度、大体量、深体验的形式建构了戏剧幻城的品牌模式，为城市与演艺的深度融合树立了一个标杆。

从河南文旅的崛起，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应天书院的现状 & 面临的问题就有了新的思路和解决办法。

应天书院不能是单纯的旅游景点，它更应该是当今商丘的一张城市品牌，利用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文化 IP 打造和现代传播手段，打造享誉国内外的超级文化品牌。它更应该动起来，活起来，在坚定文化自信，繁荣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它应该有多样性的形态，应该与现代的元素相结合，以景点为基础，向文化、旅游、商业、教育全方面发展，不断创造新的增长点，使应天书院从单一旅游景点成为全方面、全领域发展，精品化的综合文旅项目，成为商丘文旅发展的重要支撑点。

接下来，我们深入贯彻和落实好文旅融合和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等国家政策，立足景区实际，着眼文旅发展未来，提出一些思路和建议。

一是打造应天书院文化品牌。围绕应天书院文化，加大系列文创产品的开发，给足“线上种草，线下消费”需求，同时

促进景点的二次消费，努力做到从文化到产品，实现流量变现，建立应天书院新形象。

二是打造中小学研学教育实践基地。将火神台景区打造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火神台景区中小学研学教育实践营地，满足研学学生的食宿和主课堂的需求，应天书院、张巡祠、文庙等景点，根据各自文化内涵，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满足学生的特色课堂和场地的教学。应天书院以国学教育和弘扬范仲淹精神为主，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刻苦求学的精神。

三是打造商丘精神文化圣地。商丘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体现之一就是应天书院历史上所培养出来的栋梁之才是四大书院中最多的，也是成绩最好的。范仲淹在此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打造出家国天下经济致用的良好学风，培养出众多利国利民的栋梁之材。应天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最佳模式。以天下为己任，居安思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应天书院的千古校训和精神图腾。更是中国传统民本主义精神，克己奉公，爱国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当下，应该成为商丘传承国学、传统文化的圣地，社会科学普及和研学旅游之地。

四是打造恢复教育功能的国学院。借鉴岳麓、嵩阳等书院成功经验实现进一步

的突破。岳麓书院和嵩阳书院等与现代大学合作，恢复了书院的教育功能。湖南大学就在岳麓书院原址办学，湖南大学号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至今仍是湖南大学下面的办学机构，面向全球招生。2009年，郑州大学与嵩阳书院联姻，依托历史学院和文学院等师资成立郑州大学嵩阳书院，以延续文脉，弘扬国学为目标。应天书院也应该借鉴其它书院的成功经验，与商丘本地高校合作办学，成立相应的书院，为应天文化的发扬做出积极贡献。

应天书院因中国四大书院之首而扬名天下，它是中国千年文脉传承的见证和图腾，应该拥有更好的未来。

（作者：马发营，商丘古城文旅集团副总经理）

· 商丘古城风貌 ·

古城雪霁





(摄影：高建立)